

人物传略

张珂表传略

张珂表（1908～1938），笔名契如，浙江省嵊州市石璜镇寺新村人，中共嵊县县级党组织的积极组织者、重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领导嵊县抗日救亡运动，宣传抗战救国和民主革命思想，培养大批革命骨干，为建立中共嵊县地方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干部基础和组织基础，

张珂表早期经常阅读进步书刊，深受新思想和新文化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于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他与上海共产党组织主办的生活书店、读书会取得联系后，在其供职的嵊县农工银行创办流通图书室，组织明生读书会，团结进步知识青年，以《剡声日报》《嵊新民报》的副刊为阵地，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和抗日救亡运动。参与领导抗日文化团体“南鹿学社”，创办“大众”和“群力”书店，经销进步书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以嵊县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援会”）政训组实际负责人的身份，领导后援会所属的嵊县抗日救亡第一、第二流动宣传队和城区业余宣传组等宣传团队，在全县城乡开展了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发起成立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简称“乡救会”）和嵊县文化委员会，以各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团结各阶层进步知识青年、革命群众和回乡工人，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先进分子。1937年夏，张珂表等人利用赴上海参加由薛暮桥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讲习会学习的机会，积极寻找党组织。同年9月，中共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派人到嵊县建党，发展张珂表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中共嵊县

张珂表纪念文集

临时委员会，张珂表为宣传委员。1938年1月，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张珂表为宣传委员，兼任城区区委书记。1938年6月，中共嵊县工委改为中共嵊县县委，张珂表任副书记。从此，张珂表更加全身心投入党的革命事业，废寝忘食、日夜操劳，终因积劳成疾，贻误医治导致病情恶化，不幸于1938年10月31日在宁波华美医院病逝，时年30岁。

张珂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在中共嵊州地方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善学求真 志向革命

张珂表出生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近代历史上最为灾难深重的年代。从1840年开始，中国主权逐步丧失，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近代中国的两大历史任务。

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国命运总是息息相关。1908年，张珂表出生在一个清贫的书香家庭，祖父是一位忠厚慈蔼受到乡邻尊敬的教书先生，父亲因身体不好英年早逝，失去“顶梁柱”后的家境更加贫寒。家里不得不把他从小寄养在二十多里外的外婆家，就读于崇仁公学。

张珂表从小勤奋刻苦、虚心好学、知书达礼、品学兼优。1923年，他考入杭州商校，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次



年便肄业回乡谋职，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925年，考入嵊县农工银行当学徒，不久转为正式职员。

1931年，九一八的炮火惊醒了张珂表悠闲平静的生活，他开始丢掉古籍，阅读新闻报纸，关注国情时事。他不知听谁说过，日本强盛是因为深受王阳明学说的影响和启迪，于是也开始研究起王阳明的学说。然而这位中国明代大儒的心学，并没有帮助他找到一直在苦苦追寻的真理，而现实的血腥浪潮却一次又一次给他以打击，使他对危殆的时局感到万分痛心和忧虑。尽管中国军民奋起抗战，但国民政府当局消极抵抗，“塘沽协定”“上海协定”“何梅协定”等一连串丧权辱国条约陆续签订。面对国破家毁的时局，张珂表变得更加坚毅果敢，更加敢于正视现实。他经常阅读进步书刊，参加著名爱国人士史量才创办的上海量才流通图书馆附设的读书指导部学习，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以及“左翼”进步书刊，并联系现状思考面临的各种问题。随着学习和理解的不断深入，他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得到升华，开始从志向进步转变为志向革命。

苦心找党 创建组织

嵊州历来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唤醒了嵊县知识分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外地的嵊籍党团员纷纷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1926年冬，嵊籍在杭国民党党员、进步青年张本芝、华伦初受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宣中华的派遣，回嵊筹组国民党县党部。1926年，中共嵊县党组织（通讯员）建立，隶属于中共宁波地委领导，这是嵊县最早的党组织。同年，国共合作组建国民党临时县党部，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实行“二五减租”。4月11日，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夜，嵊县发生了捣毁国民党临时县党部的“四·一一”事件，张本芝、华伦初被枪杀，共产党员和共青团

张珂表纪念文集

员遭通缉。此后，嵊县的革命势力遭受严重摧残，革命转入低潮。

九一八事变以后，目睹国民党统治腐败无能、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消极抗日的现状，张珂表进一步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主张，坚定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为民谋幸福的信念，萌发了寻找党和加入党组织的迫切愿望。

1936年5月，嵊籍上海丝绸工人王寄松与同一支部的共青团员周云青回到家乡，在阅读了张珂表主编的刊物和所撰写的抗日救国文章后，特地与张珂表接触，交谈得甚为默契。周云青回沪后，在支部会上汇报了张珂表的情况。此后，该支部即开始与张珂表建立联系。同年10月，王寄松再次回嵊对张珂表做进一步考察。返沪后，上海丝绸系统共青团支部与张珂表的联系更加密切，不定期从上海给他寄来《向导》《校园时报》和党内的宣传小册子等进步读物，供张珂表学习和宣传。

1937年夏，张珂表与周飞、俞允之以会员身份应邀赴上海参加由薛暮桥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该会系党的外围组织）“暑期讲习会”。学习期间，张珂表等人一边认真学习科学知识和政治理论，一边想方设法多次联系嵊县在沪的进步青年与产业工人，寻找党的组织及党组织的联系人王寄松，但没有结果。

同年9月底，中共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派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党的联络员骆又余来嵊等地联络和检查工作，并带来了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和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负责人吴仲超“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的指示。骆到嵊后，王寄松（已由团员转为党员）向骆又余汇报了张珂表的情况，骆深入考察后，同意吸收张珂表入党，团员尹仲芳转为中共党员。9月底，在嵊县农工银行张珂表的宿舍里，骆又余作为党代表，王寄松为介绍人，吸收张珂表为中共正式党员，当晚成立了中共嵊县临时县委，王寄松为书记，尹仲芳为组织委员，张珂表为宣传委员，隶属于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

同年1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邢子陶来嵊开展建党工作。期间，邢子陶详细考察了嵊县抗日救亡和党组织的情况。1938年1月，经中共浙江省临工委批准，成立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王正山任书记，袁于田为组织委员，张珂表为宣传委员，黄公石为委员。同月，中共嵊县城区区委在县城建立，张珂表兼任书记。1938年6月，中共宁绍特委决定中共嵊县工委改为中共嵊县县委，邢子陶兼任书记，张珂表、王正山任副书记。

邢子陶在《纪念嵊县建党五十周年》一文中着重指出：“以张珂表为首的本县革命青年，包括学生、小学教师、店员、职员等，他们对嵊县建党起了很大作用”“自从成立县级领导机构以来，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逐步在工人和农民中建立党的组织，当时嵊县党是宁绍地区做得较好的县份之一”。

办刊结社 抗日救亡

张珂表考入嵊县农工银行以后，一直保持看书读报、撰文写作、广交学友、进取向上的良好习惯。他十分注重知识与理论的积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为更加有效地开启民智，广泛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他与上海“生活书店”“读书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发挥积极的引领作用。

1935年，他从上海“生活书店”购回一批进步书刊，举办流通图书室，组织同事和进步青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社会科学和左翼进步书刊。当年夏天，由嵊县、新昌两县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组成的抗日文化团体“南鹿学社”成立，张珂表担任理事并负责总务组，起到了实际领导者的作用。同时，他又创办“大众书店”，经销进步书刊，吸引和指导青年阅读，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为嵊县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张珂表纪念文集

同年10月，张珂表与志同道合的同事、好友陶秀拂等十几个店员、学徒组织了“明生读书会”，并由他主编在《剡声日报》副刊上附出“读书会”的《明生》周刊。由于发表的文章立论“新异”，引起了部分保守顽固分子的惊异和怀疑，出了几期就被迫停刊。后改名为《我们的园地》，仍由张珂表负责编辑，也因立论“新异”的原由，出到第四期又被迫停刊。

1936年10月，张珂表又担任《嵊新民报》副刊《焰影》编委，并将这一文艺刊物改造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文化营垒。1937年1月17日，上海救亡运动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被捕，张珂表义愤填膺，具名“章一民”致函苏州高等法院，申张正义，呼吁立即释放“七君子”。此后，他还担任《抗日自卫》周刊（后改为抗卫半月刊）和简报编辑，以此为舆论阵地，编撰发表文章，出版《抗战快报》等，宣传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思想。

1937年8月，嵊县抗敌后援会成立。中共嵊县地方组织为了争取以后援会的合法名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团结进步青年，锻炼和壮大党的力量，便设法通过民主人士等各种关系，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加入其中，张珂表进入后援会后，掌握了政训组的领导权。张珂表等先后组织了“第一流动宣传队”“第二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等宣传团体，把部分回乡的党团员、进步工人和本县城乡进步青年组织到抗日救亡宣传队伍之中。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嵊县城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宣传队伍足迹遍布城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珂



在《剡声日报》刊出的《明生月刊》

表等人还利用合法条件，以后援会名义主办《抗敌》周刊，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各地抗日救亡动态。

1938年2月，后援会更名为“嵊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下称“抗卫会”）。张珂表利用“抗卫会”的合法名义，团结进步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发起成立嵊县文化委员会，由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私立剡山小学校长裘翌芳担任文化委员会主任。该组织以动员全县文化人，提高全县人民的文化水准，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在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文化委员会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37年12月，张珂表与斯浪清、钱叔亮、刘章新等一批进步青年发起成立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简称“乡救会”）。乡救会是中共嵊县临时县委领导下的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救亡团体，不仅制定了会章、分会章、政治纲领、会员守则、组织活动等比较完整的一套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乡救会以联络救亡工作同志，共同促进乡村救亡活动，切实参加乡村救亡工作为宗旨。

1938年4月，乡救会创办了会刊《群力》半月刊，张珂表任主编。在《群力·创刊号》上，张珂表以笔名契如撰写并刊发了《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一文。该文开宗明义地提出：“我们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的群众在共同的纲领和目标下联合一致，对抗共同的敌人，才有绝对的把握。”随后，对建立联合战线的意义、重要性、基础条件等方面作了精准、明确的阐述。文章最后强调，在现在要巩固的扩大统一战线，一方面要加强深入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另一方面要推动群众的力量，来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因为只有实现民主政治，加强和展开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以（才能）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该文的及时刊发，在全县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动了统一战线工作。

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过程中，张珂表以扎实的文化理论功底、成

张珂表纪念文集

熟的领导艺术才华、过硬的组织协调能力，成为嵯县抗日救亡初期宣传与文化运动的先驱和领导者，被誉为嵯县的“救亡者之师”。

无私奉献 乐于助人

张珂表具有勤劳朴素、好学上进、勇敢坚毅、乐于助人的优秀品德。为了团结帮助进步青年、办会结社、寻找和筹建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等活动，在没有经费保障的条件下，他总是自己想方设法解决。

张珂表只是一个银行小职员，收入不高，家境也并不富裕。他的工资收入要养家糊口，日子过得很清贫，但只要同志、同事在工作和生活上有困难向他求助，张珂表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

全面抗战初期，在发动和组织乡救会、流动宣传队、业余宣传组期间，张珂表多次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充当工作经费。在结交进步青年时，他经常自己花钱购买进步书刊分赠大家，供大家学习。

有一次，中共党员竺曾撰家里来了一位党的负责同志，需要一笔路费，竺曾撰东挪西借只筹集了一部分，但是还少二十元。于是只好去找张珂表。这时张珂表刚刚发到工资十八元，便毫不犹豫地全部交给了竺曾撰。竺曾撰叫他留下几元，他说：“党的需要重要，还是个人需要重要！”又说：“你不用给我担心，我总会有办法的。”

回乡工人、中共党员钱松泉有事到县城张珂表处，张珂表一看钱松泉一副落魄的样子，便知道他生活上有了困难。当时张珂表手头恰巧也没有钱，于是就跑到附近的当铺，脱下自己身上仅有的一件毛衣，将典当来的三元钱，趁钱松泉不注意时全部塞进了他的烟袋里。

张珂表始终把党的事业和同志的冷暖放在心上，他总是无私奉献、助人为乐，而对于自己和家庭，在节衣缩食的同时，总是劝说妻子勤俭节约，压缩支出，以最低的生活条件精打细算度日过节。

革命为重 鞠躬尽瘁

张珂表以农工银行职员为掩护，白天上班，工作之余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晚上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大量工作都是在夜里进行的。他抱着革命志士“忠孝两难全”的意念，抱着对长辈和妻子儿女深深的负疚，全身心扑在革命工作上，从不讨价还价，只要革命需要，他总是拣重的担子挑。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领导职务以后，张珂表承担的工作更多更杂，任务更重更繁，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子夜十二时才能休息，有时甚至工作到次日凌晨，才匆匆打个瞌睡，白天又去上班。

长期通宵达旦、严重超负荷的工作之下，张珂表明显消瘦了，脸色难看了。他常常感觉浑身乏力，身体出现了病状。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张珂表依然没有考虑自己的健康状况，而是不舍昼夜的为党为抗日救亡忘我工作，以致身体每况愈下，病情越来越重。在同志和朋友们的再三劝告下，他才答应去宁波治疗。在病势危重之际，他仍念念不忘党的工作，还向医生和病人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

由于贻误医治，张珂表终因手术后伤口感染化脓导致病情恶化，于1938年10月31日，在宁波华美医院病逝。他英年早逝的噩耗传来，嵊新两县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及其党员、广大革命群众无不为之悲恸。在党组织的策划下，当他的灵柩运回之日，由专门成立的追悼筹备会出面，组织张珂表的亲属，中共党员和抗卫会的同志，抗日宣传团体、农工银行、汪集丰钱庄等单位的代表、同事以及生前友好，还有闻讯自发赶来的群众五、六百人，在嵊县汽车北站举行了极为隆重、悲壮的追悼会。在无比哀恸的氛围中，共同向一生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的张珂表志哀送葬，并激励全县群众抗日救亡的斗志。追悼会后，张珂表的灵柩在同志和同事们的护送下，安葬于嵊县独秀山麓。

张珂表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宝贵的生命献

张珂表纪念文集

给了党，献给了人民，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的革命意志、思想作风、道德情操与精神境界，得到身边无数同志的钦佩和崇敬，如今依然是新时代全体共产党员学习和践行初心使命，不断砥砺奋进的光辉榜样。

1951年，张珂表被评为革命烈士。202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为其颁发了烈士证明书。

(宣东明)



烈士证明书

遗作选辑

导 语

张珂表早期受进步文学和革命理论的影响，在社会生活和抗日救亡的宣传及革命实践中，曾写过很多文章、文件、书信，有过许多重要讲话，史料留存丰富。

本篇选辑了张珂表在《明生》《我们的园地》《抗敌》以及由他主编的《焰影》等刊物上发表的：《从生活的困难说到援助绥远抗敌军士的意义》《巩固和扩大民族联合战线》《流动宣传队》《会友们的动》等文章。

同时，我们从与张珂表一起战斗过的同事的回忆录中摘录相关言论。辑录了张珂表写给亲友的部分信札，如《珂表复给张春熙的信》《张珂表给妻子的信》等。这些内容集中反映了他的抗日救亡思想、文化理论水平和分析判断形势的能力，反映了他对同志、对亲友无私的关心和纯朴的爱，今天读来仍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从生活的困难说到 援助绥远抗敌军士的意义

契 如

亲爱的同胞：

现在各个人所过的日子不论是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或是管家私吃饭的，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谁都感觉到一年不如一年吧！这，你们会说，是“八字”，是“命运”。但真的是不是“八字”？是不是“命运”呢？我们肯定地说，不是的。那么倒究是什么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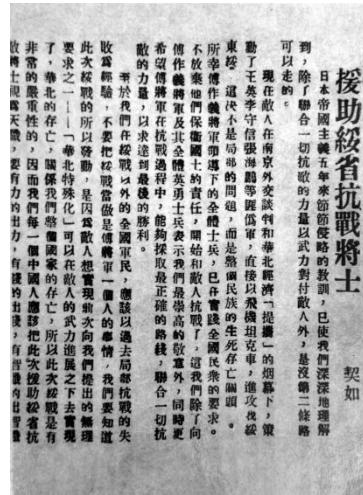
呢？我们可以肯定地回答你们：除了社会本身的经济结构不良以外，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在现在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侵略的缘故。

说起日本帝国主义，真使我们咬牙痛恨！自从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东三省，夺去了我们廿八个浙江省一样大的土地，三四千万的东北人民做了“亡省奴”，过着牛马都不如的日子。他们用不值钱的东西，交换去我们辛苦种出来的东西，更在中国内地开起了工厂，用便宜的工钱，招了中国工人替他们做工。做出来的东西，骗去我们不少的钱。这还不够，他们用强盗般的手段，把不纳税的东西，销到中国来；我们的工厂商店，因为受着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而且照旧要纳税，价钱无论如何卖不得他

们那样贱；所以，都弄得关了门，许多人失了业，没有饭吃。由于这样的原因，才弄得我们都没有好的日子过了。

但他们这样还不够，他们是必定要灭掉全中国，使全中国的人，都做他们的奴隶，才肯罢手的。果然，最近他们嗾使由他们牵着线的王英、李守信等匪伪军拿了他们的军器打进绥远了，幸亏我们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和傅将军领导的全数兵士，都个个不愿做亡国奴，同时不忍心全国的人民都做亡国奴，很勇敢地和他们抗战了！这是多么值得我们的钦敬！同时是应该怎样去援助他们啊！

绥远是我们的屏障，倘若绥远失了，那我们内地就更危险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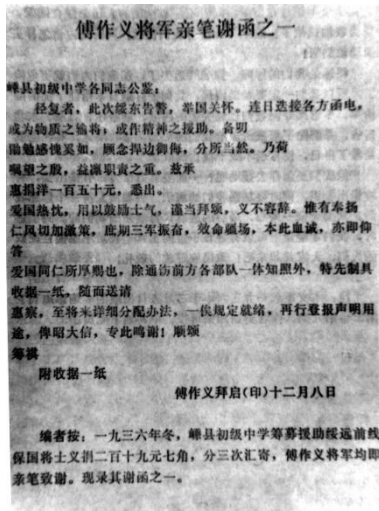


张珂表（契如）在《抗卫》半月刊上发表的文章

绥远，共同去打退在日本

指使下面的匪伪军，更进而夺回我们已经失去的内蒙、察哈尔、冀东、东北四省，并解除了暴敌所加给我们的锁链。援救绥远，实在也就是救了自己，使自己不致于做亡国奴。

但我们要怎么样去援助呢？一面要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有智识的出智识，同时要加强我们的组织，去和敌人拼一个你死我活。我们只要大家一条心，最后的胜利，自然是归于我们的。到了那时，



傅作义将军谢函之一

我们才能走上可以有好日子过的正常途径。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大家都起来吧！致民族解放的敬礼！

原载《焰影周刊》第二卷第六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流动宣传队

契 如

流动宣传队在城里演出两次之后，已在前一星期出发到乡村去做他们的工作了。他们固然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同时却也引起某一部分人的不满。

自然，他们还有许多缺点，需要克服，不过倘使一究他是什么样的物质条件下而产生这点成绩，那只要不是怀着别样心肠的人，是会加以原谅的。我认识他们的几个队员，曾经告诉我他们的大略情形，觉得写出来，介绍给热心救亡的同志们，是有一点意义的。他们组织的队员十五个人（里面三个是女队员）大多数是被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魔手打破了饭碗的失业工友，事实的教训，使他们理解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面目，同时他们更从实践中学习理论，政治认识的提高，比起一般知识分子，是要超过了许多倍的。在这伟大时代到来的时候，他们充满了为祖国服务的热情，可是在不合理的环境下面，使他们无处去运用他们的力量，经过许多的周折，才从后援会里领到了符号，于是成立起来了。

他们理解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唤醒民众，组织民众，所以决定组织宣传队；但他们感觉到在城市里已经有相当的宣传人员在工作着，又决定以各个农村做对象，到农村里做宣传，单单口头宣讲，是引不起农友们的兴趣，收不到什么效果的，所以再加以短剧和歌曲。

当初为着出发后顾到人家的招待，想限定不超过十个人，可是后来因事实上的需要，不得不再邀约和他们有同样热情的工友们，参加工作，

变成现在的人数（中间有因故退出，更有新的补充进去的）。

我已说过，他们大多数是失业工友，自然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在练习期间，既没有私人的帮助，更没有机关的津贴，伙食都由自己负担。因为大家都是穷光蛋，所以每天自己挑水，自己煮饭，吃的很苦，从他们平均每天每人九分多钱的伙食费来看，可以想见到艰苦的程度了。

他们的组织，在人事上分开四组，负责住宿勤务，在事务上分开文书、经济、交际三部，在事业上则分设剧务、歌咏、演讲三组，也各设负责人，而由队长总其成。

他们自从成立以迄出发，中间并不是怎样发生过裂痕，在经济上发生过困难，但终于由他们的努力，艰苦地克服过来，而能够和社会人士相见。

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些，所以介绍这些情况给读者，除了供读者参考外，更希望救亡的同志们，学习他们的艰苦和努力。同时也希望该队同志们本着过去的努力和艰苦，克服一切弱点，继续向前迈进，为民族的幸福而斗争到底！

原载《抗敌》周刊第十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廿一日

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契 如

我们要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必须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的群众在共同的纲领和目标下联合一致，对抗共同的敌人，才有绝对的把握。

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奠下了国共合作的基础，更经过全国民众的努力，统一战线得到初步的成功。但不幸有亲日派汉奸和托洛茨基匪徒的从中破坏，以及一般人没有完全理解统一战线的意义；各方面还表现出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以致未能巩固扩大，使抗日失利，民族遭到空前危机，这是非常痛心的事情。

对亲日派汉奸和托洛茨基匪徒，在主观上愿意做敌人的走狗，有意破坏统一战线，只有给以无情的打击和铲除；对于积极抗战而无意识的破坏统一战线，无疑的是因为没有完全理解统一战线的意义，所以对于统一战线的说明，还是十分需要的。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无限制的侵略，不但劳苦大众切身感受到剥削和压迫的痛苦；就是有产阶级也同样感到威胁（如被占领区域各种原料和交通的被掠夺，中国企业的被强制的“收买”，中国商业和银行钱庄的被排挤，中国农民和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等等），各阶层对于亡国奴的惨痛生活，有了共同的感觉，促使全中国的人民深切的了解；只有大家联合一致，对日本作最坚决的武装抵抗才是出路。这是统一战线基础的条件。

所以只要他是抗日的，或是可能抗日的，都应该用坚忍坦白诚恳的

态度去说服，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不使一分一毫的抗日力量，逃出抗日的阵线，这是争取抗战胜利的条件。

我们知道各阶层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有矛盾的；这点不能用统一战线来抹煞，而是要在不妨碍抗日的大前提下求得适当的解决（如改良人民生活等）；不过解决的方式，要用群众的力量推动，取得合法的手段来进行；同时各阶层对抗日的认识，应看各阶层的经济利益而互有差异，所以不能没有争论，而这争论，应该是教育大家提高大家的政治水平的过程，争论的态度，应该是说服，说服，再一个说服；有人以为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口号，以及内部的争论，是破坏联合阵线，这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扩大联合阵线。

在现在要巩固的扩大统一战线，一方面要加强深入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一方面要推动群众的力量，来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因为只有实现民主政治，才能使各阶层有自由发表他的主张，对各种问题，能在抗日的大前提下得到适当的解决，而加强和展开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原载《群力》创刊号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出版

会友们的动

契 如

过去参加抗敌后援会第一流动宣传队的会友，自从被X师X旅延搅以后，秉承旅长的意旨，积极担负起教育士兵的任务，提高了士兵抗敌救亡更坚强的意识，最近已开赴前线萧山去了，必要的时候，还准备随军渡江，直接去驱日寇出中国，这不但表现出参加流宣队诸会友的牺牲精神，同时也增加了本会无限的光荣！

现在改为宣传工作队话剧组的第二流宣队，自从得到生活津贴费以来，在表面上看，似乎他们的生活可以比过去改善了，实在却很吃苦。所以除了因为不需要乡间招待膳食，工作可以更顺利进行外，更获得了广大的同情和赞许。这里的成员，都是我们亲爱的会友，希望其他会友，更能给他们以多方面的帮助！

石山头分会，得到农业推广区里的会友周东乡、周士祥、金长祥、张璞君等的帮助，已开起X所夜校，每夜由农业推广区的会友不辞跋涉地担任指导，除了讲授战时读本以外，还相互分析时事，以及抗战中的一切问题。

东林分会自成立以来，就积极从事各项本会所规定的工作，如向群众宣传抗敌知识，督促恢复自卫组织等等。此外，还把会友分做几个小组，互相研讨抗战中的各种问题，讨论的办法，先由干事会决定讨论题目，经过讨论，作出结论，然后由每个干事去和小组会讨论。第一次的题目是生活问题。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引伸到抗日救国的上面，因此很能启发每个会友发言的兴趣，成绩非常良好。

长乐分会，除经常作集体主义的自我教育外，规定每星期出发乡间

宣传一次，他们已经出发过一次，地点是长乐附近的石下阳、石碓、上下南庄。希望以后能不断的不倦的工作下去。

本会宣传组组长金佩章，原任职嵊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经济组干事，现因另有他就，已于日前到长沙去了。

宣传组副组长童年时现任职奉化县政府，生活相当满意，据说将在公余之暇，积极从事救亡工作。总务组副组长周一松自在某训练班训练期满后，就被派至青田县任乡村工作指导员，环境相当良好，进行工作也很顺利。会友俞允之因学校功课太忙，无法从事更有意义的工作，满足他救亡的热情，已脱离学校被招至省抗日自卫委员会的政治工作队工作了。虽然在人才极端缺乏的嵊县，人才外流，是一种损失，但他们得到更有意义的工作，却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获得。

会友们在就地从事工作的：周丹虹任开元抗卫会政训组主任，周肖文任宣传工作队队长，丁海涛任安富乡抗卫会干事，袁雄泉、马以文、丁宗文、王正山、吴石民、姚中象六会友任嵊县政治工作队队员，吕荣昌、吕再岳、吕炎章、竺邦运、竺焕章、梁福祥诸会友任新昌县政治工作队队员，都表示愿在上级的领导之下，积极从事工作。

嵊县中学的同学们，在本会教育组副组长刘章新及该校教务主任钱希乃等领导之下，积极进行乡村的教育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现在已进行的有夜校及台门学校。

本会出版组副组长杨子真（时俊）前因要求深造，赴丽水战时青年训练团受训，现已期满返新，参加新昌政治工作队。

注：会友是指 1937 年冬由张珂表、刘章新、斯浪清等发起组织的“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不数月会员达七、八百人，出过四期《群力》。张珂表是该会的主要负责人和领导者。

原载《群力》第二期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张珂表言论选辑

编者按：许多纪念张珂表的文章里引用了他的原话，现将分散在这些文章中的张珂表言论作一辑录。

讲师来给我们讲课，我们不好好听，不仅对老师来说不大礼貌，而且是妨害我们自己的进步，因为到这里来的讲师，都是进步分子，他讲的内容总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退一步说，就是他讲的确实不好，甚至是讲错了，我们也应该仔仔细细地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他不好是什么不好，错又错在什么地方，可以使我们自己怎样去学习，怎样才能不错。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既善于从正面学习，又善于从反面学习。

——摘自周飞回忆文章

过去没有党的领导时，我们搞革命工作犹如在布满云雾的海洋中摸索前进，自从同上海的秘密组织有联系后，就像在东方升起了红太阳，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方向，但阳光还常常被万恶的大雾遮挡。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党组织，有了上级党的领导，这就好比是在阳光普照的晴朗的海面上破浪前进了，在这样好的环境里搞革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我们还能不好好工作啊？

——摘自周飞回忆文章

对付狐狸，要比狐狸更狡猾；对付野兽，要比它们的牙齿更尖锐，

打毒蛇必须抓它的三寸头，决不能放松！

——摘自商白苇回忆文章

我们要在这生死关头，联络一切不愿做奴才的各阶层的人民大众，为祖国的生命，为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人权的自由，在反帝（尤其是反日）反封建反汉奸的旗帜下联系起来。

（1936年10月《岷新民报》副刊《焰影》上的“卷首语”）

——摘自民政局纪念稿

我们是为了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时代，认识自己而读书，换句话说：就是为探求真理而读书，而不应该为消遣而读书，也不应该为读书而读书，更不应该为升官发财而读书。

（1936年《明生月刊》上发表的《为什么要读书》）

——摘自民政局纪念稿

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反映在书上面，也跟着有两种绝对不同的内容。因之所有的书籍，不都是好读的；它有指示我们认识真理，促我们向更高级的生活上去的；也有暗示逃避现实，送我们向坟墓里面去的！

（1936年《明生月刊》上发表的《为什么要读书》）

——摘自民政局纪念稿

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决不会停滞在某一阶段上面的，因之，我们的认识，也需随物质的发展而展开，书自然也需继续不断地读，决不能求了一点就自满。

（1936年《明生月刊》上发表的《为什么要读书》）

——摘自民政局纪念稿

张珂表纪念文集

我们将读书作为认识真理的手段，因之，在同一目的上，我们听人家的演讲和谈话，和读书是有同样意义的。

（1936年《明生月刊》上发表的《为什么要读书》）

——摘自民政局纪念稿

同志！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报仇，更不能感情用事，一切要以民族利益为重，人民的最高利益为重，放蒋介石回南京，能联合南京政府共同抗日，对挽救民族危亡，对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是极为有利的。

——摘自周飞回忆文章

你们完成了建党计划很好，我一定好好疗养，争取早日去为党工作，党的事业需要我们去大大发展啊！

——摘自周飞回忆文章

你想走文学的道路很好。文学艺术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是可以为人民事业服务的，我支持你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文学艺术是反映客观现实，而且是为变革现实服务的。这就有个正确认识和正确反映现实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和反映现实，就非靠社会科学不可了。因此，我劝你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一定要看些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这样，你的作品才能正确反映现实，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于广大人民群众有益。

——摘自周斯明回忆文章

你们三个人由于出身不同，社会地位各异，生活经历也不一样，所以思想、作风也就各不相同。X X出身好，又做过工人，有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工作踏实，生活俭朴，作风也好，虽然文化水平低一些，但今后的成就，我看比你们两个大一些，他的身上有许多你们缺乏的东西，

很值得你们学习。这样讲，你和X X目前可能接受不了，但这都是事实。至于你，有不少优点，但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感情比较脆弱，作风也不够踏实，改造起来难度可能要大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敢不敢面对现实，敢不敢正确认识自己的不足，能不能认真改造自己。

——摘自周斯明回忆文章

X X优点很明显，到现在为止，他的成就似乎比你们大一些，才气也多一些。但也受旧社会影响很深，自视又很高，很不容易正确评估自己，改造的难度恐怕比X X和你要更大一些。不过，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总是可以改造成一个真正革命家的。

——摘自周斯明回忆文章

（许多关心珂表健康的同志都劝他要减少工作量，增加睡眠和休息时间。他总是笑笑说）没有问题。我怎么能把应该由我完成的任务推到别人身上去呢？抗战时期，大家都在紧张地工作，我也应该紧张一些才对。

——摘自周斯明回忆文章

珂表复给张春熙的信

承你过访，很为感激，但因为我行里有事，既不能招待，又不能畅快地谈，又感到歉疚和怅快！

中日战争，已无可避免地开始发动了！这给我们的自然是兴奋和快慰，但我们所以希望反侵略的战争早日开始，是为我们可以不做亡国奴，不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榨取。我们要保证中国的最后胜利，必须唤醒民众，使全国民众自动地参加各方面的抗战。这一责任，我们是无法躲避的；我认为你在村里可以做的，首先是出壁报；次之，向村民聚集的地方，和他们谈些日本侵略我们的暴行，及做亡国奴的痛苦，使他们理解日本侵略和他们生活的关系，想你是必很愿意做的。（我已叫报



社按日给你一份《立报》，壁报和谈话的材料都可取于《立报》）我有一点奢望：就是要把新从上海回来比较对国事积极的工友们组织起来，使他们有意识地

推动各个村庄的救亡运动，想你必很赞同吧！你有认识，而比较认识的友人，请你写信和他们商量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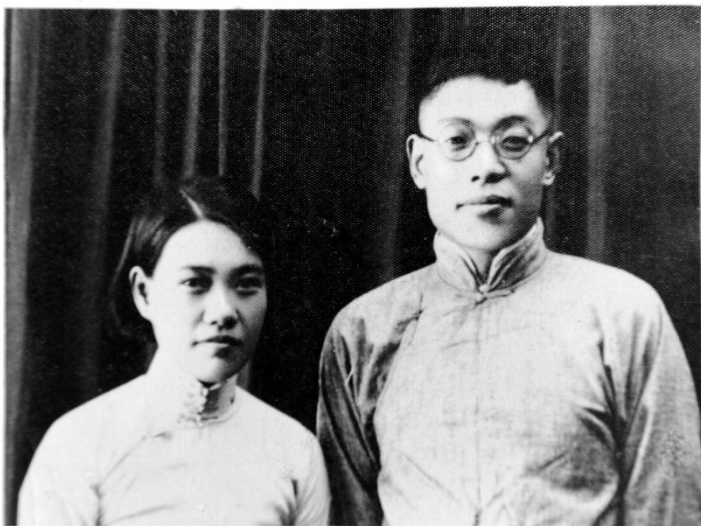
余再谈。祝好！

珂表 8.14

注：此信可能写于1937年，张春熙系烈属，石璜公社大明寺根（今石璜镇寺新村）人，是张珂表的同村人。

张珂表给妻子的信（节录）

你愿与母亲互换寝室，此意正和我同，苟能常常这样用心，必能博得母亲的欢心，而不负我娶你的原意哩！我更意思告诉你，就是许多妹妹是母亲所爱怜的，则



于孝敬母亲之外，尤该好好的待她们，那末（么）一家人才能永远地和睦，而得到人生无上的乐趣，并可以安慰为生活所驱迫出来的我。

母亲劳瘁一生，体质本弱，近发牙痛，想是劳苦过度，虚火上升之故，不识饮食如常否？望妹勤劝加餐早眠，当有效验，我在外日多，不能常待堂上，终须赖我妹调护哩。

我上对父祖，不能尽孝养之职，下对弟妹，不能尽爱护之道，又那（哪）能够教导你，不过像我妹的贤慧（惠），自然能付我所望的，但是果能恕己而行，循理而动，后于权利，先于义务，慎于言语，勇于反省，如此庶乎可以望和睦于万一！

一个人生存着，除了没有知识和呆的人以外，没有一个是没有忧愁，但是有忧愁是不要紧，而不可竟是想着做人没有趣味，望你一切都看开一些，自寻一点快乐，你该知道我们的生趣是连牵着的，你忧我便不能乐，我忧你便也不能乐的。



张珂表夫妇和儿子

夫妇是终身的伴侣，关系于人们的幸福是很大的，所以是该相敬相爱的，有过失固是应当互相规劝，但是言语之间，必须取平善的态度，决不可自以为夫，自以为妇的，我们有时未免要跳出这点范围，该大家思改去了的。

你有不合我的时候，便要多嘴，这犹是你有疾病，我必要用药来医治你，不忍置之不理，你有过错，我要来规箴你呢！

昨天接到你的信，说我能不恋别人，你虽贫犹乐，你能处贫而乐，也便使我心里快慰得很，所谓贫贱夫妇，自有至乐，不觉忘了贫的苦痛。

你常常娇嗔我常常来诫训你，实在话起来，一则是因为你是我的终身伴侣，遇到你有错误，不觉就要来纠正你，出于情不自己，非对你有深怒痛恨，一半也为了穷的缘故，对于一切，未免多了许多迂谈，有时我也想，你买几尺布，几件装饰的东西，果是做富人的妻子，也是平常的事情，何致要听许多话呢，我虽很可怜你来做我的妻子，本不该来说你，但是为要求你的谅解，并求二人志趣的相同，又不得不告诫你，你能了解这点意思吗？

我对于负担，自己也觉得很重，但是能够一家齐心协力，和和睦睦，

张珂表纪念文集

快快乐乐，便一生做牛做马，也很是心愿，所以我是并不忧愁，只是一家有了一个人不快乐，便连带着要忧闷，像祖父的忧愁，和你的悲苦是，望你快忘掉了“做人没味”的一句话，可减少我一点不适。

在家时候，遇到我有痛苦，你总是很悲恻而慷慨地说：“你有痛苦，比我自己的痛苦，要加倍的痛苦，恨不能代你痛苦。”我何曾也不是这样，你有痛苦，我虽快乐也不快乐，你能快乐，我就是痛苦还能找到快乐，所以大家保持身体的康强，修养心神的安适，不独为己，且不异是为人哩！

家中银钱，我也知道窘急，但是薪水已预先领了，向人支借，亦非易事，故只好急在心里……

用款大别可分为四项，一是柴米，二是家中另（零）用，三是礼尚往来和一切人情的应酬，四是我的另（零）用，虽说是省无可省，但是这样下去，岂不是永远被债负二个字做牛做马吗？生产既不能增加，那末（么）只好在无可省的当中，极力从俭，那（哪）可浪用一个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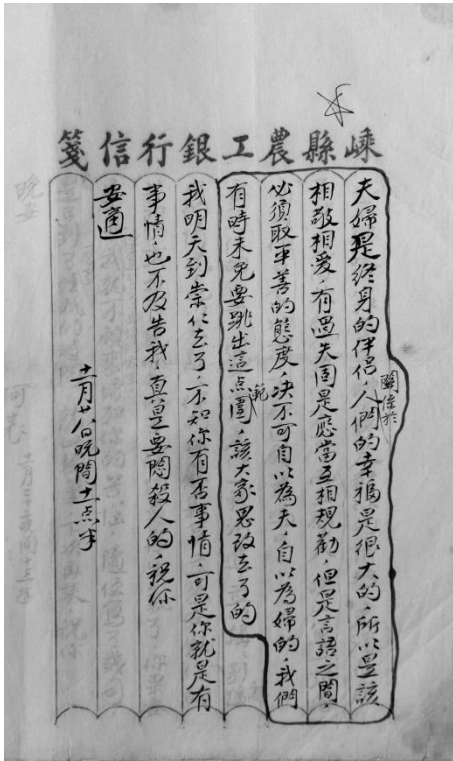
你来嫁我，真太可怜！但是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好望你不必过於悲愁，穷人固然有心事，富人也未尝没有心事，总之天下少十分如意的人。

我请求你们对于金钱，要考虑过了再用，不是我有钱而不肯给你们用，乃是为了没有钱，不独自己没有钱，连借贷都不容易的缘故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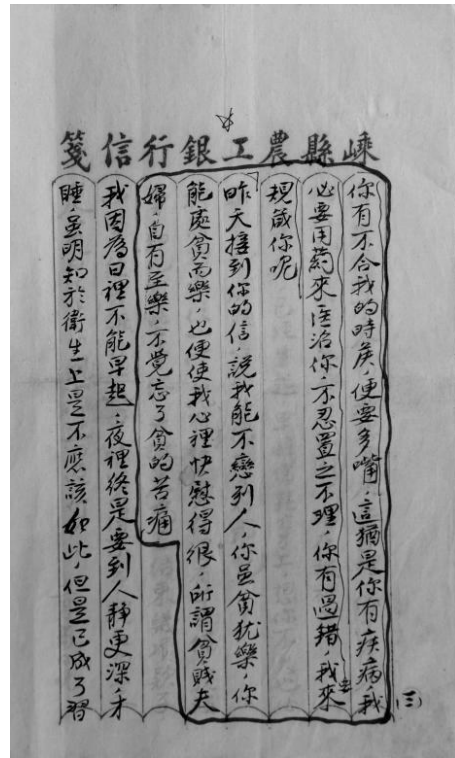
对於教育儿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照我现在的意见，最要紧的是要将他们的活泼泼的精神，不给他们摧残掉。

用强制手段去禁止儿童的行为，固应绝对废除；至于这本书里讲到奖励儿童的行为，在我觉得只好偶一为之，并不是可以常常使用的。

今天由申报图书馆寄到儿童教育书一种，我就大略地把他看过一遍，就大体讲，是还可以，但也有不少不正确的地方（如对于我国古圣贤的格言，过于信任）；你看这本书，要批评地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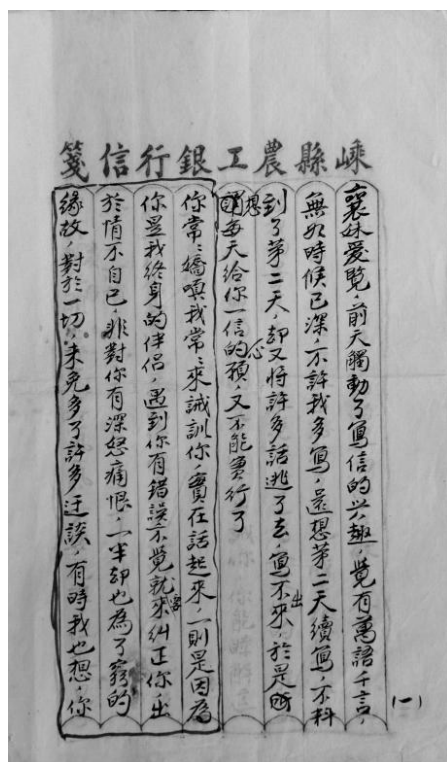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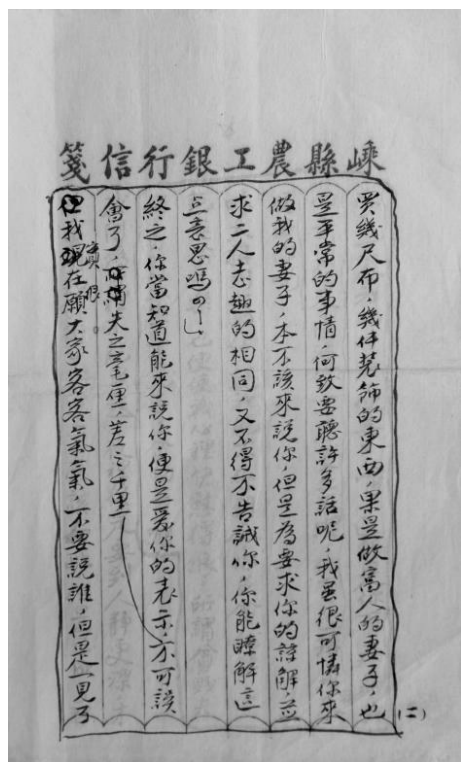


夫妇是终身的伴侣，关系于人们的幸福是很大的，所以是该相敬相爱的，有过失固是应当互相规劝，但是言语之间，必须取平善的态度，决不可自以为夫，自以为妇的，我们有时未免要跳出这点范围，该大家思改去了的。



你有不合我的时候，便要多嘴，这犹是你有疾病，我必要用药来医治你，不忍置之不理，你有过错，我要来规箴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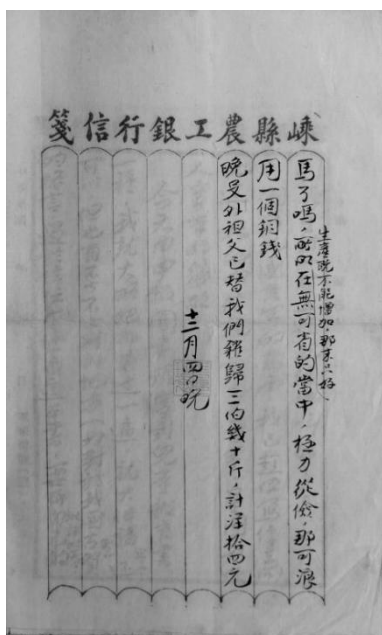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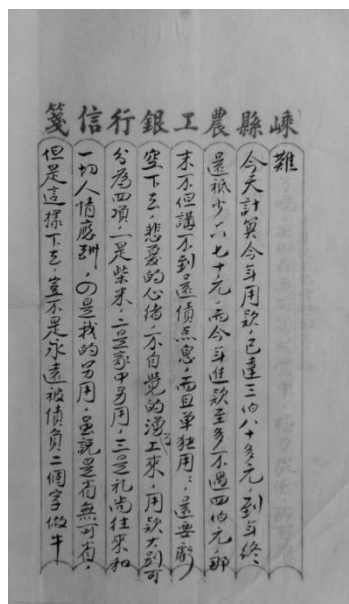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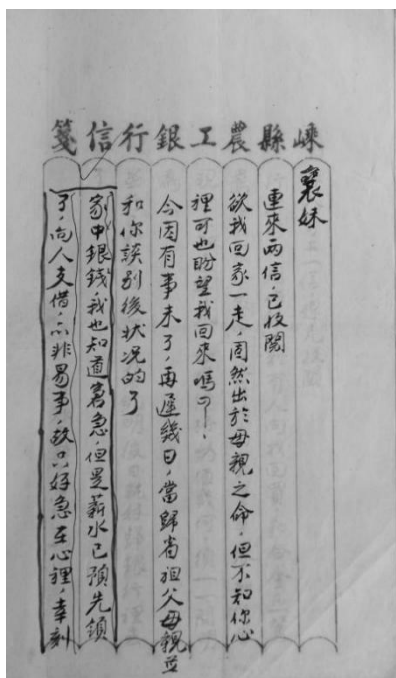
昨天接到你的信，说我能不恋别人，你虽贫犹乐，你能处贫而乐，也便使我心里快慰得很，所谓贫贱夫妇，自有至乐，不觉忘了贫的苦痛。



你常常娇嗔我常常来诚训你，实在话起来，一则是因为你是我终身的伴侣，遇到你有错误，不覺就要来纠正你，出于情不自己，非對你有深怒痛恨，一半却也為了窮的缘故，對於一切，未免多了許多迂談，有時我也想，你買幾尺布，幾件裝飾的東西，果是做富人的妻子，也是平常的事情，何致要聽許多話呢，我虽很可怜你来做我的妻子，本不该来说你，但是为要求你的谅解，并求二人志趣的相同，又不得不告诫你，你能了解这点意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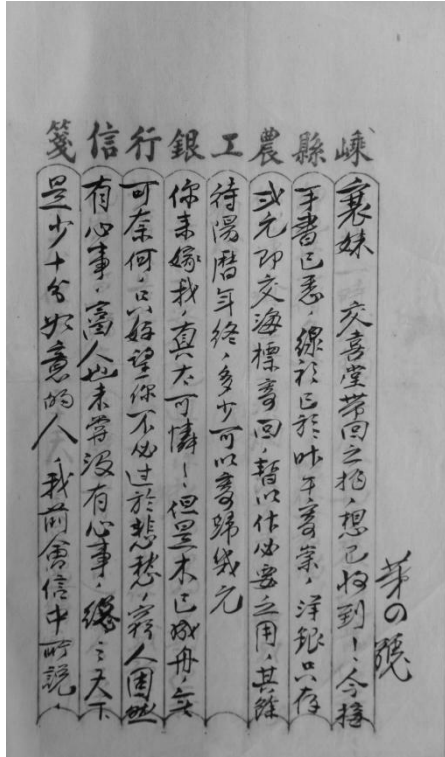
张珂表纪念文集

家中银钱，我也知道窘急，但是薪水已预先领了，向人支借，亦非易事，故只好急在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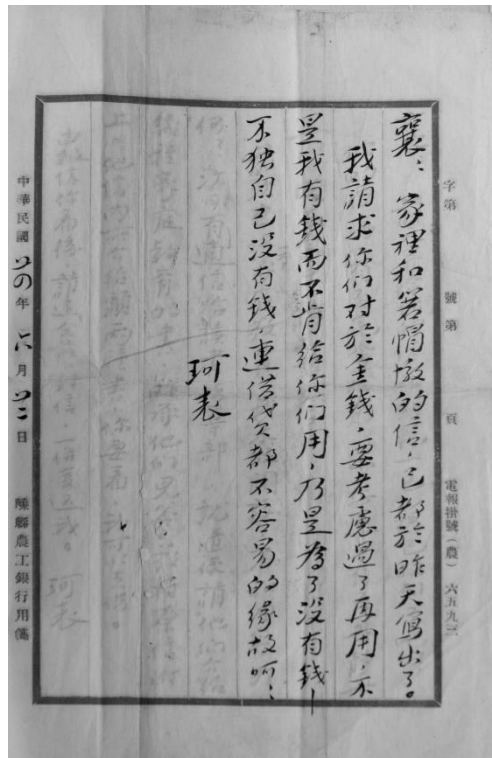


用款大別可分为四项，一是柴米，二是家中另用，三是礼尚往来和一切人情应酬，四是我的另用，虽说是省无可省，但是这样下去，岂不是永远被债负二个字做牛做马了吗，生产既不能增加，那末只好在无可省的当中，极力从俭，那可浪用一个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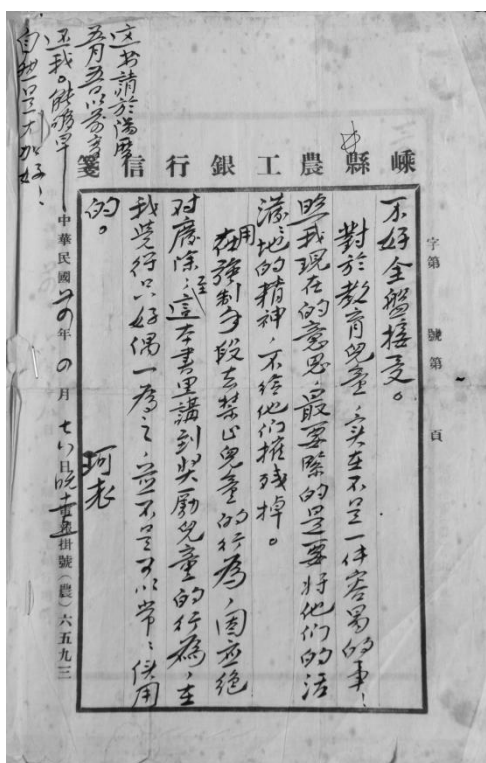
你来嫁我，真太可怜！但是木已成舟，无可奈何，只好望你不必过于悲愁，穷人固然有心事，富人也未尝没有心事，总之天下少十分如意的人。



我请求你们对于金钱，要考虑过了再用，不是我有钱而不肯给你们用，乃是为了没有钱，不独自己没有钱，连借贷都不容易的缘故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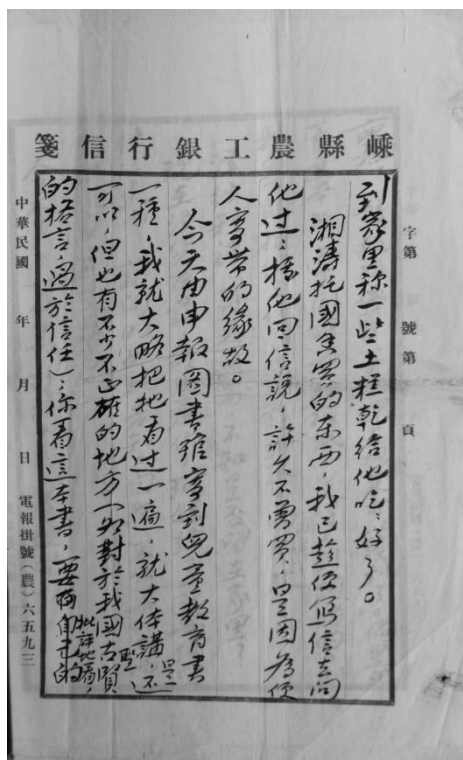


张珂表纪念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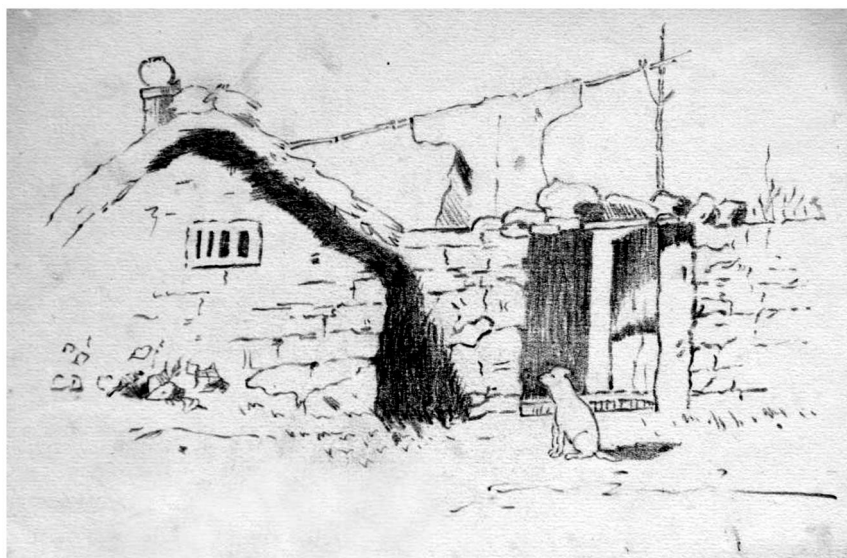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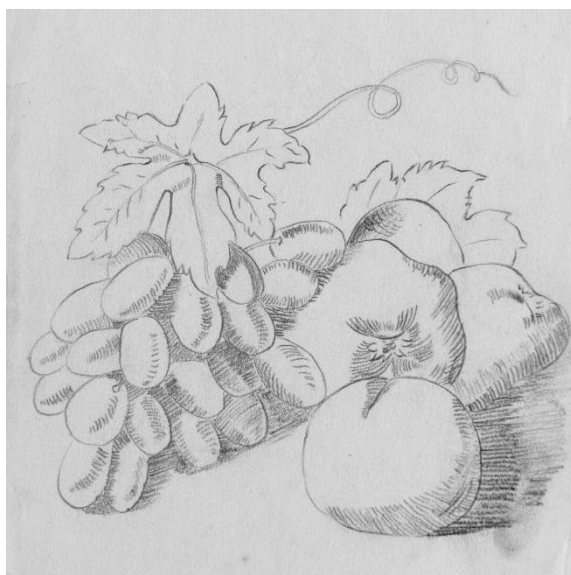
照我現在的意思，最要緊的是要將他們的活潑的精神，不給他們摧殘掉。

用強制手段去禁止兒童的行為，固應絕對廢除；至於這本書里講到獎勵兒童的行為，在我覺得只好偶一為之，並不是可以常常使用的。



今天由申報圖書館寄到兒童教育書一種，我就大略把他看過一遍，就大體講，是還可以，但也有不少不正確的地方（如對於我國古聖賢的格言，過於信任）；你看這本書，要批評地看。

张珂表绘画作品选



张珂表纪念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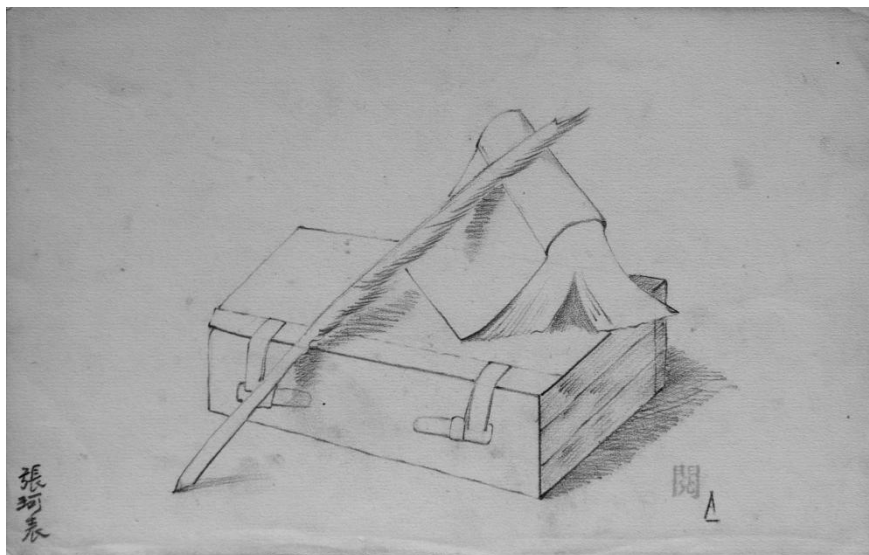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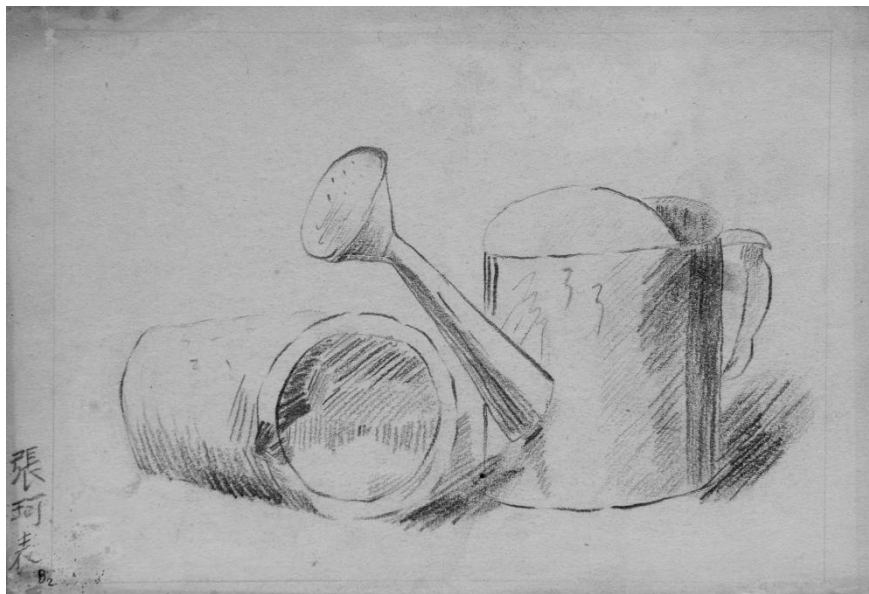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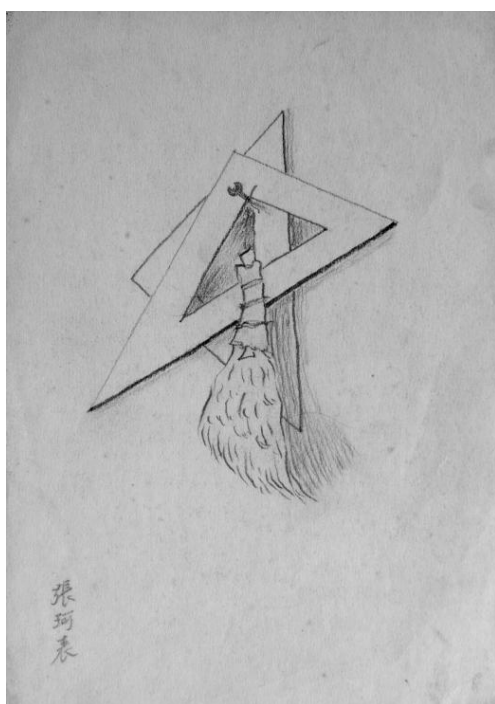
张珂表纪念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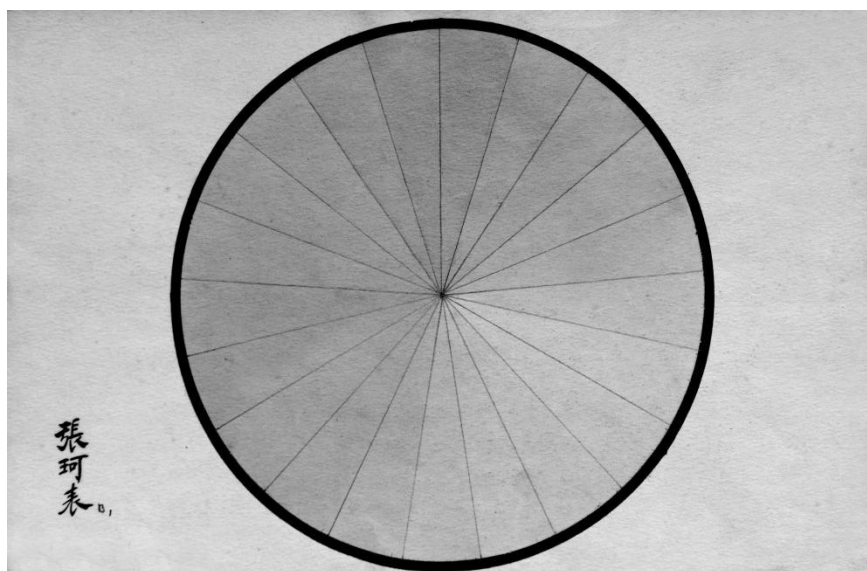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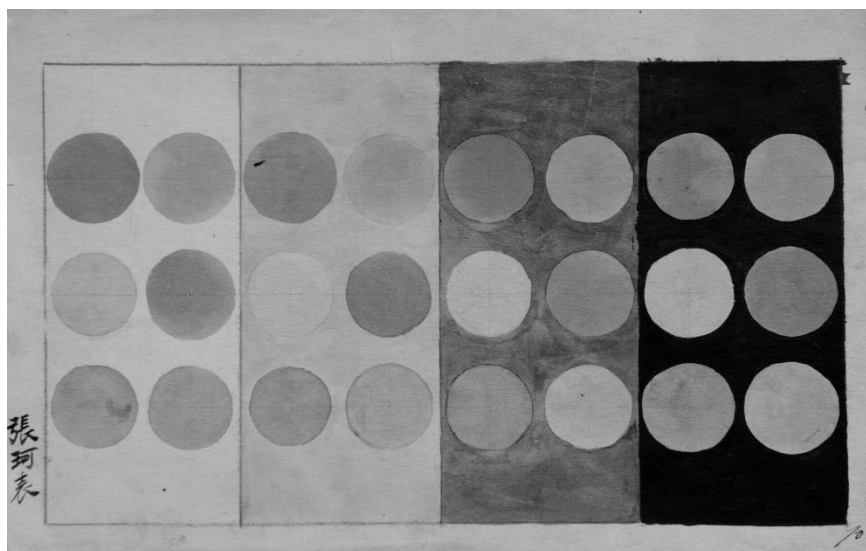


张珂表纪念文集





张珂表纪念文集



文献辑存

导 语

九一八事变后，张珂表更加关注国家的时事政治，关切中华民族的命运，关心劳苦大众的生活，义无反顾地拥护和追寻中国共产党。他团结引导进步青年、社会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组建南鹿学社、“民生读书会”，探讨和宣传民主革命和抗日救国思想；主编《剡声日报》副刊、读书会《明生》周刊等进步报刊，创办大众书店和群力书店，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赴沪参加“中国农村经济讲习会”，一边学习，一边寻找党组织；主导并组织嵊县文化委员会、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嵊县第一与第二流动宣传队、嵊县城区业余宣传组等，大力开展宣传活动。在张珂表的推动下，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取得卓有成效的业绩，为重建中共地方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中共县级党组织的建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节选）

1937年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和杭嘉湖沦陷区的失业工人、失学青年以及文化界人士络绎回到家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嵊县就有不少回乡的工人和学生。他们之中有的是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回乡开展党的工作的共产党员。

1937年1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嵊县先后建立起了临时县委、县工委、县委和中心县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一、张珂表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张珂表，又名契如，嵊县农工银行职员，中共嵊县党组织的积极组织者和领导人。1908年3月出生于石璜寺根村。1923年考入杭州商校，肄业后，于1924年考进嵊县农工银行。他在工作之余经常阅读进步书刊，深受新思想新文化影响。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于家乡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与上海共产党组织主办的生活书店、读书会取得联系后，开始接触党的组织，购置进步书刊，创办流通图书室，组织明生读书会，主编《剡声日报》副刊——读书会周刊《明生》《我们的园地》等，宣传民主革命思想。1936年10月，担任《嵊新民报》副刊《焰影》

编委，编撰文章宣传抗日救亡。同时，创办“大众书店”，经销进步书刊，吸引和指导青年阅读，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为嵊县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37年初，张珂表闻讯上海救亡运动领袖邹韬奋、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便化名章一民愤然致函苏州高等法院，申张正义，呼吁立即释放“七君子”。同年夏，应邀赴上海参加由薛暮桥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讲习会学习。回县后，与钱叔亮、斯浪清等发起组织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创办“协进会”会刊《群力》（半月刊），宣传党的抗战方针，报道各地抗日救亡动态。1937年9月，张珂表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嵊县临时县委宣传委员。1938年1月任中共嵊县工委委员，6月任县委副书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他以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组负责人的合法身份，编辑《抗日自卫》周刊和《抗战快报》，大力宣传抗日救亡。为了广泛团结进步知识分子，为抗战文化工作服务，与钱叔亮、陈午韵（陈静之）等于1938年2月发起组织“嵊县文化委员会”，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增强抗战力量。他还领导县第一抗日流动宣传队、第二抗日流动宣传队和城区业余宣传组，上山下乡，走村串户，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在全县城乡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宣传抗日形势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在县前街开设“群力书店”，经销进步书刊和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此外，他还在团结回乡工人和各阶层进步知识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为地方党组织培养了一大批骨干。由于成年累月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积劳成疾，于1938年10月31日病逝于宁波华美医院，终年30岁。

张珂表是嵊县抗日救亡运动中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逝世后，11月13日，县里为他举行了由各阶层人士数百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大会是在县党部大厅举行的。当迎接灵车的队伍从东门外汽车站，经襟带门

张珂表纪念文集

外大路到县党部时，沿途上万群众出来瞻望，有的含泪送行。参加追悼大会和送葬的有中共嵊县地方党组织和县抗卫会的代表，有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农工银行、储蓄银行、汪集丰钱庄等单位的代表、同事以及生前好友、各界群众等。在哀悼张珂表的大会上，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激励群众抗日救亡的斗志和情绪。在灵柩运往独秀山麓安葬时，送葬队伍沿途不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张珂表同志精神不死”等口号。

还在1936年5月，在上海做工的嵊籍青年王寄松与在同一支部的共青团员周云青回乡探亲。他们接触了张珂表办的刊物及所写的抗日救国文章后，特地走访了张珂表，交谈抗日救亡工作，互相谈得甚为默契。周云青回沪后，在支部会上汇报了张珂表的情况。此后，该支部即开始和张珂表建立联系。这年10月，王寄松又回嵊县，便经常跑到离家不远的农工银行张珂表住处，交谈抗日救国读书会的活动以及对共产党、对党的抗日主张的认识。这时，张珂表向王反映了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此后，王寄松对张珂表联系密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张珂表通过阅读由上海党组织寄给他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对党的性质和目的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张珂表废寝忘食地学习了大量进步书籍，每晚宿舍里的灯总是亮到深夜，不过12点是不睡觉的。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以及高尔基的《母亲》等许多进步书籍，张珂表都看过。他还长期自费订阅《生活周刊》《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国农村经济》等进步刊物。这些情况王寄松也越来越有所了解，认为张珂表不仅追求进步，还具有分析形势的能力，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活动能力。还感到张珂表写的文章观点鲜明，通俗易懂，很有说服力，在嵊县进步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中很有威信等。对于这些情况，王寄松进一步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

报。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根据王寄松等反映的情况，指定由王寄松与张珂表保持经常联系。以后王寄松经常不定期地寄给张珂表《校园时报》《向导》和党内的宣传小册子等书刊，联系不断。

随着全国抗日爱国运动的蓬勃开展，国内的整个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在形成中。这时的张珂表，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理解和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期间，他和一些经常接触的进步青年，常常议论如何在嵊县建立党的组织的问题。

1937年暑期，上海“农村经济研究会”来函，通知张珂表、周根福（周飞、周一松）、俞允之去沪参加该研究会举办的“暑期讲习所”学习。为了在嵊县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学习期间，张珂表同周飞两次跑到南市区一条小弄里去找党组织和王寄松，但没有找到。后来他们又通过在上海做工的同乡竺邦运等一些关系寻找，也未能找到。一天，周飞找到同乡俞仲光家，正好丝绸系统党的组织在那里召开支委会，嵊籍上海宝丰绸厂共产党员张增焕（张平山）也在开会，但他们当时都不认识周飞。周飞在回答了到上海参加讲习所的情况，并留下嵊县农工银行张珂表的地址后，即离开了俞仲光家，错过了一次好机会。讲习所学习结束后，三人继续留在上海找了一段时间，但还是没有结果。正在商量怎么办的时候，县里因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的需要催张珂表迅即返县。经商量，认为周飞曾在上海做工，对上海环境比较熟悉，便决定张、俞两人先行回县，由周飞留沪继续寻找党的组织和王寄松。周飞留下后，考虑最好在沪找一份工作，以便有较多的时日完成找党的任务。这样，他又去和曾经在一起当过绸厂工人的美亚第九丝绸厂的竺邦运商量，通过竺邦运的介绍进了美亚九厂，一面做工，一面继续找党的组织。不久，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局紧张，周飞去找薛暮桥等人商量，薛的意见是：现在上海时局紧张，当前工作重点在农村，抗战局面已定，你还是回农

张珂表纪念文集

村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于是，周飞也没有留沪多久，于8月底回嵊。

二、临时县委的建立

八一三战事后，上海美亚丝绸十厂罢工总代表、中共党员王寄松受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的派遣，回嵊开展抗日活动和建党工作。

王寄松，原名成季松，嵊县城区人。1936年5月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

1937年8月王寄松回嵊后，到9月下旬，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党的联络员骆又余来嵊找王寄松联系，并带来了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和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负责人吴仲超关于“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的指示。骆到嵊后，王向骆汇报了张珂表的情况，并建议：张珂表已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吸收他入党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在嵊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另外又提出上海回乡工人共青团员尹仲芳，出狱后经过一年多的考察，证明是忠于党的，可以转为中共党员。骆对于王寄松的汇报表示同意，并建议成立临时县委。9月的一天晚上，在农工银行张珂表的宿舍里，骆又余作为党代表，王寄松为介绍人，吸收张珂表为中共正式党员。随后，共同学习了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并研究了党的工作。当晚，成立了中共嵊县临时县委，指定王寄松担任书记，尹仲芳为组织委员，张珂表为宣传委员，隶属于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领导。

三、县工委的建立

1937年1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杭州皮市巷成立。不

久，省临工委组织部长邢子陶来嵊考察党的抗日救亡工作，并着手开展建党工作。1938年1月，在邢子陶的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隶属于省临工委领导。

邢子陶，长乐镇沃基村人。1933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因领导上海工人罢工而被捕入狱。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后被释放出狱，即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指派回浙江开展党的工作。

邢子陶到家乡嵊县后，详细考察了嵊县抗日救亡和党组织的情况，并到当时已成为嵊县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县农工银行，找救亡活动的领导人张珂表了解情况，商谈抗日救亡工作。还在西后街养老堂内租了一间房子，作为省临工委的临时联络处，以便开展建党和救亡工作。在这期间，邢子陶通过考察和了解，发展了一批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入党，地域包括城区、嵊西、嵊东和三界等地。在此基础上，于1938年1月，在邢子陶主持下，成立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由王正山（王明远）任书记，袁于田（袁庸泉）为组织委员，张珂表为宣传委员，黄公石（黄德璿）为委员。党的工作以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除了继续领导县抗敌后援会第一流动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外，还组织领导后援会第二流动宣传队和城区业余宣传组，在全县城乡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临时县委、县工委在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先后在第一流动宣传队、第二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群力书店、剡山小学及东坂庄、故江、东郭、东林、开元、山口、长乐等地建立了党支部。并根据党员的分布地区建立了嵊东区委（丁友灿担任书记，后为张平山）、嵊西区委〔杜玲君担任书记，后为周斯明、陈布衣（裘祖恩）〕、城区区委（张珂表兼任书记，后为钱叔亮、竺曾撰、张纯奎、周孟夫）。在嵊西区委，还先后设立开（元）长（乐）太（平）分区委（书记陈布衣）、水竹庵分区委（书记陈布衣）、山口分区委（书

记钱樟泉）、下西分区委（书记徐巴盾）。党的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

四、县委和中心县委的建立

县委和中心县委是在中共宁绍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建立的。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浙江省临工委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关系中断。次年1月，省临工委派邢子陶去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找长江局汇报工作。这时，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已经成立，长江局把浙江的关系转给东南分局。邢子陶向东南分局书记项英和组织部长曾山汇报了浙江的情况，东南分局为了加强浙江党的领导，派顾玉良到浙江工作。2月，顾玉良、邢子陶同回浙江，省临工委改组为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领导成员作了调整，顾玉良为书记。顾到任后，曾与省工委组织部长邢子陶等到嵊县了解工作情况。2月底，东南分局派曾山来浙江，传达中央和分局的指示，决定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省临时省委，并于5月7日在浙南平阳县临时省委成立会上，决定成立浙南、处属、台属、宁绍和金衢5个特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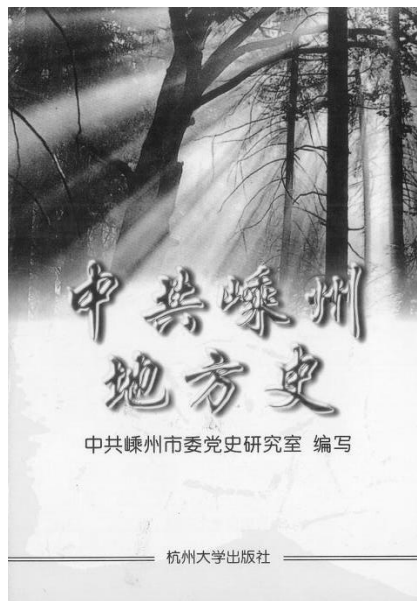
会后不久，顾玉良、邢子陶、杨思一、高子清（王文祥）在长乐镇沃基村邢子陶家的小阁楼上秘密开会，成立中共宁绍特委，由顾玉良任书记（后为杨思一），邢子陶、杨思一、高子清为委员。会议决定特委机关设在邢子陶家。后又在县城白莲堂弄县抗敌后援会政训组负责人陈午韵家设立秘密联络点。特委设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邵明；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月珍；职工委员会，书记马青。后又陆续增补顾春林、竺扬、魏文彦、马青等为特委委员，谢廷斋为候补委员。

宁绍特委管辖嵊县、新昌、上虞、诸暨、余姚、萧山、绍兴和宁波、定海、镇海、宁海、慈溪、奉化等县（市）党组织。

在宁绍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嵊县党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城

镇或农村，许多地方建立起党的支部组织，党员数量发展很快。为了适应这种形势，1938年6月，中共嵊县工委改为县委，邢子陶兼任书记，张珂表、王正山为副书记，张璞君（骆宾基）、杜玲君、袁于田、周飞为委员。同时县委设立了工作机构，有组织部（部长袁于田）、宣传部（部长张璞君）、妇女部（部长杜玲君）、青年部（部长周飞）。

当时，新昌县党的工作也有很大发展。对于党的工作和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嵊、新两县都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便于领导和开展嵊、新两县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1月，宁绍特委决定把中共嵊县县委扩建为中共嵊县中心县委，管辖嵊县和新昌两县党的工作。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建党（节选）

王寄松

九一八日寇铁蹄蹂躏了祖国整个东北，卖国的蒋介石政权推行“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更助长了日寇亡我的野心。祖国的垂危，唤起千百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觉醒，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他们前赴后继，反对国民党政权的倒行逆施，在全国掀起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

故乡，嵊县农工银行的职员张珂表，他爱读进步书刊，受新思想的熏陶，热爱祖国，在国难当头之际，迸发出抗日救亡的满腔热情，他团结了嵊县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有学校的教员，银行、钱庄的职员，中学生），组织了救国读书会——南鹿学社。通过这个组织，他大量传播进步书刊，座谈时事，不定期出版会刊。同时，借《嵊新民报》《剡声日报》的副刊撰写了大量抗日救国的文章，在嵊县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和同一支部的共青团员周云青回嵊，阅读了他们的刊物，走访了珂表，交谈了抗日救亡运动，甚为契合。周回上海后，向支部汇报了这个情况，支部开始和珂表建立了联系。十月我回嵊，农工银行离我家很近，经常和珂表接触，共同交谈抗日救国读书会的活动，对共产党，对党的抗日主张的认识，他对我还反映了对党的迫切追求。通过交谈，我对他的印象是：他读过《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的著作，对党的性质和目的有了一定的认识，当时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大众哲学》，高尔基的《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西行漫记》等进步书籍，他都看过。他长期订阅《生活周刊》《读书生活》《世界知识》《中国农村经济》等进步刊物，他有分析形势的能力，对党提出的抗日主张是积极拥护的。他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和组织能力，社交广，和嵊县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也有一定的关系。为人和蔼可亲，善于团结各种人。他写的文章观点明确，通俗易懂，很有说服力。在嵊县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中很有威信，他是团结的核心，他还加入了上海薛暮桥主办的“中国农村研究会”并成为会员，和上海“生活书店”王太雷有购买进步书报的联系。我向共青团组织汇报了他的情况后，了解到王太雷也是共青团员。团组织决定我们支部和他保持联系。不定期给他寄《救国时报》《向导》和党的宣传小册子等党的刊物。

一九三七年初，我由团转党。参加了上海丝织工人罢工，是工人总代表之一，不仅失业，还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党认为抗日高潮即将到来，要我回乡避难，同时通过张珂表团结进步力量，开展嵊县抗日救亡运动。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后，我回到嵊县，当时嵊县两股势力斗争十分激烈。一股是以嵊县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励志社社长袁雄杰为首的反动势力，他们控制了“嵊县抗敌后援会”，组织了一个所谓“抗敌剧团”。这个剧团以嵊县的大资本家汪正金的儿子汪勤效为团长，搜罗了嵊县的反动党政首脑、地主豪绅的爪牙，和国民党的职业党棍为基础，还吸收了一批失学失业的青年。他们到街头、监狱去作宣传，吹捧嵊县的反动党政头子、土豪劣绅为抗日救国的领导力量，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理所当然地为广大真正爱国抗日的人士所唾弃。另一股以张珂表为代表的进步势力，他们以“南鹿学社”为基础，团结了广大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是真正热心于抗日救亡运动的。他们利用张珂表被任用“抗敌后援会”宣传股副股长的合法地位，紧密结合抗日形势的发展，出快报、捷报、不定期的刊物，及时报道抗日的战况，讲形势、写评论，

张珂表纪念文集

大力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他们的活动大大振奋了各界的爱国人士，每张快报、捷报围观的群众如蚁，挤得水泄不通，争相传闻，情绪激昂。但这些宣传也只是杯水车薪，远不能满足散落在广大农村的失业失学的抗日青年，和广大农民爱国热忱的需要。这是多么好的抗日形势，多么需要党来领导。我把嵯县的形势，连续写信向上海党的组织汇报，要求党派人来加强领导。

那时，珂表和我有个共同的设想，如果有一支小型的抗日救亡流动宣传队，深入到农村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农村的抗日救国青年组织起来，和城里的进步力量汇合成一股洪流，这对推进城乡抗日救亡运动是多么的需要！于是我和他分头去活动。他以宣传股的合法身份，向“抗敌后援会”提出组织一支小型流动宣传队，到农村去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意见。排除了多方面的阻挠，争取到“抗敌后援会”的通过，并规定下乡流动宣传时，伙食由所在保甲供应，“抗后会”每月津贴拾元为流动队的化妆费。珂表和我商量，流宣队员的条件，要政治思想进步，能吃苦耐劳有自我牺牲精神，又能善于联系群众会做宣传工作的，才能担起流宣队的任务。我把这个意图和热心救亡运动又意气相投的失业青年张欣森（张朗），尹仲芳（现名俞林，原是共青团员，被捕出狱后尚未恢复组织）商量，得到他们的热情支持。我们就分头去串联，很快就有意愿参加者来了四十人。其中有在上海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失业工人，也有满腔救国热情的失学青年，如王庄宵，原在杭州蚕桑学校读书时就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她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扰，组织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被学校开除回乡的。这样我就从中选定了自己和张欣森、尹仲芳、沈天麟（钟林）、樊宏法、石磊、周云青、丁仕农，女的有王庄宵、沈彩虹、章文君等十六个人组成一支小型的宣传队。他们都是政治上要求进步，经济上不求报酬，生活上吃苦耐劳，并志愿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我向珂表汇报后，他非常满意，并寄予很大希望。九月初，珂表借得钱业公所旧址，作为宣传

队练兵的场所，队员自带口粮集中整训，进行思想教育，业务训练，成立组织，公推张欣森为队长兼总务，尹仲芳为宣传，王寄松为组织。就这样，嵯县第一支小型的抗日流动宣传队诞生了。

九月下旬，上海党派骆又余同志来嵯县和我联系。带来了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和吴仲超同志“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的嘱咐。我向骆汇报了张珂表和嵯县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情况，并建议：张珂表已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吸收他入党有利于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尹仲芳出狱后经过一年多的考察，证明他是忠于党的，可以转为中共党员。骆同意我的汇报，并说：如条件成熟，可吸收张珂表为中共党员，并成立临时县委，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于是我介绍珂表给骆，经骆和珂表谈话考察，同意我的建议。九月的一个晚上，在农工银行珂表的宿舍，骆为党代表，由我介绍，珂表宣誓，骆致词，没有履行填表手续，没有候补期，吸收张珂表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然后，骆、珂表和我共同学习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结合嵯县的情况，研究了党的工作，一致认为嵯县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即将形成，由骆决定：成立嵯县临时县委，指定我为书记，尹仲芳为组织（尹在乡下未参加），事后由我传达的，张珂表为宣传。并决定利用珂表的社会地位，负责团结进步力量的汇总工作，我和仲芳主要是搞好流宣队工作，通过深入农村，发现进步力量，介绍给珂表，以便在适当的时候，把城乡的抗日进步力量组织起来，统一党对嵯县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我们还分析了流宣队张欣森的情况，认为他是进步青年中比较成熟的，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吸收他入党，流宣队以王、尹、张为核心领导，把流宣队锻炼成一支红色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力量。从此有了党的领导，方向更加明确，大大鼓舞了珂表和我的信心。不久我把临时县委对流宣队的希望和要求传达给欣森和仲芳，我们搞好流宣队的决心和劲头更足了。

张珂表纪念文集

节录于 1981 年 5 月王寄松《张珂表与第一流动宣传队》（抗战初期党在嵯县活动的一个侧面），标题系编者所加。

——摘自《嵯县党史资料》1983 年第一期

关于嵊县的建党（节选）

邢子陶

嵊县、新昌等县在上海绸厂做工的人很多，那时回乡绸厂工人党员王寄松和骆又余有联系，一九三七年九月，骆又余要王寄松在嵊县组织“临时县委”。邢子陶代表省临工委于十月底到嵊县，认为那时王等组织关系还没有转来，骆又余本人也无证明文件，成立这个“临时县委”没有上级指示，情况不明。但王寄松关系虽未转来，他们和张珂表等组织流动宣传队等抗日组织，做了有益的工作。他们发展的个别党员经过审查，合乎条件的仍为党员（上海回乡工人党员的组织关系在浙江临时省委成立后转来）。

嵊县是抗日救亡运动和建党工作在宁绍地区做得较好的县份之一。省工委、宁绍特委和后来的绍属特委机关长期设在该县，嵊县张珂表（全面）抗战前受进步思想的教育，曾和周飞去上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举办的暑期讲习所学习。（全面）抗战后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团结了全县许多革命青年、回乡工人、本县工人（店员）、农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宣传“二五减租”。张担任国民党“抗敌后援会”宣传股副股长，组织“乡村救亡协进会”“群力书店”，出版《群力》刊物，以王寄松、张朗、周飞、钱松泉等为首组织第一、第二流动宣传队。以（王）正山、袁于田为首掌握几个政治工作队区队。嵊县主要骨干除上海回乡工人外，有丁友灿、周飞、周丹虹（伊兵）、陈布衣（裘祖恩）、竺曾撰、陈静之（陈午韵）、钱毓良、斯浪清、徐巴盾、朱一松等人。

张珂表纪念文集

一九三八年一月成立县工委，王正山任书记，组织：袁于田；宣传：张珂表。宁绍特委建立后，五月份成立县委。县委书记由邢子陶兼任，副书记为张珂表、王正山，袁于田、周飞各担任过组织部长，张珂表、张璞君（骆宾基）、竺曾撰各担任过宣传部长；杜玲君（杜晓蓉）、陆婉如担任过妇女部长；丁友灿为嵊东区委书记，后担任农民部长；陈布衣、杜玲君为长乐、开元区委书记（注：陈为水竹庵分区委、杜为西区区委书记），钱松泉为石璜区委（注：山口分区委）书记，徐巴盾为嵊县下西区区委书记，竺曾撰为城区区委书记，张璞君在北区工作。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邢子陶不兼县委书记，由王正山任县委书记，一九四〇年杨源时任县委书记。建立县委时有党员一百多人，一九三九年底发展至三百多人。在教员、职员、工人、贫雇农中都有党员。王寄松、尹仲芳（俞林）、张朗、王庄宵、沈彩虹等被派去皖南新四军受训。张珂表积劳成疾，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不幸逝世（注：十月三十一日），终年三十岁。

注：标题系编者所加。

——辑自《嵊县党史资料》1983年第一期



抗战初期嵊县党的组织情况（节选）

王正山

……

四、组织问题：

一九三八年初（旧历三七年底），在邢子陶同志领导下，我和袁于田、张珂表、黄公石等四人，曾一度成立嵊县工委，后因我和袁于田同志参加政工队，工委只剩下两人。

……

各地党组织也相继发展：第一流宣队以王寄松、张欣淼、尹仲芳等为骨干，发展了钱爱珍、钱立民、章文君、石磊等同志，成立了支部。第二流宣队以钱松泉、钱正才、张仁奎等为骨干，发展樊江、周勋等同志，也成立了支部。城区区委书记由张珂表同志兼任，成员有陈午韵、钱叔亮等同志。下有业宣组支部，周和越为书记，党员有钱铁民、沈新吾等同志，其后又先后发展了竺曾撰、杨月英、袁楚衍（周英）、袁冠群、汪爱芹、喻柏韵、吴惠芹、芦寄白（芦皓）、汪湘芹等同志，还有一个理发师傅，名字忘了。剡山小学支部由钱叔亮兼任书记，党员有裘愉申（周士标）、楼爱姑（楼燕如，由钱叔亮介绍入党）。嵊县中学支部，由王得贵任书记，有学生党员三、四人。群力书店支部，由薛仲山任书记，党员有钟德丰和薛的爱人，名字忘了（注：宋爱卿），另外还有一些单独联系的党员。西乡分上西区和下西区两个区委。上西区区委书记先由周飞同志兼任，后为杜晓蓉同志，杜调离后（注：为周斯明），

张珂表纪念文集

此后由诸暨调来的县委妇女部长陆婉如同志兼任，成员有周丹虹、周醉飞、裘祖恩（陈布衣），下有开元支部，由周丹虹、周醉飞等同志组成，党员有十余人。长乐支部由裘祖恩兼任书记，有党员五六人；太平支部由周莲娥等三四人组成。山口支部由钱樟泉为书记，有党员四五人，以后党员有所发展，成立西区分区委，由钱樟泉为书记。下西区区委书记是徐巴盾同志，成员有郭雪聪等，党员李名卿同志和甲秀坂的一个农民（名字忘了）。后来又增加了钱章平、沈本初、吴载芹等。东区区委书记为丁友灿同志，成员有张增焕（张平山）、俞光裕（注：应是尹士高）等同志，后来增加竹柏青同志，下有故江支部，丁友灿同志兼任书记，党员有丁月江和丁招土等同志。白泥塘支部约有五六人，由一个姓王的农民担任书记。东郭支部由竹柏青同志为书记，竹明山、竹见山等人组成。东坂庄支部由张增焕为书记，有党员三四人。官地有俞光裕、魏湘生两个党员，后参加了新昌县政工队。属于新昌县的兰州、黄泽、前良等地的党员，也都参加了新昌县政工队，有竹邦云、竺观兰、倪寒若等等同志。其中兰州有个农民党员，后来参加了东区区委。

一九三八年夏天，（珂表同志）肚角生了毒疮，仍坚持紧张的工作，后来病势日趋严重，嵊县无法治疗，送宁波华美医院就医。手术后受了感染，病情恶化；再度开刀，医治无效，不幸在十月底病逝在医院。党失去了这位杰出的干部，青年的好领导，损失是无法弥补的。那时我在乡下跑组织，等我知道这个惊雷般的噩耗，赶回县城，上级党邢子陶和城区钱叔亮、陈午韵等同志已筹备好一个隆重的追悼大会。当灵柩从水路运到东桥时，钱铁民等青年同志都扶棺大哭。追悼大会在东门外大广场举行，到会群众不下五、六百人，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做了一些政治宣传，并在《抗卫周刊》出一期追悼张珂表的专辑。灵柩安葬在独秀山。在各界的支持下，筹集了一笔慰问家属的抚恤金。

张珂表同志逝世后，城区区委书记由钱叔亮同志继任。不久，邢子陶同志上调，由杨思一同志接替了邢子陶同志的工作，县委进行调整，

文献辑存

我任书记兼组织部长，张璞君为宣传部长，陆婉如为妇女部长，赵礼冉同志提拔为青年部长。

.....

注：标题系编者所加。

——辑自《嵯县党史资料》1983年第一期

纪念嵊县建党五十周年

邢子陶

日子过得真快，嵊县建党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回首当年，往事历历在目。

我一九三七年六月从上海漕河泾监狱解去苏州反省院，抗战后（全面抗战）九月初在太湖东山释放，由南京中共中央代表团（后为长江局）派回浙江任省临工委（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十月下旬到杭州。那时，敌人已快在金山卫登陆，杭州街上行人稀少，湖滨满街落叶，一片凄凉景象。该时徐洁身等省临工委人员已去金华，难民涌去内地，火车堵塞。我先回家乡嵊县，联系当地革命同志，再去金华。以后近两年时间，在省临工委和省工委结束之后，我主要在宁绍特委和宁绍地区工作，其中在嵊县时间最长。

嵊县建党，张珂表及一些战友起了很大作用。张珂表同志是嵊县农工银行职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做抗日救亡工作，后和周飞等参加上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积极为党做抗日宣传工作。他在嵊县进步青年、教师、店员及各界人士中，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并和新昌、上虞的一些革命知识青年有联系，为当时建党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当时在上海回乡的绸厂工人中，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如王寄松、尹仲芳（俞林）。有个义乌人、绸厂工人骆又余受上海丝绸党委派遣，来浙联系回乡的绸厂工人党员，并开展工作（这是我后来和当时上海丝绸党委书记吴仲超谈话时知道的），并由骆决定，在一九三七年九月由

王寄松、尹仲芳、张珂表三人建立嵊县临时县委。我那时对骆建立这个临时县委弄不清楚，上面也无关系转来，对骆本人情况不明。以后事实表明，上海党在抗战初期，对从沪来浙党员，都把关系转来，一般没有在浙江单独建立“临时县委”之类组织。但骆既是上海丝绸党委派来，王、尹又都是党员，在抗战初期党的工作尚不正规的情况下，我们在嵊县建党的历史上是承认这个组织的。以后，王和尹也都是我军我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嵊县建党，当时依靠的是以下几种人：

一、以张珂表为首的本县革命青年，包括学生、小学教师、店员、职员等，他们对嵊县建党起了很大作用，如长乐区委书记陈布衣（裘祖恩），原是长乐钱庄的职员，后来是四明山坚持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以后担任过比较重要工作的周飞、伊兵、周斯明，是开元的三位知识青年。周飞一九三五年从上海回来，在长乐开元地区做了不少工作，以后也是坚持四明山斗争的重要干部。担任城区区委书记后为县委宣传部长竺曾撰，下西区区委书记徐巴盾，都是小学教师。嵊东区委书记后为县农民部长的丁友灿，以后为长期坚持当地斗争的领导人之一，亦是当地的知识青年。在流动宣传队工作的，如石可民（石磊）、沈天麟（钟林）、王庄宵、沈彩虹等等，以及在城区张珂表身边工作的汪维城、赵大葆（朱一松）、钱铁民等，亦都是本地的知识青年。

二、上海回乡的革命工人（绸厂工人），有的本来是共产党员，如王寄松、尹仲芳、王正山、袁庸泉、龚纪苗、张平山等，有的虽非党员，但倾向革命，后来都参加了党，如周飞、钱松泉、章文君、钱爱珍、石可民等。他们好多担任过县和区的领导工作。王正山、袁庸泉、周飞担任过县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张朗担任过抗日流动宣传队队长，后为新四军师政委，钱松泉负责过石璜区工作，张平山亦担任过嵊东区负责人，其他好些人在流动宣传队里做过领导工作。

三、大革命时的左派知识分子，那时转向我党，参加党的组织，如

张珂表纪念文集

陈静之（陈午韵）原是嵊县国民党执行委员，是大革命时国民党左派，（全面）抗战初期参加我党。还有钱叔亮、斯浪清等老教师，亦加入我党。这对国民党中的进步分子及嵊县知识界亦有重要的影响。

四、从监狱出来的和外来的知识分子，如黄公石、张贵卿、骆宾基（张璞君）、杜晓蓉（杜玲君）等，在嵊县建党工作中做了许多工作。黄公石出狱回家接上关系后参加过县委。张贵卿在丁友灿家养病时发展丁为党员，并在东坂庄一带建立支部，和张平山等一起开展工作。骆宾基在嵊县北区茶场一带做了不少工作，并担任过县委宣传部长。杜晓蓉担任过嵊西区区委书记及县委妇女部长。

嵊县于一九三八年一月成立中共嵊县工委，五月正式成立县委，我兼县委书记。在县工委和县委担任过委员以上领导职务的有王正山、张珂表、袁庸泉（袁于田）、丁友灿、周飞、黄公石、骆宾基、竺曾撰等人，这些人都有或长或短的革命历史。王正山、袁庸泉为一九三四年上海美亚绸厂大罢工领导人之一。黄公石刚出狱不久。周飞、丁友灿一段时间内都与张珂表一起工作。骆宾基是著名的革命文化人，竺是下面培养起来的革命干部。自从成立县级领导机构以来，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逐步在工人和农民中建立党的组织，当时嵊县党是宁绍地区做得较好的县份之一。

嵊县国民党在抗战初期，在一九三七年、三八年，在武汉失守以前，对我党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在抗日救亡工作上，有的工作还能合作，如国民党组织的嵊县抗敌后援会，其中宣传组就由我们张珂表同志负责，战时政治工作队，也有几个区队由我们控制，但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对我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限制和破坏，不仅在后来“反共高潮”时是如此，即在（全面）抗战初期也已存在。到三八年下半年，我们进行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和在政工队内工作已日益困难，我们不得不把一些面目比较暴露的党员干部向外输送。虽然还没有像诸暨、金华那样接连有人被暗杀和失踪，但接着下去我们掌握的政工队被解散，流宣队和

群力书店被迫解散和关闭,以后发展到我们的同志被捕杀,四〇年的“六三”斗争事件等,都说明我们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日益尖锐。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则步步深入,反敌反顽的斗争更趋复杂,因而我们同志身上抗日和反顽的斗争重担亦更加沉重。

在嵊县建党五十周年之际,我们这些老人不得不回忆起在抗战初期就为革命牺牲和死亡的同志和战友,如商纪连、张珂表、竺曾撰、徐巴盾、钱松泉、石可民、沈彩虹等,他们大都很年轻,二、三十岁就离开了我们,商、竺、徐、钱、石等都死在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病死的也因革命重任在肩,不及时治疗,或条件太差而离开了人间。……对这些同志,在纪念嵊县建党五十周年之际,我们都深深怀念他们,其中,我对他们比较了解的,写出几位以表悼念之情。

商纪连,嵊县西乡上沙地人,出生在一九一七年,上海美亚绸厂工人,一九三三年我介绍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CY),一九三四年他奉组织之命,回浙江家乡建立共青团组织,那时的共青团实际上也是党的组织,以后党中央规定那时的团员团龄作为党龄计算。他在嵊县工作了一年,建立了团的组织,也是嵊县最早的党组织。以后调回上海,在工作中被捕,出狱后去苏南新四军六师任营政委,一九四一年在江苏江阴祝塘镇与日寇战斗中牺牲,头被敌人割下悬挂旗上。牺牲时才二十四岁,商纪连对革命无限忠诚,党分配的任务,不管如何艰难险阻,从不推托,英勇顽强,视死如归。我和他有些亲戚关系,他叫我哥,对于这位小弟的牺牲,知道后不胜悲痛。

张珂表,一九〇八年生,嵊县大明寺根人,他是当时嵊县抗日救亡运动公认的领导人。他为党和革命工作,日夜操劳,毫不考虑自己的身体,他善于团结人,不仅对自己的同志亲似兄弟,还善于团结一切有抗日愿望的各阶层人士。他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很强的组织活动能力,许多文章都亲自动笔,许多抗日组织和文化设施都亲自动手建立。他有坚强的党性,为了党的事业舍生忘死,当他满身生疮之时,我们劝他立即

张珂表纪念文集

休息治疗，而他为了工作，总是一拖再拖，终至养痼贻患，为革命事业献出青春生命。现在正是他逝世的五十周年，他唯一的女儿已是浙江农业大学的副教授，特书此以表怀念之情。

.....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辑自《嵊县党史资料》1989年第一、二期

中共组织和抗日武装及根据地（节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嵊县县级党组织创建，创建后的党组织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逐步建立了嵊新奉、嵊西、绍嵊3个县级党组织，嵊新奉县自卫队、嵊新奉抗日自卫总队等抗日武装，以及嵊新奉、绍嵊两个根据地，有力地支援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一、党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展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后，8月13日，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淞沪会战，上海沦陷。中共上海党组织响应党中央“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号召，有组织地派党员回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8月下旬，受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派遣上海美亚丝绸十厂罢工总代表、嵊籍中共党员王寄松（王季松）回乡，开展抗日活动和建党工作。当时嵊县以张珂表为首的抗日青年正通过开办大众书店、编印散发《要闻简报》等活动开展抗日宣传。王寄松到嵊便与张珂表取得了联系，共同商讨如何开展抗日活动，决定除利用嵊县抗敌后援会及其《抗日自卫》周刊进行宣传外，成立一支小型流动宣传队（即9月上旬成立的第一流动宣传队），深入城乡开展抗日救国流动宣传。9月下旬，吴仲超又派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党的联络员骆又余到嵊联络和检查工作。骆又余根据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和党组织负责人吴仲超“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建立党的组织，

张珂表纪念文集

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以及嵊县抗日活动的情况，发展进步青年张珂表和从沪回嵊的失业青年尹仲芳（俞林）为中共党员。同月底，骆又余代表上级党组织，宣布成立了中共嵊县临时委员会，指定王寄松担任书记，尹仲芳为组织委员，张珂表为宣传委员，隶属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领导。

1937年11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在杭州皮市巷成立。不久，省临工委组织部长邢子陶到嵊考察党的抗日救亡工作，着手开展建党工作。邢子陶找到张珂表详细考察了嵊县抗日救亡和党组织的情况后，在县城西后街养老堂设临时联络处，以便开展建党和抗日救亡工作。同时通过考察和了解，在城区、嵊西、嵊东和三界等地发展了一批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入党。

1938年1月，在邢子陶主持下，成立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隶属省临工委领导。由王正山（王明远）任书记，袁于田（袁庸泉）任组织委员，张珂表任宣传委员，黄公石（黄德鋈）为委员。2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改组为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顾玉良担任省工委书记，张崇文为宣传部部长，邢子陶为组织部部长，高子清（王文祥）、徐洁身为委员。省工委机关从金华迁至嵊县太平乡（今嵊州市长乐镇）沃基村新屋台门邢子陶家中。5月，中央决定撤销省工委，建立浙江省临时省委，统一领导全省党组织，并成立浙南、处属、台属、宁绍和金衢5个特委。中共宁绍特委在沃基村邢子陶家成立，顾玉良任书记（后为杨思一），邢子陶、杨思一、高子清为委员，会议决定特委机关设在邢子陶家。后又在县城白莲堂弄嵊县抗敌后援会政训组负责人陈午韵家设立秘密联络点。特委设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邵明）、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月珍）、职工委员会（书记马青），辖嵊县、新昌、上虞、诸暨、余姚、萧山、绍兴和宁波、定海、宁海、慈溪、奉化等县党组织。在宁绍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嵊县党的工作进一步深入，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都发展了党员，许多地方建立起党的支部组

织。为适应这种形势，1938年6月，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嵊县委员会，邢子陶兼任书记，张珂表、王正山为副书记，张璞君（骆宾基）、杜玲君（杜晓蓉）、袁于田、周飞为委员。同时设立了组织部（部长袁于田）、宣传部（部长张璞君）、妇女部（部长杜玲君）、青年部（部长周飞）等工作机构。11月，宁绍特委为了便于领导和开展嵊新两地党的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决定把中共嵊县委员会扩建为中共嵊县中心县委，管辖嵊县、新昌两县党的工作。扩建后的嵊县中心县委由王正山（1940年1月起为杨源时，又名斯旦）担任书记，周飞（组织部部长，后为周迪道、陈布衣）、张璞君（宣传部部长，后为竺曾撰）、丁友灿（农民部长）、杜玲君（妇女部长，后为张月珍）、赵虞（青年部长，后为周孟夫）为委员。后又增设妇女委员会（书记郭雪聪），青年委员会（书记周孟夫），职工委员会（书记杨源时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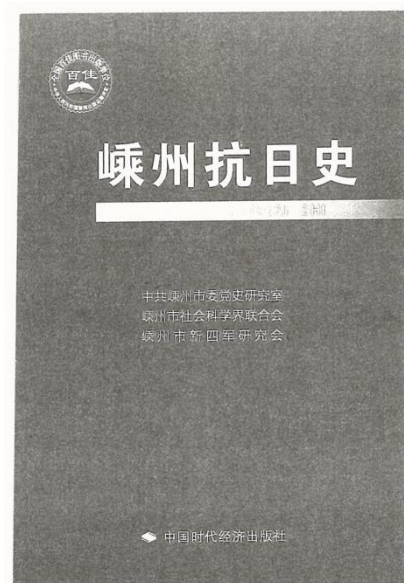
从临时县委成立起，党的工作始终以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为指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广泛深入地团结各阶层人民群众，成立抗日群众团体，开展抗日宣传和救亡活动。党组织设法通过各种关系，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党员进入嵊县抗敌后援会（后改为抗日自卫委员会），以后援会的合法名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团结进步青年，锻炼和壮大党的力量。县工委委员张珂表、党员陈午韵等利用他们在后援会负责政宣组工作之便，发起成立乡村救亡协进会，“以联络抗日救亡同志，共同促进救亡运动，切实参加乡村救亡工作”，会员遍布全城乡。创办《抗敌》周刊、《抗日自卫》周刊（后改为《抗卫》）以及《群力》半月刊等抗日刊物，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报道各地救亡工作动态。与此同时，除组织成立第一流动宣传队外，还组织成立了第二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乡村文化工作队、抗日救亡孩子剧团等群众团体，运用歌咏、戏剧、演讲、漫画、标语等各种形式，深入城乡山村开展抗日宣传。县委还筹组开办群力书店，出售抗日、进步书刊，既是各界进步人士和抗日青年的“革命精神食粮的供应站”，

张阿表纪念文集

又是党的重要联络站。总之，这个时期，在党的直接领导下，群众得到了充分发动，抗日热情空前高涨，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党在领导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宣传的同时，积极发展党的组织。通过党员团结群众，发动教师和知识青年，创办民众夜校、妇女识字班、台门学校，开展募捐、慰问、培训救护人员等活动，培养和发现积极分子，充实党的队伍，分别在第一流动宣传队、第二流动宣传队、政治工作队、城区业余宣传组、群力书店、剡山小学及东坂庄、故江、东郭、东林、开元、山口、长乐等地建立了党支部。根据党员的分布情况按地区先后建立了城区、嵊东、嵊西3个区委。嵊西区委还设立了开（元）长（乐）太（平）、山口、下西、水竹庵4个分区委。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党员得到了实际锻炼，党的组织不断巩固发展，至1939年年底，全县已建立3个区委，35个党支部，有党员299名。这是嵊县党组织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全面抗战的黄金时期。

——辑自《嵊州抗日史》，并有适当改动



我在嵊县抗日救亡活动片断

骆宾基

1937年12月中旬，我由茅盾与胡愈之两同志的安排，接受冯雪峰同志交代的任务，和上海文艺界抗敌协会秘书长王任叔（巴人）的介绍，应嵊县三界茶场改良场副场长吴觉农先生之约，经海门抵嵊县。在嵊县农工银行吴觉农先生的下榻处，由吴觉农介绍认识了该行职员张珂表同志，当夜就住在张的宿舍里。

张是抗日爱国进步青年（但不知他是共产党党员），在农工银行办了一个秘密读书组。读书组实际上是一个图书室，有许多进步书籍，有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因之，我们两人一见如故，倾心交谈，谈及了三界茶场的抗日救亡生活的情况，确定我到茶场后，先从组织附近村子农民夜校入手，作为宣传抗日、选编并训练农民抗日武装的基本阵地。

稍事休息，我随吴觉农先生到金华浙江省建设厅农业技术推广所报到。莫定森所长即委任我为三界茶场技术员，从而取得了合法地位。遂于是年12月24日，到茶场报到。

我首先在茶场南面的茶园头和沈村办起了两处农民夜校。由于我是北方人，语言不通，就请茶厂职员周土祥与上海纱厂回乡工人沈阿毛分别当翻译。

在夜校的基础上，又组织了嵊县农民抗日救亡协会三界分会，公推石山头村老黄（黄传洪是上海纱厂工人，曾参加过二七大罢工）为主任。此后，又以三界农民抗救分会为基础，成立了抗日自卫队，进行初步军

张珂表纪念文集

事训练和以毛泽东论游击战为教材，进行军事理论和政治教育。

1938年农历正月十五，是曹娥江（注：剡溪）畔清风庙一方文人（清时为秀才，民国时为小学教员和大专学生）酒会之期。我赴会并乘机作了时势讲话，建议小学教员组织抗日救亡联谊会（简称抗救会）。此议当即得到大家广泛响应。从此结识了灵芝乡小学校长、乡文书黄松岳。他倾向革命，并接受任务以后在乡丁中发展半秘密的农民抗日救亡小组。同样，蒋镇小学教员蒋某，也介绍农民抗救会员打入镇公所武装班当伙夫，都是为以后掌握武装做准备。

清风庙回来之后，我与茶场积极分子周士祥办起了《七七周刊》。我负责撰稿，周负责刻（钢板）印。经常编选报刊上的形势讲话和本地区抗救活动的消息。周刊主要分发给抗救分会各村组和小教抗救联谊会的人、茶场职工等，进而构成了一个联络宣传网。

1938年2月，国民党第16师第48旅由前方撤到三界休整。旅部就在茶场研究室，与我成为近邻。我到城关向张珂表交谈了工作情况后，张告我应做好该旅的统战工作，坚定他们抗战杀敌的决心和信心。因之，我寻机对该旅长刘勋浩作了首次拜访，带了几份《七七周刊》给他看。刘看后说，浙东的民气很高，你们办的周刊很有水平，并要求张给部队提供一些精神食粮。于是我以《丁玲在西北》一书作试探，进而从张珂表的“读书组”借来《西行漫记》《朱德论游击战》等书给他。刘勋浩很有兴趣，均迅速阅读，仿佛不到一周就读完了。张珂表同志提议我们以“抗救会”名义组织一次军民联欢，以扩大影响。对此会，四十八旅各团欣然应邀，推出班排代表徒手参加，秩序良好，会议开得相当成功。

2月底3月初，张珂表又组织第一流动宣传队，带着上海纱厂回乡工人和图书阅读流动组到三界茶场，到各村慰问抗日友军官兵。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一剧，引起全场军民共鸣，演出后举行了座谈会，会上旅部刘副官长情绪激动，一边流泪，一边慷慨陈词，决心不忘国耻，要抗战到底！刘勋浩也当场要求“一流”到各团去演出。接着又提出要留下

“一流”，编入旅部，给以正式军饷。我把这个要求转告张珂表同志。很快邢子陶同志在宣传队返嵯之后，身着新四军军装，佩戴“联络参谋”符号、袖标，不带一人，只有张珂表同志的介绍信亲临茶场。我即召开座谈会汇报三界地区“抗救”活动的情况，安排邢子陶同志与刘勋浩作了友好会见，虽然未能谈及宣传队编入48旅问题，但为以后部分同志参加该旅、保持政治独立的抗日宣传队奠定了基础。邢子陶同志对此次视察深为满意，我也向他表示了在上海时就有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3月，邢子陶同志约我到白鹤乡花桥村袁于田同志家去同他会面。这次会见，我知道邢就是我日夜梦想寻找的浙东地方党的领导同志，知道在保卫大上海时期的抗日救亡阵线老战友杨思一也在中共宁绍特委，亲切之感顿时倍增。邢子陶同志要我到上虞百官小学党支部去联系姓郭的一位同志，如果组织未被破坏，就开支部会传达党的指示。那里已是抗日前线，我虽感有风险，但深感光荣。

3月底，我独自一人由水路去百官。因公路已破坏，车子早已不通。到百官后，很快找到了那位姓郭的，他是百官小学的校长。他一见上级党组织派人联系，欣喜异常，当天晚上就召开了支部会，传达了上级指示，宣读了党内文件。参加这次支部会的有杜玲君（现名杜晓蓉，邢子陶同志爱人），记得还有胡恕之（胡愈之的小弟弟，化名胡忠恕），两人都是该校小学教员。

1938年4月6日，我从上虞回来不久，邢子陶同志来函约我到城南某村参加一次县委会议。杜玲君（已调嵯）、张珂表、袁于田等都来了。会上邢子陶同志作了讲话，并宣布县委组织名单。张珂表为组织部部长（按：应是王正山副书记兼，张为副书记），袁于田为农民部部长，杜玲君为妇女部部长，我为宣传部部长，邢兼任县委书记。

会后，邢要我回茶厂为开办群力书店筹集百股资金（每股2元）。这在茶场职工不多（约十人）、工资不高（30多元）的情况下是相当困难的。我自己每月40元，但到场仅3个月，积蓄不多。我依靠积

张珂表纪念文集

极分子进行发动，吕允福、周士祥、蒋鑫、詹瑞等都带了头，每人2股、5股不等，已近完成一半之数。最后我以私蓄，加上个人名义借贷于总务，完成了200元的任务，从而使“群力书店”于1938年4月24日开业。

由于三界地区与48旅军民联欢大会的召开和流动宣传队的演出，农民抗救会显示了威力，引起地主豪绅反动分子的畏忌。村村发生胁迫佃户退出抗救会的逆流，否则就抽田退地。为保护农民切身利益，经与张珂表同志商议，采取公开解散抗救会班排建制，暗则划分小组，秘密隐蔽。为解决村组骨干力量不足，张珂表同志主张将倾向进步的知识青年加以训练后，回去参与各自本村的抗日自卫队的领导核心。经与茶场场长吕允福商议，决定举办以培训茶叶技术员为名义的训练班（报经省建设厅批准），由我担任训练班主任兼政治课主讲，从中挑选未来游击队的组织骨干。对坚持不肯退会的抗救分会主任老黄，则由茶场划出相应土地（水田）给他耕种，使他继续坚持抗救会工作。

在训练班开课期间，邢子陶同志又交给我秘密安置一位延安来的“病休”人员任务。他叫曹进钦，高级知识分子，懂法语。我与场长吕允福协商，吕一听懂法语，正与自己在劳动大学所学外语相同，是交流学习外文的机会，同意聘请曹为训练班的国文教员，月工资不低于茶场推广员，从而完成了这一比较难解决的任务。

1939年四、五月间，是春茶采摘的时候。场长吕允福在散步中告诉我：“国民党‘防止异党活动’的风紧起来了，县党部秘书应怀发已注意三界茶场了，你太红，希望离开三界茶场，去天台茶叶示范区隐蔽一个时期。”这样我把“茶叶技术员训练班”的政治课交给了曹进钦同志。我进城见到了接任中共嵊县县委书记的王正山同志。他决定把我调离三界茶场，通过陈午韵（陈静之）的长兄陈醉云的关系去嵊县中学（当时已迁崇仁马仁村）教书隐蔽。于是我在6月底7月初向茶场提出了辞呈。

1939年8月，我进城见到了王正山（张珂表已于1938年10月31日病逝）和“群力书店”经理薛仲三、袁楚英等同志，了解到书店被国民党查封，还有一些秘密文件未带出，情况严重。王正山同志召开紧急会议磋商，决定做书店隔壁裁缝店值夜徒工的工作，打通土壁抢救，结果计划顺利实现，使党组织的机密免受严重损失。

不久，三界茶场投资“群力书店”股金的职工，推举蒋XX来嵊中索还股金，并告诉我会计处还有我五六两个月的工资80元未取。我托蒋代为领取并偿还股金。

1939年11月，我由中共宁绍特委调去绍兴主编《战旗》。我提出：全部稿件必须有处理主权，行政区专员公署不得过问和带一名副主编，待遇与主编相等的两个条件，在绍兴方面答复同意后，准备赴绍。原来金华邵荃麟同志来信，商量皖南新四军派出的诗人辛劳（党员）临时安置一个合法工作。最后由县委书记王正山决定调陈午韵去绍兴，辛劳补我所遗嵊中教员之缺，校方也同意。于是我留一个月的工资在校，作辛劳生活之需，结果辛劳又有调遣上海的变动，未来嵊县教书。

至此，我在嵊县已参加近两年的抗日救亡工作与革命活动，暂告结束。1939年冬初去绍兴，1940年春末又转金华到皖南新四军去了。

——辑自《嵊州抗日史》

回忆我的革命生涯（节选）

（嵊新奉地区老党员、老游击队员、老县长丁友灿访谈录）

……

岁月峥嵘，道路崎岖。丁友灿同志的革命生涯，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度过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是革命人民的逻辑，因而也可以概括丁友灿同志及其他同志在嵊新奉地区所经历的斗争业绩。

一、向往革命 走上征途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了一个“之”字形。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共合作，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国共分裂，这是一个曲折；再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两党分裂，进到抗日战争前夕的两党合作，这又是一个曲折。丁友灿同志就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一九二六年踏上革命征途的。

丁友灿同志在回顾当年的情景时对我们说：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北伐军攻克杭州。我怀着有志青年应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志愿，毅然离家，专程赴杭。正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登报招学兵，我就报名参加考试，录取名单在报纸上公布，我们嵊新两县去报考学兵队被录取的大约有二十来人，我和新昌竺邦运也是被录取了的。说也奇怪，当我前往报到时，发现有个人竟冒充我的名字，也去报到，弄得真假莫辨，使学兵队感到棘手，最后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把我考试时

写的那篇文章拿出来，命我们俩背诵。当然，我背诵得一字不差，终于肯定了我是真的“丁友灿”，让我进了二十一师学兵队学习。

当时，我的同学张信达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杭州安定中学读书。学兵队驻杭期间，他和我经常联系。张信达后来转到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他不时给我寄来一些进步书刊，如天津《大公报》记者曹谷冰写的《苏俄视察记》，党内刊物《青年之友》，等等。直到他后来被捕之后，才中断联系。

参加二十一师学兵队的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国民革命北伐部队内部也比较有民主气氛，连队有政治指导员，上下级之间关系也较为密切，不准打骂士兵。我们随部队行动和受训，先后到过南京、苏州、昆山、南翔等地，在部队里接受革命的熏陶。

可是好景不长。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宁汉分裂，蒋介石叛变革命，内战代替团结，独裁代替民主，黑暗代替光明。全国各地，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被大批屠杀。北伐军中的情况亦为之大变，我预感到形势不妙，苗头不对，就决心脱离学兵队。当部队移驻上海郊区的南翔时，我趁晚上天黑，翻墙越出营房，改换服装，步行到上海梵皇渡，乘火车到了杭州。杭州熟人故旧多了，曾计议通过亲友关系，去武汉工作，旋因交通受阻而未果。在德升堂旅馆住了一个多月，一筹莫展，最后只好打回老家，重返嵊县。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的前一天，即四月十一日，张本芝、华伦初在嵊县突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这无疑是一个反革命准备镇压人民革命的信号！从此，与全国各地一样，白色恐怖笼罩着嵊县。国民党右派在浙江全省实行反革命统治。一九三〇年，邻县诸暨农民暴动被压制，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惨遭屠戮。在白色恐怖严重存在的形势下，当时嵊县也未曾发现地下党的组织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采取反革命、反人民和剿共政策，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拱手让日寇侵占东北、华北，从而使它得寸进尺，图谋吞并全中国。一

张珂表纪念文集

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变，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直到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日本侵略者妄图独吞中国的狼子野心，业已暴露无遗。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难迫在眉睫，这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政治派别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中国怎么办？”于是，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衷心一致的热切拥护，伟大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犹如汹涌澎湃的巨浪，席卷全国。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我们嵊县青年大众也积极行动起来，投身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斗争中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在这个伟大的抗日救亡革命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代表人物，张珂表同志正是当时的一位领袖人物、我们青年追求真理的良师益友，他为嵊县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我就在那时结识了张珂表同志。

二、寻求真理 参加组织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国共和谈，蒋介石被迫同意抗日。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我的老同学、共产党员张信达，从南京国民党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了。他回到老家嵊县新篁，对家里人隐瞒了参加共产党组织并且曾经遭到被捕的事实，只说是去日本留学，回国以后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干事，现在才回来。

他到家以后，就来信通知我前去会晤。我们见面之后，他对我讲了实话，并且向我介绍，说有一位同志，名叫张贵卿，也是从南京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党组织分配他到浙江来从事革命工作。因为身子不好，想到嵊县来养病，问我家中可否居住。我回答他说，完全可以，而且告诉他，我的家庭环境比较安全。

后来张贵卿同志由信达陪同，以二十一师学兵队老同学的名义，来到我家。

张贵卿来时，随带两瓶鱼肝油、两藤篮书籍。别人看来，无疑是来养病休息的。这些书都是进步书刊，于是我就一边看书，一边同张贵卿

同志讨论时事政治和社会问题，颇相默契。张经常给我讲解疑难问题，他是使我逐步提高政治认识和思想觉悟的启蒙老师。不仅如此，他还是引导我投身革命斗争的带路人。

张贵卿同志在我家住了一些日子，提议要同当地一些熟人交交朋友。我就陪他到湛头村葛林法家（我岳父家）作客，碰到张平山（张增焕）同志。平山同志原是上海绸厂工人，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他就失业回家。我们在叙谈中，张平山的谈话曾引起张贵卿同志的注意。在回家途中，他对我说，张平山可能是共产党员。后来，我和张贵卿走访了张平山，进一步得到了相互的了解。从此以后，张贵卿不但认识了不少上海回乡工人，而且和平山同志更加亲近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张贵卿同志提议，在嵊东成立“农村抗日救亡协会”，得到我们的赞同以后，就在故江村后面的大王庙成立这个组织，参加者有张平山、赵雪见、葛林法、商兴发（商育南）、张贵卿和我等二十来人。后来张珂表、斯浪清等同志在全县范围内成立了“乡村救亡协进会”，我们这个组织就改名为它的“嵊东分会”。当时，嵊县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在邢子陶、张珂表、斯浪清、钱叔亮、王正山等同志的领导下，已经开始进行公开的宣传活动，如第一流动宣传队的成立和它的下乡宣传，《时事要闻》已经油印散发，等等。

一九三七年冬季，抗日战争的形势有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当时正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中，国民党主张片面抗战，而共产党主张全面抗战，这是两党的原则分歧。在江浙，国民党的战线已被击破，上海已经失陷，日寇正向南京和长江流域进攻。张贵卿急于要回南京去，怕与上级组织领导失去联系。但是他去了不久，又回来了（不多时，南京失守，交通极度混乱，无法再去了，他差点儿流落他乡，幸亏路上碰到两个青年学生，靠着他们的帮助，才匆匆又返回嵊县）。

张贵卿同志还在去南京之前，就曾动员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他问我有无决心和勇气入党，我当时就肯定地表示了态。所以他回来之后，就介

张珂表纪念文集

绍我到浙南参加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他拿出许多化名的介绍信给我，我拣了一封署名叫做“周志远”的信，约定一个日子（十二月），同丁朗、丁招金、吕英达等四人前往浙南。其时张本人也离嵊去了，但正当我们路过新昌拔茅的时候，竟与他邂逅，于是他就陪我们同行，原来他是因事专程去找刘英同志的。我们四人，真是喜出望外。

当天车到临海，过了一宿。张贵卿以《新华日报》社新闻记者的身份作掩护，我们当作他的学生，就这样应付沿途国民党军警的查问。

到了温州，我们住在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办事处，办事处的负责人吴毓同志。次日，由一位名叫周饮冰的同志雇了一只小船，送我到了鳌江，再步行去山门镇。途中，我又遇见老同学张信达，他一路上与张贵卿同志低语常谈。快到山门的时候，他俩认真地对我说，由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组织手续以后补办。到了山门镇，得悉抗日救亡干校尚未开学。刘英、粟裕两同志当天请张贵卿等吃饭，我也在座，张贵卿向刘、粟两同志介绍说：“我们吸收这位‘周志远’同志入党”，并请他们对我多多帮助教育。

抗日救亡干校于一九三八年初开学了，我没有到干校正式结业就提前与钱铁民一块回来了。回来时由一位小学教师带我到鳌江一家南货铺吃了中饭，再经原路回到嵊县。

在嵊县，重逢张贵卿同志，他就批评我，不该提前回来，说我家庭观念太重。并且就在此时，我补办了入党组织手续。张珂表同志交给我一份“会员登记表”（其实就是“入党申请书”），正式介绍人为张贵卿、张珂表。

一九三八年春节以后，张贵卿又住到我的家里来。

三、地下建党 农村扎根

“为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己的

组织，向着真诚革命、信仰党的主义、拥护党的政策、并愿意服从纪律、努力工作的广大工人农民和青年积极分子开门，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丁友灿同志说，我就是在这一指示精神下被吸收入党的。我入党不久，就介绍张平山同志参加党组织，他是我发展的第一个党员（张平山原在上海参加过党，后来组织关系失掉了）。不久，尹士高同志到来，他是上海绸厂工人、老党员。我们就成立了嵊东区委，我任书记。我们开始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在嵊东区成立农村支部。

当时的建党工作是这样开展起来的：

由张平山负责，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成立了东坂庄、上林两个支部；我在官地发展小学老师俞光裕入党，俞又发展魏湘生等人，成立了官地支部；竹柏青在东郭、白泥塘成立支部；商兴发（上海绸厂工人、老党员）在前化建立一个支部；黄泽龚宝花（老党员）成立了妇女支部；王今吾在上东区东林成立了一个支部（上东只此一个支部，未成立区委）；故江村也有一个支部。这么九个支部，都是一九三八年这一年内先后组织建立起来的，党员总数约有五六十人。这些支部由区委分工联系领导，我都到过各个支部。

一九三八年十月底，张珂表同志积劳成疾，不幸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张珂表的逝世，给同志们带来无比的哀痛，使地方党失去一位难得的好党员，大家都沉浸在深切的悼念之中。

嗣后，嵊县党在干部配备上作了一些调整，由王正山同志任县委书记，我也参加了县委，分工负责联系嵊东区委，区委书记由张平山接替。时为三八年底至三九年底。

一九八一年四月口述笔录成文

一九八一年九月整理完毕

——辑自《嵊县党史资料》1981年第九期

抗战初期的统战工作（节选）

竹元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嵊县党组织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十分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抗日救亡宣传、争取国民党基层政权和武装、争取上层人士、掩护和营救党的干部等方面，广泛开展了统战工作，孤立、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势力，使党的组织得到巩固、发展和壮大。

一、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的统战工作

在1937年9月中共嵊县临时县委成立会上，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联络员骆又余传达了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并决定由临时县委宣传委员张珂表利用其任抗战后援会政训组副组长的身份和社会地位，负责团结和联络进步力量的工作，由王寄松（书记）、尹仲芳（组织委员）组织抗日流动宣传队，一边宣传，一边开展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1938年1月，中共嵊县工委根据宁绍特委指示，指派县工委书记王正山、组织委员袁于田以及张焘等党员报考县政工队，他们进队后开展了广泛的统战工作。张珂表又团结斯浪清、钱叔亮等人发起成立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并建立了40多个乡村分会，会员遍及全城乡各地，通过协进会广泛团结了各阶层人士。以共产党员张欣森为队长的县第一流动宣传队，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一度与驻三界国民党部队合作，编为国民党第十六师第四十八旅政治宣传队，奔赴江西等抗日前线阵地宣传

演出。县第二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县文化委员会、崇仁敦睦剧团、政工剧团等抗日宣传团体和群众组织，都有党员参加。他们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指引下，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泛开展了党的统战工作，并取得了好的成效。

——辑自《嵊州抗日史》

嵯县南鹿学社

嵯县南鹿学社是嵯、新两县知识分子组成的抗日文化团体。“南”即新昌南明山，标志新昌；“鹿”即嵯县鹿胎山，标志嵯县。前面冠以“嵯县”两字，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嵯县党部的所谓“嵯新两县成员，不宜组织联合团体”的登记注册规定。

南鹿学社发起于1935年春，于当年暑期在二戴小学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学社成员有嵯、新两县知识分子二、三十人。学社的宗旨是：“提倡文艺大众化，主张不分阶层和派别，都来写抗日救国的作品，为民呼号。”成立大会选出新昌的杨时俊（陈力平，陈山）、嵯县的邢尊谋（邢谋亭）、钱伦寿、倪季随、周丹虹为理事，推选邢尊谋为社长。南鹿学社出版社刊《橄榄》。嵯县南鹿学社的牌子挂在《剡声日报》社址即东前街药王庙门口，并在东后街“震轮南货栈”设立学社书报代办部。

南鹿学社成立后，除办好文艺园地外，还开展了许多抗日爱国活动。伟大的文化斗士鲁迅先生逝世后，学社在二戴小学召开悼念大会，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并在《剡声日报》副刊和《焰影》上刊出悼念专辑。救亡人士沈钧儒等爱国七君子被捕入狱后，学社曾写信给“七君子”，表示声援和慰问。七七事变后，南鹿学社首先发起成立“抗敌后援会”。凡有社友的学校，大都组织学生游行和宣传时事。学社每天刊出宣传壁报，准时张贴宣传资料。1937年秋，著名左翼文学青年徐懋庸来到南鹿学社，以文会友，开展活动。他约邢尊谋、钟敬之等文学青年奔赴延安（后邢因张珂表等的挽留而未去）。

南鹿学社深受抗日青年的爱戴。在 1937 年清明时节，学社在甘霖小学召开了第二次社员大会，社友已增至 100 多人。在这次会上，张珂表被选为理事，他还负责学社总务组的工作，成为学社主要负责人之一。张任理事后，逐步把南鹿学社改造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的营垒。在七七事变后的全国抗日救亡高潮中，南鹿学社的许多骨干，如张珂表、竺曾撰、周丹虹、周斯明、商梅庄、钱叔亮、斯浪清、杨时俊、俞元亮（俞德丰）、刘芾亭、徐巴盾、钟敬之、叶宗淦、裘奎松等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嵊县地方党的骨干和领导者。

1939 年春，全国政治局势逆转。在文化领域，大肆查禁进步报刊、书籍，强令改组和解散抗日宣传团体。不久，南鹿学社也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勒令解散。

——辑自《中共嵊州地方史》

明生读书会

明生读书会是由张珂表为主组织成立的。它成立于1935年10月，会员多是城区的店员、学徒。读书会的主要活动地点在张珂表供职的嵊县农工银行内。

张珂表是一位勤奋好学、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一面埋头工作，一面喜好阅读古籍。九一八的炮火惊醒了他的平静的读书生活，思想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化。他开始丢开古书，对祖国的命运产生了忧虑和关切，从沉湎于古籍到热衷于阅读报刊时事。1933年，他加入了上海（史）量才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使他得以有机会接触大量进步书刊。在这一时期，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左翼文艺书刊。这些进步书刊犹如一盏明灯，指引他在民族解放的征途上奋发前进。

为了把读书活动推向社会，推向青年中去，他与同事、好友陶秀拂等商议成立一个读书组织，并与上海生活书店的王太雷联系，从上海陆续购进了大量进步书籍，在农工银行内办起了流通图书室，成立明生读书会，吸引（也培育）了大批进步青年，在全县知识青年中掀起了一个读书运动。明生读书会还于1935年11月5日在《剡声日报》上开辟写作园地《明生》周刊。“这是一块用来供给会员们，发表意见习练写作的园地。”“我们对这刊物，预期着最低限度，不致于阻碍时代的前进；而能尽我们微弱的心力，推动时代的轮子到更高的阶段。对于我们同阶层里面的人，由于和这块园地接触，平日不大读书的，起来读点生活上

所必需的书；已读书的，提高读书的趣味，将所得的活的知识，融解在生活里，近之为个人确定正确的前途，远之为中华民族应尽的义务。”由于周刊所发表的作品立论“新异”，不久就引起了当局的怀疑而被迫停刊。从1936年5月3日起，《明生》改名为《我们的园地》。《我们的园地》在《发刊的话》中一开头便不无愤懑地写道：“在这个时代和环境里，凡是感觉比较敏锐一点的，谁都不会感到窒息的苦闷呢？这‘苦闷’，倘不相当当地发泄，准会苦闷死的！《我们的园地》就因这需要而开辟的。”《我们的园地》希望“能够给追求光明者，在推动时代的进程中一点微弱的声援”，“使产生出可供饥饿里面的大众充饥的食粮”！但是这个《我们的园地》出了4期后，又被勒令停刊。

在明生读书会炽热、活跃的读书生活的推动下，张珂表在《明生》《我们的园地》以及而后由他接替主编的《焰影》等刊物上，发表了《从生活的困难说到援助绥远抗敌军士的意义》《巩固和扩大民族统一战线》等大量观点鲜明、文字活泼、富有战斗性的文章。读书会的其他成员也纷纷提起笔，公开举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旗帜，发表了多篇在今天读来仍具有强烈感染力的精彩篇章。

——辑自《中共嵊州地方史》



大 众 书 店

大众书店是由张珂表为主开办的。开业于1936年春。当时张珂表已与上海多家进步书店取得联系，并不断从这些书店购进大批书籍，通过大众书店，不仅出售和寄送进步书刊，为嵊、新两县的文化界服务，而且引导青年关心时事，关心社会，走上革命之路。张珂表经常教导一些对社会科学缺乏兴趣、片面热衷于文学的青年，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对他们说：“想走文学的道路很好，文学艺术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是可以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表示支持他们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他又引导他们说：“文学艺术是反映客观现实，而且是为变革现实服务的。这就有个正确认识和反映现实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和反映现实，就非靠社会科学不可了。”因此，每当这些文学青年进店购书或阅览时，张珂表总是诚恳地劝他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一定要看些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认为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能正确反映现实，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于广大人民群众有益。正是这些教导，使不少文学青年在大众书店购买或阅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曹伯韩的《社会科学二十讲》、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瞿秋白的《赤都心史》和苏联列昂叶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社会科学基础读物，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改变了人生道路。因此，大众书店在宣传抗日救亡、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在青年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外，周斯明等还在长乐、开元等地组织求知读书会，也以阅读书报的形式，宣传抗日民主思想，团结进步青年。

——辑自《中共嵊州地方史》

嵊县抗敌后援会

1937年8月5日，浙江省抗敌后援会在国民党省党部召开成立大会。同月，嵊县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援会”）成立。县长方志超任主任委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俞美四任副主任委员。后援会下设政训、文化事业、民众动员、军事、财务、经济事业、总务等若干组（股），共由六、七十人组成。

中共嵊县地方组织为了争取以后援会的合法名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团结进步青年，锻炼和壮大党的力量，便设法通过民主人士等各种关系，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进入后援会。党员张珂表进入后援会后，掌握了政训组的领导权。后援会宣传方面的工作，以及所属的嵊县抗日救亡第一、第二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等宣传团体，在张珂表、陈午韵等的具体领导下，团结一批爱国青年，冲破以国民党励志社



抗敌后援会主办的《抗敌》周刊

社长、县民众教育馆馆长袁雄杰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对派所设置的种种障碍和圈套，声势浩大地开展了形式多样、有声有色的宣传活动，足迹遍布城乡，在全县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珂表等还利用合法条件，以后

援会名义主办《抗敌》周刊，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各地抗日救亡动态。

同时，当时县内一些知名人士如教育界的钱希乃、刘章新、裘翌芳等也参加了后援会的工作，并掌握了后援会一定的领导权。

1938年2月，后援会更名为“嵊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简称“抗卫会”）。在抗战形势的影响和党内外进步力量的努力下，后援会（抗卫会）在初期做了不少抗日救亡工作。如组织成立抗日救亡流动宣传队，创办《抗敌》《抗日自卫》周刊等等。但是，随着国民党从合作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之后，抗卫会内进步力量和国民党反对派力量的摩擦日益加剧。在中共嵊县党组织的指导帮助下，进步力量一方面继续利用合法地位与之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继续以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救亡活动。

——辑自《中共嵊州地方史》



《抗卫》半月刊

嵯县文化委员会

嵯县文化委员会是共产党员张珂表等利用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合法名义，团结进步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它以动员全县文化人，提高全县人民的文化水准，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

文化委员会下设战时教育组、战时讲座组、编审组、新闻组和文化工作队。在中共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努力下，这些组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尤其是文化工作队，工作十分出色，影响很大。主要开展了以下5项工作：（1）推行识字运动，每村至少设立民众夜校一所，实施台门和田野教学；（2）普及战时教育，各学校一律采用战时教材，每村布置一个救亡室，举办时事讲座，刊出壁报漫画，教唱救亡歌曲；（3）进行各种救亡宣传；（4）协助民间各种组织及各项训练事宜；（5）其他有利于抗日的各项工作。

许多城乡分队的工作也都开展得十分活跃。在开元，文化工作队开元分队在党员周联娥带领下，还办起了开元妇女合作社；由党员杜玲君、周斯明等发起，还组织了开元妇女战时服务团；在长乐，长乐分队在分队长陈布衣的努力下，办起了农民剧团。通过这些活动，团结广大青年，锻炼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基层组织。

为了进一步动员全县知识界人士积极开展抗战文化工作，由县抗卫会政训组出面，在张珂表、钱叔亮等人的主持下，于1938年暑期举办了为期15天的县文化暑期讲习会。参加学习的有98人。既学习理论，又进行军事训练，实行半天学习、半天工作，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短

张阿表纪念文集

短的半个月内，讲习会还帮助附近村庄办起台门学校 12 所，妇女识字班 5 处，成立了歌咏团、剧团、救亡室等，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受到群众欢迎。

在形式多样的文艺宣传中，以歌咏、漫画的覆盖面最广，以街头剧和戏剧的感染力最强。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不论演到哪里，观众都被感动得流下眼泪，情不自禁地喊起口号“打倒日本鬼子”，宣传效果非常好。震撼力强的另一个原因是所演剧目都能密切联系抗日斗争实际，如《张家店》《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壮丁上前线》《巧计杀敌》《最后一计》《大义灭亲》《血仇》《魔窟》等剧目，都贴近火热的斗争生活，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辑自《中共嵊州地方史》

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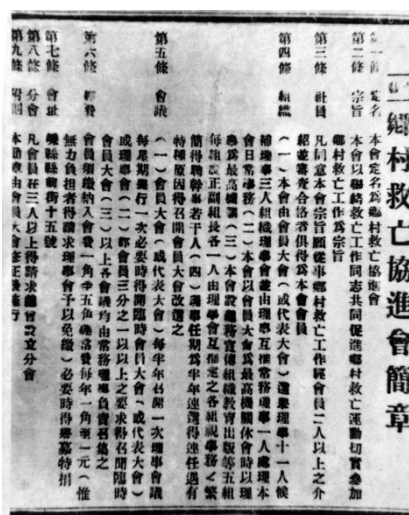
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全面抗战逐步形成，在中共嵊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张珂表与斯浪清、钱叔亮、刘章新等一批进步青年，

于 1937 年 12 月 19 日发起成立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简称“乡救会”）。

乡救会会址设在县前街 15 号。

乡救会是中共嵊县地方组织领导的一个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抗日救亡团体。它有自己的会章、分会简章、政治纲领、会员守则、组织活动等一套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和组织纪律。

乡救会以联络救亡工作同志，共同促进乡村救亡运动，切实参加乡村救亡工作为宗旨。“不分阶层和派别，一切有爱国抗日之



乡村救亡协进会简章

鄉 村 救 亡 協 進 會		會 員 登 記 表	
通訊處	最近	職業	年齡
水入			性別
			介紹人

茲願加入
鄉 村 救 亡 協 進 會 為 會 員 遵 守 本 會 章 程 執 行 本 會 議 決 案 如
有 違 反 本 會 宗 旨 情 事 願 受 本 會 嚴 格 的 罰 裁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立 志 願 書

乡村救亡协进会会员登记表

心者，都在真诚联络之列，以便共同对付中华民族的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乡救会的使命是：联络一切在干或可能干救亡工作的同志，集中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共同促进乡村救亡运动，以巩固民族解放战争的部分基础。

乡救会政治纲领的基本精神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大众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知识出知识；争取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日之绝对自由；发展农村经济，废除苛捐杂税，实行二五减租；实施抗日救国的新教育；反对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反对动摇妥协；实现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根据乡救会的政治纲领和宗旨，要求会员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会员守则规定，会员必须做到：一、绝对忠实于民族解放斗争，应有牺牲一切的精神；二、有持久的战斗决心，忍受一切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艰苦；三、和广大的救亡运动取得步调一致，不干扰大众的抗日联合战线；四、随时执行救亡阵线的作战计划与行动决议；五、心地光明，态度和

蔼，虚心接受批评；六、绝对遵守纪律，永不作任何的背叛言行。

乡救会的会章规定：全体会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并由理事会推选常务理事1名，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候补理事5名。理事会下设总务、教育、宣传、组织、出版5个组，分别设正副组长。同时设乡区督导员，监督指导区乡分会工作。会员3人以上者成立分会，根据实际需要分会可设主任干事1人，干事若干人，下设总务、组织、教育等股，各负其责。



《群力》半月刊创刊号

乡救会创办《群力》半月刊作为它的会刊，创办《群力》的意图“在神圣的反日斗争中尽一点‘唤起民众’的本位责任。”前后共出过四期，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方针和各地的抗日救亡动态。

乡救会成立时会员四十余人，不几月发展到四、五百人，最多时达到七、八百人。开过四届理事会，下有四十多个分会。“一流”“二流”“政工队”“区、乡自卫队”等抗日群众团体中，都有会员在起作用（详见《会友们的动！》一文）。正当乡救会方兴未艾之际，国民党当局以统一救亡团体起见，于1938年夏，下令解散，改组为“抗日自卫委员会”这个官办机构，所谓“统一领导抗日”。

说明：本文根据钱叔亮同志保存的《乡村救亡协进会简章》《分会简章》《乡救会政治纲领》《会员守则》《政治教育大纲》《工作纲领》《组织工作计划》《出版计划》等资料编写而成，资料现存市档案馆。

乡村救亡协进会简章

第一条 定名：本会定名为乡村救亡协进会。

第二条 宗旨：本会以联络救亡工作同志，共同促进乡村救亡运动，切实参加乡村救亡工作为宗旨。

第三条 会员：凡同意本会宗旨，愿从事乡村救亡工作，经会员二人以上介绍，并审查合格者，俱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 组织：

（一）本会由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选举理事十一人，候补理事三人，并由理事互推常务理事一人，处理本会日常事务。

（二）本会以会员大会为最高机关，休会时以理事为最高机关。

（三）本会设总务、宣传、组织、教育、出版等五组，每组设正副组长各一人，由理事会互推定之，各组视事务之繁简，得聘干事若干人。

（四）理事任期为半年，连选得连任，还有特种原因得召开会员大会改选之。

第五条 会议：

（一）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每半年召开一次，理事会议每星期举行一次，必要时得开临时会员大会（或代表大会）或理事会。

（二）经会员三分之一以上之要求得召开临时会员大会。

（三）以上各会议均由常务理事会负责召集之。

第六条 经费：会员须缴入会费一角至五角，经费每年一角至一元（无力负担者得求理事会予以免缴），必要时得举募特捐。

第七条 会址：嵯县县前街第十五号。

文献辑存

第八条 分会：凡会员在三人以上得请求总会设立分会。

第九条 附则：本简章由会员大会修正施行。

原载《抗日自卫周刊》第七期

嵊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组编

一九三八年四月廿四日出版

组织乡村救亡协进会缘起（摘要）

斯浪清

发起组织乡村救亡协进会，拟联合有相当认识的知识分子，先湔除自己站在云端说话与乡村群众脱节的陋习，来肩起启迪民心，促进乡村救亡运动的责任，以宣传唤醒民族意识，以教育树立民族精神，以组织坚强的民族阵线，使群众了然于参加民族解放斗争使命的重大，感到与政府间消除脱节状态之迫切需要；同时由于乡村救亡运动之勃起，促使政府更深切感到决胜中心在全国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原载《群力》创刊号
嵯县乡村救亡协进会、农业推广区编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出版

附件三

介绍《群力》半月刊（摘要）

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农业推广区合编

在这伟大的时代里，热忱的民族儿女，都愿摒弃他的一切为民族生存而奋斗。但大部分人因为对各方面的了解不够，不能积极地从事他愿意做的事情，他们极需一种精神上的食粮，来认识社会，认识自己。可是由于交通的阻梗，适合时代需要的读物，很不容易求到，这是一种极大的缺憾！

现在乡村救亡协进会和农业推广区联合出版一种刊物——《群力》半月刊，这在文化极端贫乏的嵊新两县，尤其是在当前一般人渴求着精神食粮的现在，是值得赞扬的！

原载《抗日自卫周刊》第四期

嵊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组编

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出版

理事会议记录

乡救会先后经历了四届理事会，其重大决议都有记录，现除第一届无材料外，其他各届会议记录如下：

第二届理事会议

地点：农工银行

时间：二十六年（1937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七时

出席：斯谦祥、钱叔亮、张珂表、金佩章、马彝准（钱铁民代）、刘章新

主席：斯谦祥 记录：张珂表

讨论事项：

- 1.修正通过教育组、宣传组拟订的工作计划。
- 2.议决出版刊物一种。
- 3.议决聘请周丹虹、丁友灿、袁远之、王正山为督导员。
- 4.议决聘请钱铁民、曹鸣亚、章其贤、范绳志、朱轶吾为总务干事。

散会

第三届理事会议

地点：农工银行

时间：二十六年（1937年）除夕

出席：张珂表、沈新君、钱叔亮、金佩章、斯谦祥、马彝准（钱铁民代）

列席：周醉飞、张名舟、张珂镛

主席：斯谦祥 记录：张珂表

文献辑存

报告事项：常务理事报告备案情况

讨论事项：

- 1.议决修正通过组织组拟定分会章程及工作计划。
- 2.通过钱叔亮提聘丁正献为督导员案。
- 3.通过周一松提聘倪寒若为独立干事案。

散会

第四届理事会议

时间：1938年1月8日

出席：张珂表、沈新吾、斯谦祥（钱铁民代）、杨予真、钱叔亮

主席：钱叔亮 记录：张珂表

讨论事项：

- 1.修正通过教育组拟订本会政治纲领、会员守则等。
- 2.修正通过出版组拟定出版计划案。
- 3.通过聘请徐巴盾、袁人樑为组织干事案。
- 4.修正通过组织组拟定督导员任务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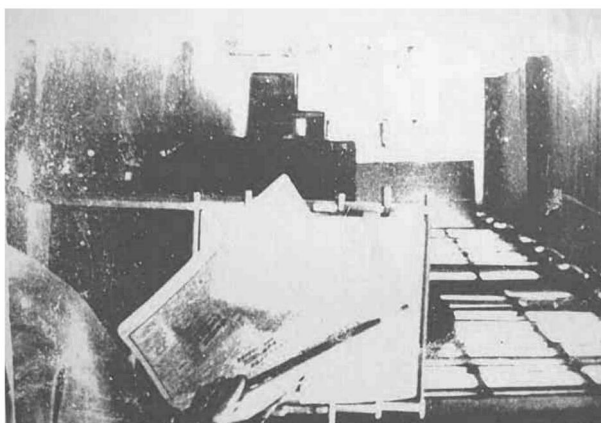
散会

附记：此会议记录是从钱叔亮同志保存的材料中抄录的，现存市档案馆。

——辑自《嵯县党史资料》1981年第四期

群力书店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嵊县新昌地区的广大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纷纷走上抗日救亡道路，中共嵊县县委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抓住“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有利时机，在农工银行流通图书室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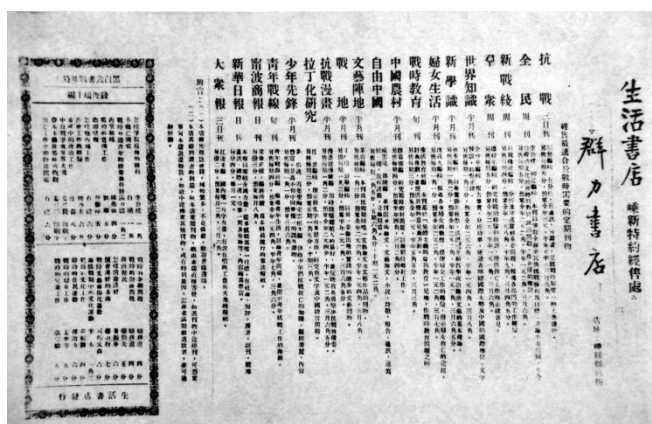
群力书店一角（原市心街元帅庙）

明生读书会的基础上，于1938年4月24日在嵊县县前街（即元帅庙附近）15号，创设了群力书店。群策群力办好书店，是在全力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革命宣传工作，并以书店作为党的联络站。通过书店联络各地接线人员，以及转送党的秘密文件等等。

群力书店的经费筹集、人员安排、书店方针等重大问题，都是中共嵊县县委张珂表同志直接领导的。书店创办的经费：一是筹募，二是买股票。股东大部分是商店职员、进步青年、学校师生。每股2元。经费安排、经营管理等事务由店员支部章宝林兼管。书店从筹备到正式开张，都由回乡工人懂得商业经营的薛仲三经手。薛在创设过程中表现较好，所以书店成立后，由薛任经理。店员钟德丰、宋曼卿（薛妻）、杨国华都是地下党员（先后脱党），对书店布置任务、研究工作等除张珂表直接随时领导和指导外，有时张和钱叔亮（城区区委书记，公开的职业为

剡山小学教员)事先研究商定以后,再叫薛仲三参加,共同商决实施。在政治上的重大事情如宣传中心、联络站工作,都由张、钱代表党组织的意图由薛办理。后来张珂表因工作任务太重,体力不济,就委托钱叔亮代兼领导。店内建立党小组,每次组织生活会由钱叔亮或店员支部负责人章宝林主持,学习党内文件、交流思想、研究工作、部署任务,因而能较好地开展工作。

如何办好群力书店?张珂表同志曾经说过,群力书店要仿照上海邹韬奋办的“生活书店”那样的做法,使书店能真正起到一个革命“精神食粮供应站”的作用。这就是办书店的方针。因此,在



群力书店经销的书刊

《群力书店创设缘起》一文中说：“抗战爆发以来，由于交通阻梗，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都发出文化饥饿和精神食粮缺乏的呼声。”创办书店就是“想来担负起一部分填补前项缺陷的任务”“尽可能地寄售及代办适合战时需要的书刊，以期抗战文化普及于每一个角落，使发生广大和力量，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群力书店与上海的几家进步书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受当时上海出版战时书刊最丰富、最有权威的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天马书店及读书生活出版社之委托，为嵊县、新昌两地特约经售处。同时还大量经售最适合于战时需要的各种刊物，例如：邹韬奋主办的《抗战》三日刊，李公朴、柳湜编辑的《全民》周刊，金仲华编辑的《世界知识》半月刊，潘梓年办的《群众》周刊，薛暮桥编的《中国农村》半月刊，茅盾编辑的《文艺阵地》半月刊，丁玲、舒群编辑的《战地》半月刊等二十余种，以及《巴黎时报》等党内刊物、马列著作

张珂表纪念文集

和革命进步书报。书店还负责指导和供应乡村救亡室的图书供应，印发一个救亡室最低限度应备的书目，这些报刊的发售和革命思想的传播，深受各界人士和知识青年、工农群众的欢迎，“生意”确是兴隆。

群力書店
——為讀書界教育界忠誠服務——

經售：適應戰時需要讀物
代辦代定：全國正當書報雜誌
兼售：學校教育用品

委託代辦代定書報雜誌手續

- 一、委託人及收件人姓名、地址，都請用正楷分別寫明。
- 二、書籍名稱、著作人姓名、價格、部數、出版處、雜誌名稱、全年半年或一季、份數、起訖期數、出版處，都須詳細開列。
- 三、購書或預定雜誌，概須付足書款。
- 四、本店接辦後，先發給單據，一面即發函代辦，辦到即行連同發票將書寄上。如有餘款，寄還或暫存本店都可。
- 五、本店印有購書及定刊通知函，備讀者索填。

店址：嵯縣縣前街十五號

群力书店的广告

群力书店通过发售进步书刊，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团结和教育了工农群众、青少年知识分子，深受进步人士的欢迎和拥护，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因而也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怀疑和仇恨。

1939年上半年，革命形势逆转，生活书店、新知识书店在各地的分店，均先后被查封。群力书店也早发现常有小特务监视，故意以购书为名，探视书店来往人员和动态，秘密上报专署和省政府，以便待机下手。就在这年8月，嵯县群力书店也被县长方志超命令查封关闭。

群力书店被查封后，我地下党决定在长乐创设长风书店，派地下党员钟德丰、石磊去继续发售进步书刊和做地下联络工作。同时决定在城关以“新城”为名，在原群力书店地址开办新城书报文具社，继续作为党的文化阵地。经过斗争，一个月后启封清理书报物资。并于1940年1月1日，一家名叫“新城”的书店又开出来了。但由于当时形势，薛仲三胆小怕事，这家书店没有起到什么政治作用。

说明：本文根据钱叔亮同志保存的资料整理而成，资料现存市档案馆。

附件一

群力书店开幕

文化中心从上海移到武汉以后，新、嵯两县因为交通的阻梗，无法订到或买到适合抗战时期需要的书籍杂志，一般青年因此闹着精神上的饥荒，在这伟大时代的前面，得不到理论上的正确指示。

陷于苦闷彷徨，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缺憾啊！为着要填补这个缺憾，有几个青年发起创设一爿小规模的书局，定名为“群力书店”，来尽可能地寄售及代办有价值的书刊，出版适合一般需要的刊物，及翻印不易大量办到而社会所急需的小册子。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它经过相当时期的准备，已于今天（一九三八年四月廿四日）开幕，地址在嵯县县前街十五号。

原载于《抗日自卫周刊》第七期

嵯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组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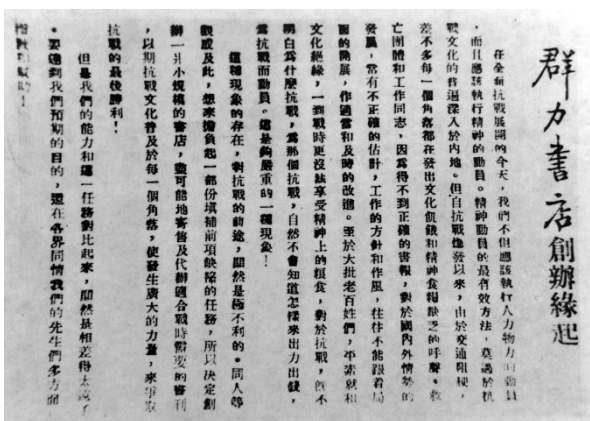
群力书店创设缘起

在全面抗战展开的今天，我们不但应该执行人力、物力的动员，而且应该执行精神的动员。精神动员的最有效方法，莫过于抗战文化的普遍深入于内地。但自抗战爆发以来，由于交通阻梗，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都在发出文化饥

饿和精神食粮缺乏的呼声。救亡团体和工作同志，因为得不到正确的书报，对于国内外情势的发展，常有不正确的估计，工作的方针和作风，往往不能跟着局面的开展，作适当和及时的改进。至于大批老百姓，平素就和文化绝缘，一到战时更没法享受精神上的食粮。对于抗战，既不明白为什么抗战，为那（哪）个抗战，自然不会知道怎样来出力出钱，为抗战而动员，这是够严重的一种现象！

这种现象的存在，对抗战的前途，显然是极不利的。同人等观感及此，想来担负起一部分填补前项缺陷的任务，所以决定创办一爿小规格书店，尽可能地寄售及代办适合战时需要的报刊，以期抗战文化普及于每一个角落，使发生广大的力量，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但是我们的能力和这一任务对比起来，显然是相差得太远了。要达



群力书店创办缘起介绍

文献辑存

到我们预期的目的，还望各界同情我们的先生们多方面的指教和帮助！

原载《抗日自卫周刊》第十期
嵊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组编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周瑞赓交代查封群力书店的经过

群力书店系一进步书店，设于嵊县县前街县政府门前。它发售宣传马列主义、人民革命的进步书刊，是当时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活动中心。当初我教育科工作人员没有注意，后来查报上级处理，把它封掉。

查封书店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九三九年约四、五月间，县政府先后接到省政府和三区专员公署的快邮代电训令，和查禁书刊目录一份（内例举查禁书名约有二、三种），飭县政府立即进行查禁。县长即令警察局派员到各书店检查，将查获红色书刊送县府秘书室封存。又令教育科具体查办群力书店，我派督学费德轩去执行，费发现出售的书中有禁书《红色的延安》《唯物辩证法》《社会发展史》等七、八种，就把这些书搜来封存于县府楼上，情况上报专署。

约过了一个月，三区（绍兴）快邮代电命令：飭县长将群力书店翔实情况报备核办。命令转到教育科，我又叫费去执行，费查察：情况向县长方志超汇报，方即令我翔实情况报告专署核办。我用快电呈报专署，其大致内容是：一、群力书店贩卖赤色禁书，经查获有《红色的延安》等多种；二、书店是异党分子活动、聚会的中心，白天只有几个店员，夜里很多行踪可疑的人，进进出出，密谋不轨，到深更半夜才散去；三、应如何办理请核示！代电以县长名义发出。

一九三九年八月，专署又以快电飭县长查封群力书店，代电内称：“嵊县县长方志超X年X月X日数字第X号代电悉，据报，群力书店贩卖赤色禁书，供异党活动，图谋不轨，应予封闭，勒令停业，仰即遵办

具报。”电尾署名三区专员公署（当时专员杜伟）。公文到县，方志超即叫我去执行，我与费德轩拿了封条，到店出示专署查封令，在店门贴上了封条，把它封掉了。

不久，有人向县政府呈请开设新书店，并通过城区区、镇长，向县长说情将原群力书店的店屋及其设备转交使用，经县长批准，一家叫“新城”的书店又开出来了。我们又经常去店查看，也没有发现重大情况。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四日

附记：周瑞赓于1938年7月至1940年4月底任嵯县县政府教育科长兼政治工作指导室副主任，是1939年查封群力书店的当事人，交代时在青海劳改农场。

——辑自《嵯县党史资料》1981年第四期

第一流动宣传队

嵊县抗敌后援会第一流动宣传队是党组织领导的一个抗日救亡群众性宣传团体。它成立于1937年9月。

当时，上海工人大批回乡。王寄松回嵊后，与张珂表商量，把失业的青年工人、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一支精干的流动宣传队，深入农村进行宣传，以便把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发动起来。张珂表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

通过他们串联动员，一批热血青年（约有三四十人）很快报名要求参加宣传队。经过研究，吸收了真正有勇气、有决心参加，又有宣传才干的张欣森、尹仲芳、沈天麟（钟林）、樊宏法、石荣昌（石磊）、王寄松、周云青、丁仕农、王庄宵、沈彩虹、章文君等16名青年。其中工人12名，学生4名；有女青年3名。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是共产党员。

9月上旬，经过国民党县政府同意，宣传队在县城钱业公所正式成立。全队分总务、组织、宣传3个组。张欣森任队长兼总务，王寄松分管组织，尹仲芳分管宣传。中共宁绍特委和县委成立后，特委委员邢子陶专门到队帮助秘密组建了中共党支部。张欣森任支部书记，王寄松、尹仲芳为支委。

宣传队成立后，克服了缺乏经费、宣传工具、导演以及来自家庭、社会的阻力等多种困难，经过队员们为期月余的艰苦排练，很快学会了《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活捉东洋兵》等五六出话剧、活报剧和二三十首救亡歌曲，又自己动手创作了几十幅宣传画。根据宣传活动的需要，张珂表还设法从县政府要来了每月11元化妆津贴费。

排练一结束，立即下乡。第一次流动到北乡宣传，经里坂、沙园、禹溪、屠家埠、故江、张岙、三界茶场、三界，再经塘岙、仙岩、浦口等地返回；第二次重点是东乡，到东郭、官地、白泥塘、许宅、北漳、华堂等村庄；第三



第一流动宣传队全体成员合影

次在西南乡村，去花田、隔水、甘霖、大王庙、开元、太平、辅仁（今石璜）、崇仁等地；第四次在三界，主要为当地驻军演出。

第四次演出活动，是骆宾基联络安排的。骆宾基是一位著名文学家，上海八一三战事后，经茅盾、胡愈之介绍，化名张璞君，来嵊县三界“浙江省茶叶改良试验场”吴觉农（上虞人，著名茶叶专家）处，一面在茶场工作，一面做抗日救亡工作，并在嵊县加入共产党。他在茶场附近的石山头、茶园头村办了两所农民夜校，宣传抗日救亡，组织嵊县农民抗日协进会三界分会和抗日自卫队。还与附近的知识青年一起成立了抗日救亡联谊会和茶场抗日救亡宣传队，创办《七七周刊》。他以茶场为基地，开展救亡工作，和分会主任黄传洪、灵芝乡小学校长黄松岳、茶场场长吕允福等，在群众中积极开展宣传活动，争取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经他培养、发展，黄松岳等多人参加共产党，建立了党的支部。当时嵊县党的基础主要在嵊西和嵊东，嵊北还是空白，党组织要他负责嵊北地区的工作，并参加县委，任县委宣传部长。他还积极做好争取国民党军队的工作。当时国民党十六师四十八旅驻在三界地区，旅部就在茶场，与骆宾基的办公室相邻。他遵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与该旅旅长刘勋浩搞好关系，借《丁玲在西北》《西行漫记》《朱德论游击战》等书给刘看，以三界救亡协进会的名义和四十八旅举行军民联欢会等。

该旅是从上海抗战前线退下来的，对抗日救亡有热情。为了更好地争取他们，骆宾基把该旅的情况和他们希望派宣传队去宣传等要求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根据汇报和该旅的要求，派出第一流动宣传队到茶场对该旅作慰问演出，并随队带去了大量进步书刊，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演出后，该旅官兵表示一定要抗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并提出要流动宣传队参军作为该旅宣传队的要求。

每次下乡演出约一个月，然后返城休整，由特委书记顾玉良帮助宣传队总结工作，并布置下一次的宣传任务。

宣传队的演出活动十分活跃。他们每到一村，首先绕村一周，吹起军号，唱着嘹亮的救亡歌曲。这一吹一唱，就把全村的青年，特别是失业失学的青年从屋里吸引出来了。他们见到宣传队，便热情地帮助宣传队搬东西、借道具，介绍村里的情况。宣传队员也主动和他们交朋友，拉家常，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出来看热闹的小朋友更多，宣传队便把这些孩子们组织到空场地上，集中在一起兴致勃勃地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漫画组一进村就忙于把几十幅漫画张挂起来；标语组选择街头村尾的墙上忙着书写醒目的大标语。往往不到两三个小时，一个几百户的村子便就轰动热闹起来。

晚上的演出宣传效果最好，也是宣传活动的高潮。由于这些年轻的宣传队员炽热的感情、充沛的精力，使每场演出总是满怀真情，情节逼真，深深吸引了广大观众。看着宣传队精彩的表演，农民们在一天劳动之后，站在台下看戏，完全忘却了疲劳。他们一站两三个小时，始终保持着热烈的情绪。每当宣传队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剧中人一青工突然从台下跳到台上，为那受苦的流浪姑娘打抱不平时，台下观众齐声叫好，掌声、欢呼声接连不断，一阵高过一阵。有一次甚至引起误会，当剧中人青工跳上台去时，观众中也有人跟着上台去打抱不平，竟动起真来，演出效果之好于此可见！每次演出，宣传队还插演四五个精彩的小节目，或在节目演出间隙向群众领唱救亡歌曲，台上台下自始至终沉

浸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

宣传队还利用分散到各户吃饭的时间，开展家庭宣传和交朋友活动。他们回答农民群众诸如“日本佬真的会打到我们这里来么”“前方打得怎样了”“中国真的会亡吗”等问题，起了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

但是，宣传队的活动，却遭到当地反动势力的阻挠。一次在三界附近的一个村庄演出时，一位保长表面上招待十分殷勤，到了晚上即将开演时，他却以要开保民大会为由，请队员们休息，企图阻挠演出。在有的地方，恶势力干脆公开扬言反对宣传队，反对宣传抗日，有的借故请“小歌班”来替代宣传队的演出。1938年春节期间，宣传队又突然接到励志社社长、民教馆长袁雄杰开茶话会的通知，以抗战要有领导为由，提出要队员集体参加国民党励志社，遭到队员们的一致拒绝。袁的阴谋遭到挫败，为报复和限制宣传队，在一个星期后，县抗敌后援会便取消了给宣传队每月11元的化妆津贴费。

中共宁绍特委及时研究了宣传队所遇到的情况和处境。当时驻三界的四十八旅曾请求宣传队参加他们的部队，作为该部的一支宣传队。经吴觉农、骆宾基与该旅谈妥，在政治上不干涉、以团体名义、不分散参加该部宣传工作和允许来去自由的条件下，宣传队集体加入部队。1938年4月，全队队员正式集体加入部队。宣传队先后随该部赴绍兴、萧山、富春江及江西等地前线，随军宣传，后因部队溃散和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形势逆转，宣传队党支部遂以不少队员身患疾病为由，于当年9月份集体退出返回嵊县。返嵊后，一部分队员如王寄松、张欣森、王庄霄、沈彩虹、尹仲芳、钱立民等，根据党的指示，由县委介绍先后去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一部分仍留在县内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中除个别外，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这样，为时一年的第一流动宣传队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辑自《中共嵊州地方史（一卷）》

第二流动宣传队

嵊县抗敌后援会第二流动宣传队的前身是辅仁剧团。

辅仁剧团创办于1937年9月，在辅仁乡寺根村成立。它的实际发起者和组织者也是张珂表。团长由国民党辅仁乡乡长张月舟挂名，具体工作由小学教师、副团长周丹虹负责。办团的宗旨和任务是“唤醒民众，共同抗日”。剧团成员主要是上海失业回乡工人和当地小学教师。开始时，团里共产党员有钱松泉、叶林喜和张仁魁等。不久，周丹虹、周斯明、钱立民、钱章平、钱荣坤（钱正才）等也参加了共产党。剧团内设联络、宣教、剧务、总务等组。宣传形式有口头、漫画、标语、壁报、话剧演出等。剧团成立之初，宣传活动范围仅限于辅仁乡各村，不久扩大到开元、太平、长乐等地。

剧团创办不久，碰上经费困难，经与张珂表商量并通过他对县抗卫会做工作，于10月份将辅仁剧团改名为嵊县第二流动宣传队，纳入县抗日自卫委员会领导。此后，第二流动宣传队也同第一流动宣传队一样，活动范围扩展到全县城乡。东到北漳、华堂，南到天兴潭，西到湖双、上周（东阳县），北到三界、王城（绍兴县）、苦竹溪，以及里东山区，全县43个乡镇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第二流动宣传队员的身影和足迹。

周丹虹、周斯明、张益瑞、钱章平、章文君（张梅卿）等先后担任过第二流动宣传队的队长。该队也秘密建立了党支部，由钱松泉任支部书记。

第二流动宣传队的宣传活动同样深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赞扬，也受到国民党地方反动势力的反对。1938年四五月间，曾一度被袁雄杰勒

令“暂停活动”而解散回乡。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之际，于1939年9月被勒令解散。此后，全队18名队员多数参加了皖南新四军和浙东三五支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解放作出了贡献。

——辑自《中共嵊州地方史（一卷）》

城区业余宣传组

1938年4月，在张珂表、沈新吾、赵大葆等人的努力下，发起并以县抗卫会的名义成立了“城区业余宣传组”。

业余宣传组“挂国民党的牌子，做共产党的工作”。名义上由抗卫会领导，实际上是在中共嵊县县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活动，县委副书记张珂表、城区区委书记竺曾撰等直接参与领导。宣传组宣传贯彻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全县城乡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宣传活动中，还培养和吸收了一批工人、知识分子参加党的组织，到



1938年9月业宣组在雅致、雅良宣传演出后与当地农民积极分子合影

1939年春，组内已有党员14人。在嵊县抗日救亡运动史上，城区业余宣传组的活动，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业余宣传组由钱铁民（汪集丰钱庄学徒）任组长，王化钧任副组长（后为汪维城）。下设歌咏、戏剧、口演、文教、军训

等股。组内秘密建立党支部，钱铁民任支部书记。

业余宣传组成员大部分是城区的青年店员、工人，学徒和部分小学教师、嵊中学生。1938年暑期是业宣组大发展时期。他们在假期里成立了暑期歌咏队，举办歌咏大会，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

《新的女性》等革命歌曲，热烈地上街头宣传、张贴标语，定期出壁报、漫画，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和影响。业宣组开展活动不久，大批

青年踊跃加入，最多时到达近百人。业宣组还开办民众夜校，

自编《穷人要翻身》《打倒日本鬼子》等教材。还举办了三期

救护训练班，进行空袭、救护、卫生知识等教育和训练，培训

救护骨干。他们还学习革命老区的经验，在组内成立了在宣传活动中很有影响、吸引人的“孩子剧团”。



1938年12月业宣组在石璜一带演出后与当地群众合影

业余宣传组虽为业余性质，但队员们夜以继日地投入了各项活动，

热情非常高涨。常常是晨间军训，学习游击战术，越野赛跑；上午学习、排演，下午、晚上宣传演出。开始主要在县城和郊区一带活动，后来扩大到平原和山区农村。先后到过甘霖、崇仁、石璜、长乐、苍岩、沙园、仙岩、三界以及新昌县的澄潭、镜岭等地乡村。除了宣传演出活动外，还多次为前方抗日战士及难民开展募捐活动，带着募捐来的慰问品去黄泽附近的普安寺难民收容所慰问难民。



业宣组到新昌镜岭演出，途经澄潭进入山区时合影

城区业余宣传组活动地点从限于

张珂表纪念文集

城区到冲破区域界限，奔赴全县乡村；成员由少到多，从知识阶层发展到社会上的店员、职员、儿童，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全县较大的群众救亡宣传团体。他们的活动，震动了地方国民党反动势力，视他们为“危险分子”“小疯子”，对他们施加压力和限制，而这群热血青少年依然“吃自家饭，干救亡活”，风里来雨里去，在反动势力公开出面威胁、利诱、造谣、恐吓、捣乱面前，毫不妥协、后退。后来，在国民党反共高潮行将到来之际，正好满一周年的业宣组，在县长方志超亲自出面干预下，也被勒令解散。

——辑自《中共嵊州地方史（一卷）》

纪念文萃

导 语

本篇辑选了张珂表生前的战友、同事及亲友等撰写的纪念文稿，全面展现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怎样来纪念伟大的死者——张珂表

珂表死了！珂表在这个不应该死的时间和空间里竟这般死去，只要是爱护家乡、爱护祖国、爱护整个中华民族而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必然的而且应该要痛哭流涕。然而这又怎能挽救他的生命呢？珂表有知，必不喜欢我们作无谓的哀悼和痛伤，以及种种消极的于事业丝毫无益的举动。所以我们在今天，首先要明白他的伟大处在哪里：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敬佩和纪念？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他有什么精神可以不死？他有什么事业可垂永久？诸如此类，凡是珂表的爱护者、景仰者、痛悼者的我们，均应彻底了解，因为我们要以实际工作来纪念他，继承他！整个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伟大事业，决不容许我们停留片刻，决不容许我们舒缓地为一个战士的死去而影响救亡工作的进行。这就是说时代迫令我们飞快地跑过伟大的死者的灵前，又飞快地接受了他给予我们宝贵的遗产，加速地向着光明和真理的大道上奔驰，那末（么），珂表所给予我们的整部遗产究竟是什么呢？

- （一）私生活非常严肃。
- （二）有不疲倦的虚心学习精神。
- （三）忠诚笃实，积极勇敢。
- （四）处处争取工作，时时争取工作。
- （五）不出风头，不做领袖，丝毫没有英雄主义的色彩。
- （六）切实执行自我批判。
- （七）坚毅不拔，牺牲奋斗。

(八) 为真理公义的申张，不放过一个机会一秒时间一分精神。

(九) 为抗战救亡而病，为抗战救亡而死。

珂表所给予我们的伟大遗产，当然不是这几点可以包括他的整部，但我们希望爱护珂表、景仰珂表，同时爱护祖国、爱护整个中华民族的同志们，虚心地接受珂表整部的遗产，不痛哭、不悲观，在工作中来哀悼他，在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上来纪念他。因为这样，才是最合理，最有价值，最对得起我们的战友——张珂表同志！

张珂表追悼会筹备会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辑自《嵯县党史资料》1981年第二期

纪念他 继承他

流 沙

像是一个晴天的霹雳，十月三十一日的傍晚，在乡间接到X X兄的电话，使我呆呆地怔了半天。

刹那间，我不相信这会是事实，但摆在面前的分明不是梦境，这才明白珂表兄确已抛弃了我，以及许多的朋友和事业，长别人间了！

我和珂表兄已有着五年的密切的友谊，讲到认识还远在十年之前，所以有许多地方，我应该比其他朋友更知道一点。

他自始就是一个精心学问的淳朴的青年，平时很少说话，虽然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却没有一点无谓的应酬，更没有丝毫的不良习气，但他的待人接物，却又是比任何人和蔼可亲，无论对上层，对朋友以至对待一个贩夫走卒，他都同样以一副亲热的笑脸给人们以一种温暖的愉快的感觉。他从来没有一次厉声疾色的行动，或者也有少数人对他不抱好感，可是他却仍然以一种和平的态度去对待，他不愿轻易和人们有着无谓的纷争。他对事业很负责任，只要一件事，他认为值得做的，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担当起来。如果他的精力还有余裕的话，他更能帮助人家完成他所不必负责的部分和他自己的一样。因为他有了深刻的理论教养，很明白事情是大家的、共通的，根本用不着责任的分界，所以他不推诿，不好名，更不在人们的前面来炫耀自己的功能。尽（管）有许多事，他做了，却并不把（霸）来属于自己的。

他更有常人所少有的耐心，他耐心的学习，再耐心地教育人，自己

不厌倦，也不使人家厌倦。在一个团体的里面，他有条理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工作，不使某人感到太重负，也不使某人没事做。如果在工作上面有一个人犯了错误，他总是耐心地去纠正他和说服他，一次、二次、再次的直到他自己觉得错误为止。他从来不肯轻易放弃一个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着他的效用的，他又认为自己并不是万能的，所以他的教育人，也从来不是用一种领导者的身份出之的。他使每个人都对他像兄弟一样的可以亲近，这样，使人们都敢于向他提供意见共同商讨，以提高集团间的一般认识水平，增进工作的效能，许多坚强的干部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

和平、忍耐、负责是他毕生的特点和美德。九一八以后，他就在荒漠的原野上，开垦出可耘的田地，播下了救亡的种子。直到七七事变，中国开始了全面抗战，他就毅然参加县抗卫会工作，一手组成数个宣传队，在他的策动下，救亡运动有了广泛的开展。

他是把整个的身体都贡献给国家了！随着工作的开展，使他忙得透不过气来，每夜他照例要和同志们检讨这一天工作的收获和计划着明天的工作怎样去进行，还要答复许多朋友们的来信。这样，他差不多每夜要挨到一、二点钟才能睡，而第二天的早晨他又要很早起，照例要做他的日常功课——编壁报。

在这样的忙迫状态之下，他的精力是渐渐地衰退了！可是他却从没有注意到他的健康，而且时间也没有余裕容许他略事休养，工作使他兴奋得忘记了身体，忘记了家，忘记了一切私有的事物，虽然有时他会感到疲惫，但这只是刹那间的事，根本不能阻滞一个斗士前进的步伐。

虽然在病中，他还是不肯放下工作，直到进入危险期，这才听从许多人的劝告赴甬就医。在医院里，他也还多次来信，期期以救亡工作为念。

可是斗士终于疲乏了！终于像泰山倾颓一样倒下去了！这是一个无比的损失，无论怎样都不能取得补偿的！

张珂表纪念文集

现在他是离别我们去了！留下的是一付从他肩上卸下来的重担，需要我们去勇敢地担负起来！

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斗士，我们应该忍住悲哀，咬紧牙关，继承他的遗志，加倍努力去完成抗战建国的任务，把日本帝国主义者驱出国境去！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日深夜

原载《抗卫半月刊》第五期

——辑自《嵯县党史资料》1981年第二期

珂表葬礼

张珂表同志为革命不遗余力，以身殉职，噩耗传来，同人痛哭。灵柩从甬运嵊，在北站开了悲壮的追悼会。其祖父张西来先生、姑父刘河洲及其家属裘湘燕（襄慈）、子传师、女勤争在场，送丧者有地下党组织和抗日自卫委员会、流宣队、业宣组、农工银行、储蓄银行、汪集丰庄等同事、同志以及生前友好、革命群众不下五六百人，无不哀恸。送丧队伍由北站至西站长长排列，沿途高呼“张珂表同志精神不死！”……可谓感人至深，灵柩运回独秀山麓安葬。

——辑自《嵊县党史资料》1981年第二期



张珂表葬礼

纪念嵊县建党五十周年 怀念建党奠基人张珂表同志

王寄松

全面抗战前夕，日寇侵略步步深入，蒋介石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亡国灭种政策，亡国之危迫在眉睫。嵊县人民的优秀子弟张珂表，热爱祖国、忧于国事，他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和共产党的资料，组织进步青年成立读书会，共商国是。他勤于写文章，文字通俗易懂，发表在公开的报刊上，有时也出专刊，宣传抗战，团结了许多爱国抗日的知识青年，形成了一个抗日救亡的中心。

他热爱共产党，接受共产党全民抗战的思想。七七抗战开始，他带领爱国救亡的青年办壁报、出快讯，报道抗战消息，并发表简短时事评论，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唤起广大人民群众被压抑的救亡热情。

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上海回嵊丝绸工人中的地下党员，在抗日活动中和张珂表接上了关系，共同商讨抗日救亡活动。同年九月，中共上海地下党派骆又余来嵊联络党员，考察了张珂表的历史和现实表现，解决了他对党如饥似渴的追求，吸收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他入党后，忠于入党的誓言，坚决执行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各项政策，更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事业。张珂表是抗日初期（全面抗战），嵊县建党入党的第一个党员，又是一个大家学习的楷模。

他对各阶层的政治人物，上自社会名流，下至工农群众，只要赞成

抗日，他都能把他们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全面）抗战初期，从上海撤退过嵯的抗日救亡团体、知名人士似过江之鲫，他以抗日救亡的名义与之联系。暂留居三界茶场的全国知名的抗日人士吴觉农、王芸生等，他真诚访问聆教，得到吴、王等的帮助，使抗日流动宣传队在宣传技巧上学到了不少东西，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鼓励。上海电影演员邢申招回嵯时，珂表邀请他到“一流”作技术指导，提高了流宣队的演出水平。参与八一三上海抗战后撤退移驻嵯县的国民党陆军四十八旅旅长刘勋浩，热爱祖国，赞成全民抗战。珂表就动员嵯县第一流宣队参加该部，担负起抗战部队的宣传政治工作，以提高广大官兵抗战到底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同时改善军民的关系。他对嵯县有名望的抗日知识分子钱叔亮、斯浪清等，都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发起组织全县抗日团体“嵯县城乡抗日救亡协进会”。许多知识分子在他的教育影响下，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提高了觉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些同志还成为嵯县建党的骨干。张珂表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视工人同志为亲人，紧紧依靠上海回嵯的丝绸工人为抗日救亡的骨干。他安排他们参加收录广播消息、刻快讯、贴墙报等活动，还动员绸厂工人薛仲三创办“群力书店”，并挑选觉悟较高的同志和少数失学的抗日进步青年组织抗日救亡流动宣传队。

他对混进嵯县抗日阵营中的反共顽固分子斗争坚决，也很善于斗争，把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嵯县当时的政治斗争是非常复杂的，国民党复兴社的势力相当雄厚，他们在全国抗战开始后，表面上也不得不表示抗日，并且由反共顽固分子袁雄杰为首成立了“嵯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想夺取领导权。张珂表为了取得抗日救亡的合法地位，参加了“抗援会”担任宣传股的工作。他密切联系群众，埋头实干，把嵯城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有声有色。但在广大农村，还是冷冷清清。张珂表把曾为上海反动政府通缉的罢工代表、上海工人救国会的积极分子、抗日的失学青年组成一支宣传队，到农村去宣传抗日，遭

张珂表纪念文集

到嵊县国民党反共派袁雄杰、应怀生之流的反对，张珂表经过反复的斗争，争取得“抗援会”多数的支持。这个宣传队终于组成了，定名为“嵊县抗敌后援会第一流宣队”。并规定下乡宣传时由“抗援会”每月津贴十元化装费。虽然处处遭到反共顽固派的无理限制，但取得了合法地位，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在欢送流宣队下乡的联欢会上，张珂表祝词：“提高农村广大民众抗日觉悟，寄希望于你们！”这句语重意赅的话，犹似命令，牢牢记在每个队员的心中。流宣队下乡宣传过程中，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大造谣言诬蔑，说什么“是失业工人混饭吃的队伍”，是“男女混杂的文明戏班子”等，妄图破坏这支新生的抗日力量。张珂表据理和他们斗争，写文章在报上驳斥这些流言蜚语，申张抗日正义。流宣队员也不负众望，他们任劳任怨，艰苦奋斗，以实际行动取得人民的支持和赞扬，为下乡宣传做出了榜样，取得了经验。

珂表是银行的一个小职员，收入甚微，要抚养家小，经济上是非常困难的，但和他来往联系抗日事宜的同志，他都能解囊招待，有的一住三、五天，他都不以为意。成立“一流”时，除伙食由队员自理外，一无所有。一切困难他都承担，联系排演场所，到处募凑道具，他都乐于服务。原来他是买洋烟抽的，后来改抽自制土烟，把积余也为抗日宣传所用。“一流”下乡回城，要集中总结经验，伙食困难，他解囊捐献大米四十斤，他从不暴露困难，总是和颜悦色待人待事。

他有坚毅顽强的革命精力。每天做好职业工作外，业余时间都用在党的抗日救亡工作上，每晚不过十二点得不到休息，有时讨论党的工作，通宵达旦也不用夜点，白天仍按时做好职业工作，毫无倦容。他从不关心自己的健康，头痛、感冒也不去求医，默默无闻的奉献。他的革命精神、共产党员的道德风尚，感动了多少共产党人，都以他为学习榜样。

三八年秋，他因劳累过度，卧床不起。时年仅三十出头，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嵊县建党的工作正在开始，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需要他来领导。人们都在关心他早日恢复健康，但不幸病情转剧，他被送往宁波

去抢救治疗。“一流”正好从陆军四十八旅撤退回嵯，得到了他病重的消息，万分焦虑，准备前去探望。但不幸消息传来，他去世了！他没有来得及和战友们最后说几句话，竟与战友们永别了！大家都沉浸在悲痛之中，他虽是病死的，但他是悲壮的死！他没有留下物质的财富，但他的革命精神和远大的革命理想，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人们把悲痛化为力量，沿着他开辟的革命道路，为实现共同的理想去继续战斗。

历史已走过五十个年头，革命的人民前仆后继，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党的领导下，正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嵯县已旧颜换新貌，他的伟大理想正在实现中。我们万分敬爱的战友，你安息吧！

一九八九年一月于无锡

——辑自《嵯县党史资料》1989年第一、二期

学习张珂表同志的崇高革命品质

——回忆珂表生前的几件事

周 飞

一、真挚待人 诲人不倦

我和珂表同志认识，约摸是一九三六年的春天。我基于抗日救亡的热情，试写了一篇抗日救国的论文，用特快挂号由长乐（当时我在长乐第五小学教书）寄给嵯城农工银行珂表，请他阅后帮助修改，并请他转给《嵯新民报》或《剡声日报》的副刊发表。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就接到珂表一封很长的回信，信中除了赞扬我那种抗日救国的热情和大胆揭露日寇侵华暴行的勇敢精神外，说明由于环境关系和文章本身的某些问题，未能送报社公开发表。信的最后一约我抽空去嵯城面谈一次。隔了两天，我乘自行车到嵯城农工银行找珂表。他一见我到那里，就立即改变了原定当天回家探亲的计划（这是我事后知道的）。他非常热情地招待我吃晚餐，就留我在他的宁静的单人寝室同铺住宿。当晚我俩促膝谈心，一直谈到深夜第二遍鸡叫，使我感到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深情厚谊。他从我所写文章的内容，联系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新阴谋和国民党政府贯彻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谈到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抗日新高潮，从全国全省的形势，又谈到在此形势下我们爱国青年的任务，进而又反复地向我说明了我那篇文章的内容虽好，但在“抗日有罪”的形势下不便于公开发表的道理。告诉我要使文

章既能公开发表又能激励人民的抗日救国的热情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在交谈中，我向他提出了不少抗日救国方面的疑难，他对我提出的所有问题，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他总是那么亲切而耐心地，一个一个地给予详细解答，一直到我完全明白为止。他这种对同志真挚诚恳、诲人不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更珍贵的，他的这种精神是一贯的。当我在一九三六年初和他第一次见面认识起，直到一九三八年下半年逝世止，每次和他会面总是那么真挚亲热，总是那么乐于助人，不管是工作方面或学习方面的疑难问题，他无不竭尽全力之所及，十分耐心地帮助解决。有时，当我提出的问题他也答不了时，他决不装不知以为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态度总是：一面老老实实地告诉你，他也不知道或不大懂；一方面又要求给他时间往后答复。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他便会立刻紧张地工作起来，首先是找遍参考书，或有关的秘密指示，再就是找他周围一些较有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同志共同研究，如果还是解决不了时，他就向上海方面一些进步团体、进步报刊或向我党地下组织求教请示。总之，最后总要使你得到完全满意的答复为止。因此，很多的同志总是非常乐意和珂表同志接触，一有疑难问题，总是喜欢向他请教，每和他会见或通讯一次，总可以得到一些教益。这是珂表真挚待人、诲人不倦的结果。

二、坚守原则 不徇私情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我们一些在嵊县西乡活动的救亡青年，感到一般的口头宣传对群众吸引力不够大，便通过一些工作关系在长乐镇创办一个化装宣传的团体（其主要成员是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但也有少数思想落后的分子和个别流氓分子），这是嵊县第一个公开成立的抗日剧团——长乐剧团。剧团初成立，没有女演员，由男的扮演女的很不带劲。当时由我和周斯明二人动员了一位失学的女学生钱古井参加了

这个剧团，演出了一些抗日的宣传剧，很受群众欢迎。但活动了一段时间之后，内部发生了不团结的问题，几个落后分子一起追求女演员钱古井，特别是个别流氓分子对钱古井有乘机侮辱的行为。钱古井跑来找我和周斯明诉苦，要求退出剧团不干了。我们听了非常气愤，为了爱护钱古井，就同意了她的要求。古井退出以后，长乐剧团也就很快瓦解了。事后，珂表知道了这件事情。有一次，我在珂表那里谈完别的事情后，他很严肃而平静地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一松，长乐剧团夭折垮台的原因是什么？”

“内部成分不好，闹不团结。”我以平静的语气回答他。

“你们进行过哪些具体的教育和帮助？”

我说：“帮助教育没有用，里面有流氓分子。”

“流氓分子只要他愿意抗日的我们也要教育他，争取他啊！”显然他对我的回答表示不满意，接着他又问：

“长乐剧团的瓦解，对古井退出剧团是不是有关系？”

我说：“有关系！”

“那末（么），你们为什么让古井退出剧团呢？”珂表有点生气了。

“这并不是我们要她退出的，而是她自己要求退出的！”我有些不服气，当时还反驳他。

“她年轻懂得什么，为了抗日，你应该说服她留在剧团里啊！”他温和地向我进行批评说服。

“她是年轻不懂什么，但在剧团里有人侮辱她，她不退出就很危险啊！我们为了爱护一个女青年，同意她退出剧团有啥错呢？”我还是不服输的向他辩论。

这时他很严正地对我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去爱护她，因为这并不是真正地爱护她，真正地爱护她就要让她在抗日运动和社会斗争中去锻炼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使她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你们要知道，长乐剧团的解散，对我们嵊县的救亡运动来说，是一个损失，同时对古井自己

的锻炼来说，也失去了一个良好的机会。你们没有很好地考虑全县的抗日救亡的利益，没有从长远方面去关心古井的前途，只从一时的不良现象而支持古井退出剧团是错误的。”

珂表这种维护真理，真正爱护同志，不徇私情的原则精神和严正态度，使我一辈子也是忘不了的。

三、虚心好学 刻苦上进

好学是珂表同志重要优点之一。他自一九三五年前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以后，凡是当时上海各个进步书店和进步图书馆能买到或借到的一些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主要著作，如政治经济学、哲学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无不努力学习。当他拿到了一本马列好书后，犹如饥民得食一样，总是手不释卷地啃着啃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他常常自修到十二点以后。他在学习中也常常碰到不懂或不大懂的困难，他就反复琢磨，找书参考或和其他同志研究探讨。再不成时，他就找上海量才图书馆或自修大学编辑部等有关单位请教解决。后来，他和上海的我党地下组织发生了联系后，有些重大的政治性的疑难问题，就通过秘密通讯的方法，求助于党的组织来加以解决。总之，珂表对学习非常刻苦，非常认真的，当他遇到重大的疑难问题，不弄懂它是决不罢手的。他不仅很重视马列的一些基本理论书籍的学习，同时还十分注意和当时的革命斗争紧密结合的现实的理论政策的学习，经常阅读大量的进步刊物和报纸，当时他阅读的刊物有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以前是生活周刊，后改成生活星期刊），钱俊瑞主编的《现世界》，李公朴、艾思奇主编的《读书生活》，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平心主编的《自修大学》，杜重远主编的《新生》周刊等进步报刊。珂表最爱看的是上海小型报刊——《立报》和以后的《译报》。从地下党组织寄来的我党党刊——《群众》和我党

张珂表纪念文集

在国外发行的报纸——《巴黎时报》，更是珂表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学习得更为认真和仔细。

珂表虽然阅读的理论书籍和进步报刊很多，政治水平较高，理论基础较好，但丝毫没有自满情绪，他始终不渝地、虚心认真地学习。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一九三七年夏季，我和他到上海暑期讲习班学习，不论那一位讲师讲课，他总是仔细地听，认真地记，十分虚心地学习。在那里多数的讲师水平很高，讲得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但也有个别的讲师水平较低，口才不好，讲得不大精彩。当时就有一些同学对讲得不大精彩的课不愿意听，而珂表不仅自己仔细听，认真记，还对不仔细听的同学说：讲师来给我们讲课，我们不好好听，不仅对老师来说不大礼貌，而且是妨害我们自己的进步，因为到这里来的讲师，都是进步分子，他讲的内容总有值得我们学习的。退一步说，就是他讲的确实不好，甚至是讲错了，我们也应该仔仔细细地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他不好是什么不好，错又错在什么地方，可以使我们自己怎样去学习，怎样才能不错。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既善于从正面学习，又善于从反面学习。这种认真好学的态度，当时，对我和其他不少同志都是帮助很大的。

四、冷静思考 慧眼识人

一九三七年夏季，我和珂表到上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生活教育社”合办的暑期讲习班学习。当时参加学习的有一百多个知识青年，大都是分散在全国各地进行救亡活动的爱国青年，大家在过去都不相识，但以抗日救国的热情为媒介，彼此一见面都十分热情，一有空隙时间，彼此间就自动亲密交谈，问长问短，相互关怀，相互交流救亡工作经验，许多同志还利用饭前饭后唱救亡歌曲，同学们犹如一群长期囚于鸟笼里的鸟儿，突然被解放出来，在美丽的天空中自由翱翔一般，情绪万分热烈，万分高涨。同学中有位姓杨的青年，在讲习班中显得特别活跃，带头唱革命的违禁的救亡歌曲啦！创办学习墙报啦！组织时事座谈会啦！此人在同学中既表现多才多艺，又表现活动能力很强，许多同

学对他的才干很表敬佩。他和同学都普遍亲近，同学们也愿与他接触，一时成了业余活动的中心人物。但珂表一开始就表示有不同看法，一天晚饭后，他约我到操场上散步，悄悄地问我：“一松，你觉得杨X X怎样？”我说：“这个人有些爱出风头，但抗日救亡的热情很高。”珂表向四周扫视了一番后，对我说：“他的热情高是高，但有些不正常，一个真正革命的人，是不会在这里这样露锋芒的。”我得到珂表的启示以后，就加倍注意杨X X的言行，果然看出他有许多特别突出的地方，如十分好表现自己，表现自己的思想特别左倾等等。过了十几天，暑期讲习班结业，我和珂表先后回到嵊县工作。经过几个月以后，从上海一个姓陈的朋友（他也是暑期讲习班同学）来信中知道，杨X X原来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是奉命打入到暑期讲习班来进行活动的。八一三上海事变后，他又混入到一个我党领导下的抗日团体中去进行破坏活动，结果让我们的同志轰跑了。由此可见，珂表同志那时虽然尚未正式参加组织，但他在政治上的辨别力是很强的。

五、谦逊实干 不计名位

由于嵊县、上虞、新昌等地的党组织，主要是在珂表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在这几个县，特别是在嵊县的革命青年中威信很高。嵊县等地的党组织正式建立以后，领导上曾几次拟提珂表同志担任县委的主要领导（县委书记），但每当领导个别征求他的意见，他总是以自己在党内斗争历史短、领导经验少等理由真诚地加以婉辞，表现了高度的谦虚精神。而在实际工作中，总是那么埋头苦干，忠心耿耿，凡是党所需要的，对革命事业有益的，不管是天大的困难，即使是赴汤蹈火，他总是欣然从之，只要是党交给他的任务，不论是宣传方面的，组织方面的或是统战方面的，他无不竭尽全力去胜利完成。

一九三八年夏当我由浙南回嵊县工作以后，有一次我俩在商量工作中，谈到有个别同志干工作不像过去那样热情，出现了个人主义思想。为此，他表示十分感慨，并对我发了一通意义深长的议论：“过去没有

张珂表纪念文集

党的领导时，我们搞革命工作犹如在布满云雾的海洋中摸索前进，自从同上海的秘密组织有联系后，就像在东方升起了红太阳，为我们照亮了前进的方向，但阳光还常常被万恶的大雾遮断。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党组织，有了上级党的领导，这就好比是在阳光普照的晴朗的海面上破浪前进了，在这样好的环境里搞革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这些就是珂表正式参加组织后和逝世以前的真实心情的流露。

六、鞠躬尽瘁 临死犹念党

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间，我们发现珂表同志劳累过度而抱病了。但他为革命，为党的事业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久，又由于营养不良和受风受潮，长出了一身的疮，但为着工作，他还是东奔西跑忙碌不已。同志们一再劝他休息也不肯。乃至后来身上的疮毒积聚于小腹，长成了一个大毒疮，卧床不起才请医生治疗，后来又送宁波华美医院就医。在治疗过程中，珂表同志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疾病，自己的身体，念念不忘的是党的工作。有一次，当我去探望他的病（已很重了）时，一走近他的病榻，他吃力地强开眼睛，紧紧地握住我的手问：“一松！最近工作怎样？我们的建党计划完成了没有？”“我们的建党计划已经完成了，我们有了上级党的领导，我们一切的工作都会做得很好的，请你安心的疗养吧！”他听了我的话，闭上了眼睛，缓慢而轻声地对我说：“你们完成了建党计划很好，我一定好好疗养，争取早日出去为党工作。党的事业需要我们去大大发展啊！”珂表同志这种临死犹念念不忘党的工作、党的事业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党的领导下顽强地战斗，奋勇地前进！

一九六一年二月于黑龙江

——辑自《嵯县党史资料》1981年第二期

张珂表同志二、三事

商白苇

张珂表同志的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数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二年，邹韬奋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并先后主编《大众生活》《永生周刊》等进步刊物。珂表同志不仅个人是这些刊物的忠实读者，而且还积极地向嵊、新两县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中小学教员、店员和一部分中学生）推广这些刊物，并通过刊物和其他进步书报的推广工作，展开组织联系，团结进步青年。同时，他还联系当时表现进步的斯浪清、钱叔亮以及其他一些进步青年，争取和利用当时的《剡声日报》《嵊新民报》的副刊，积极宣传进步学说，开展左翼文艺活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珂表同志在党的领导下，成了嵊新两县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实际领导人之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始终是革命的坚强的战士，受到广大爱国青年的热烈爱戴。

我认识珂表同志是在一九三五年前后，当时我和陈山同志等在嵊县珏芝诗高小学当教员。有一次，突然收到了几期《大众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刊物封面上写着两行工整的字：“请阅读！”“请转赠！”。但是没有署名。不久，又接到了一封信，大意是征询对赠阅刊物的意见，并说如需长期订阅，可以代办等，信末署名“张珂表”。从此，我们便建立了通信联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从珂表同志那里源源不断地收到各种进步书刊，并且从他的来信中得到了许多革命的教育。可惜由于形势变动很大，时间又隔得过久，没有能够把他的信件保留下来。

张珂表纪念文集

和其他许多同志一样，我自从认识张珂表同志起，他就像磁铁一样，把我吸引住了。他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如此令人永远难忘。现就我直接和他接触的过程中，简略地讲一讲下面几件事。

一、无私的爱和刻骨的恨

珂表同志从他参加革命运动起，就建立起极其鲜明的强烈的阶级的爱憎观念。他对待革命同志和劳动群众，爱得非常真挚而深刻。凡是和他接触过的同志，都被他的天真的友爱的笑容所感动。无论是初见面或者是朝夕相处，他永远投给你的一副满面春风、和蔼可亲的笑脸。他经常把自己劳动所得的有限薪金，无私地接济有困难的同志。他不但用个人的钱，购赠大批进步书刊给许多同志，而且常常无偿地把现金给生活艰苦的同志。抗日战争初期，在发动和组织乡村救亡协会的时期，在组织嵊县业余宣传队（组）和流动宣传队时期，珂表同志多次把自己的工资大部分用在工作经费方面。为了工作的需要和接济别人，他还常常上当铺当掉自己的生活必需品。有一次，有位名叫钱松泉的同志（中共党员）跑去看他。他一看到钱松泉同志一副落魄的光景，便知道他的生活有了困难。珂表同志恰巧手头没有钱，可是他却暗暗地脱下自己身上的一件毛衣，一溜烟地走到当铺，当来了三元钱，并且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钱全部塞在松泉同志的烟袋里。还有一次，竺曾撰同志（中共党员）家里来了一位党的负责同志，需要一笔路费，竺曾撰同志东挪西借地筹集了一部分，但是还少二十元，于是又只好去找珂表同志。这时珂表同志刚刚发到工资十八元，便毫不犹豫地全部交给了竺曾撰同志。竺曾撰同志叫他留下几元，他说：“党的需要重要，还是个人需要重要！”又说：“你不用给我担心，我总会有办法的。”他每次见到同志，总是要问寒问热，把帮助同志解决困难当作他自己当然的义务。

对敌人，对阶级异己分子的极端仇恨，形成了珂表同志另一面的鲜

明性格。由于他是在嵊县最大的资本家汪正金等开设的农工银行里工作，不能不和一些资本家及其走狗们周旋。为了工作的需要，他一方面不得 not 和他们打交道，并利用他们的矛盾，借以掩护党的地下活动和有利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则在心底里恨死这些家伙，尤其是对于那些披着商业人员的外衣，实则进行反动政治活动的人物，更是恨之入骨。例如，当时有一个完全受汪正金等资产阶级豪绅驱使的原城区镇镇长张某，狐假虎威，经常和进步人士作对，并从中挑拨珂表同志和资方的关系。有一次，几个救亡团体在嵊县市心街北头的国民党县党部表演救亡宣传节目，张某竟借端敲榨，硬要演出团体交什么税，并且无耻地向一个女演员进行调笑。珂表同志除向张某当面据理力争之外，最后因对方蛮不讲理，便狠狠地打了张某一个耳光。事后张某纠集一帮流氓、暴徒，声言决不善罢甘休，硬要珂表同志摆酒认“罪”。珂表同志毫不畏怯，并提出要张某向各救亡团体道歉，还要他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由于当时进步力量强大，汪正金等只好出面“圆场”，结果反要张某摆了三桌酒道歉了事。珂表同志常说：“对付狐狸，要比狐狸更狡猾；对付野兽，要比它们的牙齿更尖锐，打毒蛇必须抓它的三寸头，决不能放松！”

二、诲人不倦和忘我工作

珂表同志不仅是一个孜孜学习、追求真理的人，而且永远是一个诲人不倦的人。他贪婪地阅读进步书刊，直到深更半夜，有时甚至常常彻夜不眠，一口气把书看完，并且在书上划了各种各样的记号和眉批、夹注，然后迅速地把书刊传给别的同志。他创办和主持读书会，除交流书报杂志外，还举办贷金、代买书报，解答读书疑难问题等业务。你只要提出问题，他总是耐心地、细致而深入地和你讨论，或者写长信，或者当面和你谈个半夜，从来不露出急躁而嫌烦的态度，直到你满意为止。

张珂表纪念文集

有一次我和周斯明（又名列平，中共党员）同志，看了《列宁主义问题》这本书，有许多地方不能领会，珂表同志几次三番地把他的体会告诉我们，有一次还和我们讲了一个通宵。

珂表同志诲人不倦的精神，不仅表现在读书问题上，而且更主要的是结合在现实斗争中，他经常对同志们进行革命教育，并且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有一次，他因事从嵊县城里回到他的乡下老家，路过沙地村，我正好在家，便一路送他回大明寺。当时我因失业而表示苦恼，他便一面竭力鼓励我，并答应设法找工作，另一面便讲了关于列宁被流放的故事，说一个革命者要经得住任何考验，在任何情况下也要为革命进行工作。他还给我分析了当时沙地及附近乡村的具体形势，要我积极联络地方进步青年，建立救亡团体。在他的帮助下，沙地一带的进步青年，有不少人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里。

珂表同志的工作精神是惊人的，他总是全心全意地投身在斗争生活里。在组织乡村救亡协进会及其他各种救亡团体中，他从起草章程、刻写钢板、封发信件到亲自到各地进行组织工作；从筹集经费到置办各种宣传用品；从主持开会到布置会场；从撰写宣传稿件到写标语口号……凡是他能做应做的事，他总是尽力背起来，从无怨言和推辞，接连几夜不睡觉，眼睛熬得通红的情形是常有的。有一次，他母亲病得很重，孩子也出天花，他的爱人几次捎信要他回家看看。他一方面写信安慰家属，一方面依然埋头工作。又有一次，他的爱人到城里看他，由于忙，他爱人在别人家里住着等了三天，最终也没有见上一次面。他确是一个从来没有闲空的人。

三、一切为了抗日救亡 一切依靠群众

在全面抗战初期，珂表同志既是嵊县公开与各界人士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也是开展党的地下活动的领导人之一。

他在统一战线的工作中，总是站稳立场，坚持原则，经常向国民党官僚、政客以及当地的资产阶级、地主豪绅，展开有团结有斗争的工作。他的原则是：凡是有利于抗日救亡的事就做，有利于抗日救亡的话就说，不利于抗日救亡的事和话，他就不做、不说。如果在抗日救亡的前提下，某些枝节问题，可以适当让步。例如，只要准许救亡团体进行宣传，演出救亡戏剧，那么，可以让某些绅商人物挂名、出面、当主持人。按照他的说法，就是：“风头让他们（指某些绅商）去出，工作我们来做，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用不着去争表面化的东西。”有一次，举行嵯县各界为慰劳前线将士的义演时，他就是利用国民党和绅商内部矛盾，在汪正金的子弟中选了一个出面人物主持，终于顺利的演出了。但是，他在原则问题上，却从不让步。有一次，国民党县党部派了一个干事，与珂表同志接洽，要求发动救亡团体协助国民党县政府用强迫手段和收买方式征集壮丁时，他就严词拒绝。又有一次，国民党县政府打算把救亡团体自己募集来的经费移作他用时，他也坚决不允。

珂表同志非常重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凡是救亡团体里的工作或重大问题，他总是与各方磋商，发动大家讨论，从不自作主张。无论到什么地方，他总是先找到当地进步青年，一起研究开展工作的办法，并且总是由当地活动分子主持工作，决不包办代替。有一次，他从沙地到大明寺途中，因剡溪沙地木桥被大水冲毁，他坐在渡筏上，也不忘记向群众宣传，倾听群众的意见。他常说：“三个皮匠，赛过诸葛亮”的话。每次遇到同志，他总是打听群众的抗日救亡动态和群众对工作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二月于北京

——辑自《嵯县党史资料》1981年第二期

救亡者之师（节选）

朱一松

一九三七年底，日寇侵占杭州后不再向钱塘江南过来，浙东自一九三八年初以后形势暂告稳定。这时，下乡逃难的人（包括各阶层群众）也逐渐回城。特别由上海等敌占区城市的不少工人也回嵊县来了，还有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也从敌占区大城市回到嵊县。这批回乡工人及知识分子中的爱国进步青年，其中不少是我党党员，就成了当时嵊县城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批新的生力军，出现了新局面。

这时，嵊县我党负责同志张珂表，根据党的“全面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已先后组织起不少抗日救亡群众组织，并开展了活动。例如乡村救亡协进会、救亡文化教育研究会、新文学研究小组、流动宣传队、业余宣传队等等，张珂表同志也参加了嵊县各界人民抗日后援委员会，使这个组织增加了进步力量。但它主要还是由国民党控制，只是为我们地下党组织的群众团体活动，取得了一定掩护的合法地位。张珂表同志还亲自主持编印一份救亡运动油印小报，每周不定期出版一、二次。夏天曾举办过一次“暑期文化讲习班”。下半年又筹资开办了一家出售进步书报的“群力书店”。这样，一九三八年就成了嵊县开展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黄金时代”，掀起了一个群众性抗日救亡的热潮，使党的正确的革命路线在进步青年和群众中得到了传播，使我党的影响和力量得到迅速的提高和扩大。

以张珂表同志为代表的嵊县党组织，成了团结和发动并领导嵊县城乡进步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核心力量。张珂表同志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正确路线，他身体力行、无私无畏、埋头工作、刻苦学习的精神，以及培养团结进步力量及对青年的真诚热情，博得了相当高的威望。记得他于一九三八年秋因为党工作积劳成疾，不治逝世时，以抗日后援会名义（实际上是我党组织发动的），为他举行追悼会时，大家均称他为嵊县的“救亡者之师”，影响很大，挽以“精神不死”。

一九七〇年六月

——辑自《嵊县党史资料》1981年第二期

回忆珂表（节选）

陈静之

我搞群众抗日救亡工作外，还搞上层统战工作。我与应怀法、袁雄杰、汪正金、裘祝馨、张仲禹等人经常接触打交道。当时的县长方志超是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袁、汪、应是副主任委员，后来改选时把我也选上了委员。当时珂表是委员兼政训组（股）干事。他很有办法，不但能团结青年，还能很好地做统战工作，这些上层人士也看得起他，汪正金就是其中之一，汪认为张有能力，业务也抓得好。所以农工银行是我们做窠的，开会、抄写、印发材料什么都干，甚至把汪正金的女儿汪湘琴、汪爱琴都组织起来投入抗日救亡活动。珂表同志工作突出，很能团结人，这是因为他学习好，政治理论、经济学术、马列哲学等方面都有研究，在工作上善于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所以实际效果很好。他知识渊博，平易近人，耐心细致，对人非常热情，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每天除了完成业务工作外，把全部精力放在党的工作和公开的抗日救亡活动中，所以常常要到半夜以后才能睡觉。他的工作精神真是令人敬佩！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于嵯县

——辑自《嵯县党史资料》1981年第二期

一切为了抗日救亡（节选）

俞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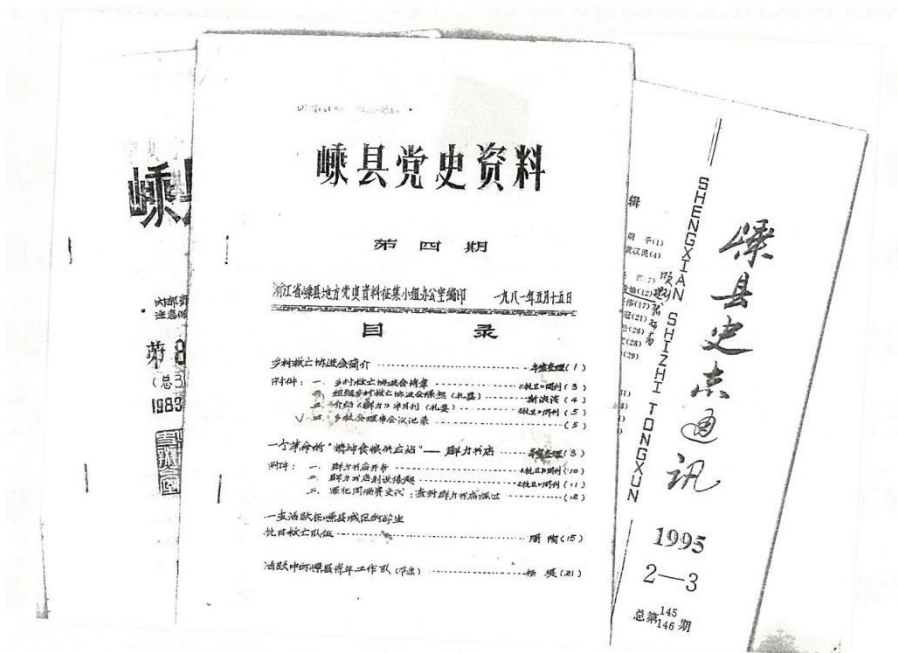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的呼声响彻全国每个角落，这时候，“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生活教育社”决定利用暑期在上海联合举办暑期学习班，组织农研会会员和生活教育社社员进行学习，目的是通过这一形式，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珂表、一松和我三人去上海参加。

珂表同志和我从上海回来不久，八一三全面抗战开始了，他极为兴奋，积极筹划开展抗战救亡宣传工作。形势发展很快，他认为必须把情况及时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动员他们投入到这一伟大的抗战救亡运动中来。在他的积极筹划和推动之下，救亡运动逐步展开了。首先出壁报，开始每天只是用一、二十张大张的白报纸，用红、黑墨水抄写当天报上有关抗日的重要消息，在城区通衢要道张贴。后来觉得这样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了，珂表同志决定改出《要闻简报》，用八开报纸油印，这样就不仅在城区张贴，而且分寄给嵊、新两县各地有联系的教师、知识青年，在当地张贴，扩大了范围和影响。出壁报的费用一部分是农工银行图书室的款项中拨出（因图书室是珂表负责的）；另外还从他自己的薪水收入中提出一部分，他当时薪水收入不大，自奉很俭约，但接待朋友、赠送书刊等支出占的比例很大，他为了革命事业，是从不考虑个人利益的。《要闻简报》后来划归抗救后援会宣传组，但工作仍由我们原班人员做的。当时参加这一工作的约有十余人，现在记得起的有孙宝坤、铁民、老范等，这年暑期与假日我都去城里参加了这一工作。每天

张珂表纪念文集

晚上聚在银行图书室里紧张地工作着，一般都由珂表同志编辑，由孙宝坤刻写钢板，我和钱铁民印刷、分发。

——辑自《嵯县党史资料》1981年第二期



纪念张珂表 学习张珂表

——为清明节纪念张珂表而作的讲话稿

张珂表是我县抗日救亡运动杰出的领导人，被誉为“嵊县的救亡者之师”，也是我县党的创建者之一，公认的青年运动的领袖。今天，我们纪念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学习他崇高的革命品质，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四化”建设，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

张珂表，笔名契如，我县石璜公社大明寺根人，生于1908年3月。祖父以教书为业，父亲死得很早，家境贫寒，从小寄养在崇仁外婆家里。毕业于崇仁公学。十七岁考进嵊县农工银行当职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为了抗日救亡，寻找革命真理，经常阅读新闻和进步报刊。大约在1934、1935年间，加入了上海量才流通图书馆及其附设的读书指导部。这个读书指导部，给予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左翼文艺书刊以很大的方便和帮助。他从中受到启发，由嵊县大资本家汪正金出资在农工银行办起了图书室，购置了大量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新文艺等方面的进步书籍和报刊，并对外流通，组织订阅，给予辅导。

1935年清明节，嵊县南鹿学社成立，珂表以理事和总务组职务的身份，负责出版南鹿学社壁报，大力宣传抗日救亡。

1935年10月，张珂表与陶秀拂等十余名青年，组织了“明生读书

张珂表纪念文集

会”，他负责编辑《明生月刊》，附在剡声日报上出版。因为他们的文章，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和民主的色彩，引起了顽固派的警异和怀疑，只出了几期，就被迫停刊。接着，更名《我们的园地》，出至第四期，又遭到同样的命运。1936年10月，张珂表接替了《嵊新民报》副刊《焰影》的编务，他在“卷头话”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要在这生死关头，联络一切不愿做奴才的各阶层的人民大众，为祖国的生命，为祖国的领土完整，为人权的自由，在反帝（尤其是反日）反封建反汉奸的旗帜下联系起来”，努力将这一文艺刊物，改造成为民族革命的文化营垒，以新的战斗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他又组织力量，办了“大众书店”，为嵊新文化界作无酬的服务。

1937年1月17日，正当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上海救亡运动领袖邹韬奋、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张珂表有一友人亦因与救国会有关而被捕入狱，因为受不了威胁利诱，供出了张珂表和另外一位热心救亡的友人。这一时期，使张珂表的行动受到了严密的监视，无法继续进行《焰影》的编务。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生活教育社在上海联合举办暑期讲习班，组织农研会会员和生活教育社社员进行学习，目的是通过这一形式，动员广大知识青年，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张珂表与周飞、俞允之三人去上海参加学习，并寻找我党的组织关系，但没有找到。十几天后，讲习班结业，张珂表与俞允之先回县工作。不久，上海党组织派遣王寄松同志到嵊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9月，张珂表被发展入党，并成为全县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先后担任中共嵊县临时县委、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宣传委员和中共嵊县县委副书记。以此，抗日救亡运动在党组织的秘密领导下，在全县范围内迅猛地向前发展起来，张珂表更是站在运动的前列，参加了抗敌后援会，组织领导着两个流动宣传队，编辑《要闻简报》和《抗敌周刊》，与刘章新、钱叔亮、斯浪清等发起组织乡村救亡协进会。不数月，会员由数十人扩大到七、八百人。出了四期

《群力》半月刊，因被国民党借口统一救亡团体而解散。1938年2月，抗敌后援会改组为抗日自卫委员会，珂表又任政训组干事，担任《抗卫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和简报的编辑，他又发起组织文化委员会及业余宣传组，创办“群力”书店。他通过这些抗日救亡团体和刊物，大力宣传我党抗日救亡的路线、方针、政策，传播革命思想和文化，不仅为我县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大批优秀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新昌、上虞两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在抗日救亡运动基础上的建党工作，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和学习，导致张珂表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38年10月31日在宁波华美医院逝世，终年三十岁⁽¹⁾。

张珂表逝世的消息，当时像一个晴天霹雳，猛击在嵊、新两县爱国人士和进步群众的头上。灵柩从宁波运抵嵊县，地下党组织以抗日自卫会的名义，在北站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会上，不仅旧知新友，扶棺痛哭；甚至无谋面之缘的进步青年，亦因受其伟大的影响而感到由衷的哀伤。会后灵柩运抵蛟镇独秀山麓安葬，沿途送葬者不下五、六百人。追悼会中，地下党组织还散发了编印在《抗卫半月刊》上的“张珂表先生逝世纪念特辑”。有一位参加抗日救亡的女青年，因为敬慕张珂表的为人，从此更名珂琴，表示要永远纪念他，学习他。我县县委于去年（1981年）重新修整了他的墓，他的许多生前好友，常借出差或探亲到嵊县之机，总要到他的墓地瞻仰和悼念，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

（二）

张珂表的精神为什么能如此感人至深呢？这绝不是偶然的，是他将毕生的精力和智慧，完全彻底地投入到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的结果。他平凡而伟大的一生，有许多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第一，勤奋好学，追求真理

张珂表自幼勤奋好学，追求真理。进农工银行当了职员，他诚朴寡

张珂表纪念文集

言，不善于交际，专门读书做事。九一八的炮火，使他从平静悠闲的生活中惊醒过来，一颗热爱祖国的心，驱使他从各方面寻找“国富民强”的真理。因为他原来好读古书，不知听谁说过，日本的强盛，是由于受王阳明学说的熏陶，于是想从王阳明学说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但是一二八事件等血腥现实，使他认识到这一唯心主义学说，并没有能帮助他解决他急于要明白的真理。后来他从上海生活书店和量才流通图书馆的读书指导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使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开始了一个新突变。他在1936年自己编辑的《明生月刊》上发表的“为什么要读书”一文中，清楚地反映了他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他说：“我们是为了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时代，认识自己而读书，换句话说：就是为探求真理而读书，而不应该为消遣而读书，也不应该为读书而读书，更不应该为升官发财而读书。”又说：“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反映在书上面，也跟着有两种绝对不同的内容。因之所有的书籍，不都是好读的；它有指示我们认识真理，促我们向更高级的生活上去的；也有暗示逃避现实，送我们向坟墓里面去的！”从此，当他拿到一本马列主义的好书，就犹如饥民得食，手不释卷地啃着，白天没有时间，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自修到十二点钟以后，把书中的精辟佳句和自己的体会，随时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

张珂表在学习上还有一个特点是虚心。1937年7月，他在上海一个讲习班学习，不论哪一位讲师讲课，他总是仔细地听，认真地记，十分虚心地学习，在那里多数的讲师水平很高，讲得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但也有个别的讲师水平较低，口才不好，讲得不大精彩。当时就有一些同学，对讲得不精彩的课不愿听，而张珂表不仅自己仔细听，认真记，还对不仔细听的同学说：“讲师来给我们讲课，我们不好好听，不仅对老师来说不礼貌，而且是妨害我们自己的进步，因为到这里来的讲师，都是进步分子，他讲的内容，总有值得我们学习。退一步说，就是他讲的确实不好，甚至是讲错了，我们也应该仔仔细细地听，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知道他不好是什么不好，错又错在什么地方，可以使我们怎样去学习，怎样才能不错。一个善于学习的人，既善于从正面学习，又善于从反面学习。”张珂表这种虚心好学的态度是一贯的。他在“为什么要读书”一文中，有这样几句话：“一切事物都在不断的发展之中，决不会停滞在某一阶段上面的，因之，我们的认识，也需随物质的发展而展开，书自然也需继续不断地读，决不能求了一点就自满。”又说：“我们将读书作为认识真理的手段，因之，在同一目的上，我们听人家的演讲和谈话，和读书是有同样意义的。”这些话，虽是早在1936年说的，但今天读来，仍然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反映了他虚怀若谷，勤奋好学，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²⁾。

第二，助人为乐，诲人不倦

与珂表相处过的同志，没有一个不为他的诚恳态度所感动。和他在一起，使你感觉到他既是可以无话不谈的朋友，也是循循善诱的老师；不仅从生活上处处体贴别人，还从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负责而详尽地帮你解答向他提出的疑难问题，他认为自己解答不了时，他就会找周围水平较高、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共同研究，甚至向上海方面一些进步团体、进步报刊或向我党地下组织求教请示。总之，使你得到完全满意的答复为止。但他从来不肯矫作高明，不假思索地解答问题，贻误青年；更不肯为了照顾面子而放弃真理。1937年上半年，宣传抗日的长乐剧团内部发生了不团结，几个落后分子一起追求唯一的女演员钱X X，个别人对她乘机侮辱，钱X X从此要求退出剧团，剧团负责人为了爱护钱X X，就同意了她的要求，长乐剧团也就很快瓦解了。珂表知道了这件事，就找剧团负责人耐心地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最后很严正地对他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去爱护她，因为这并不是真正地爱护她，真正地爱护她，就要让她在抗日运动和社会斗争中去锻炼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使她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你们要知道，长乐剧团的解散，对我们嵯县的救亡运动来说，是一个损失；同时对她自己的锻炼来说，也失去了一个

良好的机会。你们没有很好的考虑全县地抗日救亡的利益，没有从长远方面去关心她的前途，只从一时的不良现象而支持她退出剧团是错误的。”终于使这个同志不仅从内心里接受了珂表语重心长的批评，还提高了思想境界，感佩他这种真诚地对待朋友、关心同志、维护真理、不徇私情的原则精神⁽³⁾。

珂表在生活上自奉极其俭朴。“他很少注意到自己的身体，从来没有为着工作的烦劳而到外面去闲游过，也从来没有为着身体的不良而买过滋养的补品。就是自己平时的咳嗽和胃病，也从没有好好医治过，衣服方面甚至没有一套完整的小衫。”⁽⁴⁾他经常把自己劳动所得的有限薪金，无私地接济给有困难的同志，他不但用个人的钱，购赠大批进步书刊给许多同志，还在发动和组织乡村救亡协进会时期，在组织嵊县业余宣传队（组）和流动宣传队时期，多次把自己的工资大部用在工作经费方面。为了工作的需要和接济别人，他还经常上当铺，当掉自己的生活必需品。有一次，钱松泉同志跑去看他，他一看到钱松泉一副落魄的光景，便知道他的生活有了困难。张珂表恰巧手头没有钱，可是他却暗暗地脱下自己身上的一件毛衣，一溜烟走到当铺，当来三元钱，并且不声不响地把钱全部塞在钱松泉的烟袋里。还有一次，竺曾撰家里来了一位党的负责同志，需要一笔路费，竺曾撰东挪西借筹集了部分，但是还少二十元，于是又只好去找张珂表，这时他刚发来了工资十八元，便毫不犹豫地全部交给了竺曾撰。竺曾撰叫他留下几元，他说：“党的需要重要，还是个人需要重要？”又说：“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总会有办法的。”他每次见到同志，总是要问寒问热，把帮助同志解决困难，当作自己的当然义务，党的需要，高于一切⁽⁵⁾。

第三，忘我工作，不顾牺牲

珂表同志的工作精神是惊人的。他无论在私人的交往，朋友的委托，工作的计划布置和执行上，都表现出惊人的负责。譬如在组织乡村救亡协进会及其他各种救亡团体中，他从起草章程、刻写钢板、封发信件到

各地进行组织工作；从筹集经费到置办各种宣传用品；从主持开会到布置会场；从撰写宣传稿件到标语口号……凡是他能做应做的事，他总是尽力背起来，从无怨言和推辞。接连几夜不睡觉，眼睛熬得通红的情形是常有。有一次，他母亲病得很重，孩子也出天花，他的爱人几次捎信要他回家看看，他一方面写信安慰家属，一方面依然埋头工作。又有一次，他的爱人到城里看他，由于忙，他爱人在别人家里住着等了三天，也没有见上他一次面⁽⁶⁾。他好像一头勤劳的牛，无论你往他背上放多少重量，他总是苦苦地承当着。工作使他兴奋地忘记了身体，忘记了家，忘记了一切私有的事物。虽然有时也会感觉疲倦，但不能阻滞一个斗士前进的步伐；虽然在病中，他还是不肯放下工作，直到进入危险期，这才听从许多人的劝告，赴宁波就医。在医院里还多次为同志们写信；与印刷工人“四五次擘划着印刷所筹办的事业”⁽⁷⁾。

现在，张珂表离开我们已经四十四年了，他为之奋斗牺牲的民族解放事业，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同奋斗，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但是他的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先了几步。张珂表那种勤奋好学、追求真理，助人为乐、诲人不倦，忘我工作、不顾牺牲的崇高革命品质，永远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大力发扬。

嵊县民政局
一九八二年二月

说明：

(1) 材料来源：①周丹虹的“张珂表战斗略历”（见抗日半月刊“张珂表先生逝世纪念特辑”，下简称《特辑》）；②嵊县党史组编写的《纪念张珂表同志专辑》，下简称《专辑》。

(2) 材料来源：①《民生月刊》原件；②周飞同志“学习张珂表同志的崇高革命品质”一文，见《专辑》。

张珂表纪念文集

(3) 材料来源同上②。

(4) 引自《特辑》殷淇“怎样来纪念伟大的死者”一文。

(5) 引自《专辑》商白苇“张珂表同志二、三事”一文。

(6) 同上。

(7) 引自《特辑》殷淇“怎样来纪念伟大的死者”一文。

其他我们还引用了《特辑》流沙等同志和《专辑》朱一松、俞允之等同志的文章，不一一列举。

注：本文在编辑时稍有改动。

学习张珂表同志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德 (节选)

——纪念珂表逝世五十周年

周 飞

敬爱的珂表同志离开我们已整整五十年了。这五十年来，所有受过他熏陶和教诲的人，都在思念他！在那段艰苦岁月与他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老战友，更是不断地在怀念他、学习他！从我自己来说，为了学习他崇高的革命品德和优良作风，感激他对我深厚革命情谊，从参加珂表同志追悼会那天开始，就把我爱人钱瑞华的名字改为钱珂芹，以作永久怀念。每当我听到珂芹的珂字，就会在脑际再现珂表同志和蔼慈祥的容颜笑貌，联想到他那种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党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便肃然起敬。他的形象激励着我不断前进！

在珂表同志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值得我们很好来纪念他，这不仅是由于他对发动和领导嵊县（也包括新昌等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对嵊县党组织的建立有过卓越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具有革命者的高风亮节和崇高的思想品德。这些都值得我们大家很好学习和继承。如果把珂表同志的风格和品德，在较大范围内加以继承和发扬，那么，对当前端正我党党风和发扬优良传统，定会有很大的助益。

珂表身上的高风亮节和崇高品德，表现在许多方面，其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的，就我回忆，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珂表同志从三十年代初、中期，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以有利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为最高准则，在当时，就是一切以有利于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他每次谈话，发表每篇文章，处理各种问题，与各种人交往，包括做汪正金、袁雄杰等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都遵循这个准则。正因为这样，他把岷、新两县的大批进步青年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建立各式各样的抗日救亡团体，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工具，采取生动灵活的宣传形式，推动两县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并培植了大批革命骨干，为日后的建党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下半年，他正式参加党的组织以后，便下定决心要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用共产主义战士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若发现个人问题与党的利益有矛盾，就无条件地完全自觉地服从党的利益。

1936年“双十二事变”时，同志们听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都高兴得不得了。有的同志还认为蒋介石已成了鸡笼里的鸡，这一次一定可以把他杀掉，为被他残杀的无数革命烈士报仇了。过了几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放回南京。好多同志一听这消息思想不通。有一位平时思想比较激进的同志，情绪低落到想自杀。珂表知道后，就约这位同志到他的住所谈心，那时正好我有事也在珂表那里，他就邀我和另外二位同志也参加。开始珂表与大家谈了一些别的事情，当谈到西安事变问题时，珂表首先讲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好处及重大的历史意义，以及不和平解决的坏处。这位同志听了还是思想不通，说：“这样好的机会不杀掉他报冤仇，我们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白流了吗？”珂表微笑着而又很亲切地对着他说：“同志！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报仇，更不能感情用事，一切要以民族利益为重，人民的最高利益为重，放蒋介

石回南京，能联合南京政府共同抗日，对挽救民族危亡，对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是极为有利的。”这样一个小型说理谈心会，从晚上七点钟起一直谈到凌晨一、二点钟，才把这位同志基本说服了，我和其他同志也受到一次很深刻的教育。事后上述这位同志思想进步较快，在珂表周围也团结得更紧了。嵊县建党没多久也被吸收入了党，在党领导下努力工作，以后在党的文艺战线上作出了较大贡献！

二

自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之后，珂表同志为了抗日救亡武装自己，他设法向上海量才图书馆等借阅大量进步书籍，并订阅许多进步报刊，认真学习，刻苦钻研，接着他又充分利用他在嵊县农工银行的图书馆，除一部分同银行工作有关的业务书刊外，主要购买订阅了大批的马列著作、革命文艺书籍和进步报刊。凡是当时在上海各个进步书店和进步图书馆所能买到或借到的一些中文版马列著作，无论是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等方面的，无不努力学习。当他拿到一本马列新书后，犹如饥民得食一般，总是手不释卷地啃着。白天没有时间学习，经常利用晚上的时间，常常自修到十二点钟以后。他在学习中遇到不懂或不大懂的问题，总是反复琢磨，翻书参考或与其他同志研究探讨，再不成时，他就找上海量才图书馆或《自修大学》编辑部等有关单位请教解决。后来他和上海我党的地下组织发生联系，有些重大的政治性疑难问题，就通过秘密通讯的方法，求助于党的组织来加以解决。总之，珂表对学习是非常刻苦、非常认真的，遇到重大疑难问题，不弄懂他是决不罢休的。他不仅很重视一些马列基本理论的学习，同时还十分注意与当时革命斗争紧密相连的政治理论的学习，他经常阅读大量的进步书刊和报纸。当时他阅读的主要刊物有：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以前是《生活周刊》，后改为《生活星期刊》），李公朴和艾思奇主编的《读

张珂表纪念文集

书与生活》，钱俊瑞主编的《现世界》，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平心主编的《自修大学》等。珂表很爱看的报纸是上海的小型报《立报》和《译报》。从地下党组织寄来的我党党刊《群众》和我党在国外出版的报纸《巴黎时报》，更是他最宝贵的精神食粮，学习得更为认真和仔细。

由于珂表阅读过的书刊很多，所以政治水平较高，理论基础较好，但他没有丝毫的自满情绪，总是始终不渝地认真虚心学习。最突出的事例就是1937年夏季，我和他一起到上海参加中国农村经济讲习会主办的暑期讲习班学习，不论哪一位讲师讲课，他总是仔细地听，认真地记，十分虚心地学习。在那里多数教师水平很高，讲得很好，很受大家欢迎。但也有个别的讲师水平较低，口才较差，讲得不大精彩。当时有一些同学对讲得不太好的课不愿意听，而珂表不仅自己仔细听，认真记，还在学习间隙中，对不好好听讲的同学劝说：“讲师来给我们讲课，我们不好好听，不仅对老师来说是不大礼貌，而且会妨碍我们自己的进步，因为到这里来讲课的都是些进步学者，他讲的内容总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退一步说，就是他讲的确实不好，甚至是讲错了，我们也应该认真地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他不好在什么地方，错又错在什么地方，可以启发我们怎么去学习，怎么才能不出错。一个学习好的人，既要善于从正面学习，又要善于从反面学习，才能学得更深更全面。”他这种虚心好学的态度，对我和其他不少同志都是帮助很大的。

三

珂表同志不仅自己虚心好学，刻苦上进，而且总是十分真诚热心地帮助他人学习。他把图书馆和自己订阅的大量书刊，根据不同对象不同爱好，经常主动寄送他人阅读。在1936年一年左右时间里，光是寄到长乐给我和裘祖恩（陈布衣）同志阅读的进步书刊至少有二三十次之多

（寄给周斯明、周丹虹和我与斯明共同组织的“求智读书会”阅读的，就还要多得多）。他还经常附条询问我（们）对已看过的书刊有什么学习心得？有什么疑难问题？当我向他汇报了学习心得和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后，他总是很快给我答复，及时指出我学习中的优缺点，详细解答我的疑难问题。

1936年春天，我激于抗日救亡的热情，试写了一篇抗日救国的论文，用快件寄给珂表同志，请他阅后帮助修改，修改后请他转给《剡声日报》或《嵊新民报》副刊发表。大约过了一星期以后，我接到他的回信，在信中除了赞扬我那种抗日救国热情和大胆揭露日寇侵华暴行的勇敢精神外，讲到由于环境关系和文章本身的某些问题，未能送报社公开发表，信的最后还约我抽空去嵊城面谈一次。隔了二天，我从长乐骑自行车到农工银行找珂表。他一见我到那里，立刻改变了原定回家探亲的计划（这是我事后知道的），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吃晚饭，然后留我在他宁静的单人寝室同铺住宿。当晚我俩促膝谈心，一直到深夜第二遍鸡叫，使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深情厚谊。他从我的文章内容，联系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新阴谋和国民党政府实行对日不抵抗、对内贯彻反共及人民的反动政策；谈到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掀起的抗日救亡新高潮；从全国全省的形势谈到我们爱国青年的当前任务，进而向我说明我那篇文章内容虽好，但在“抗日有罪”的形势下不便公开发表的道理。还同我讲了要使文章既能激励人民的抗日爱国热情又能公开发表，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在交谈中我向他提出了不少抗日救国方面的问题，他对我所提问题，不论是大的还是小的，总是那么亲切而耐心地一个一个给以详细解答，一直到我完全明白为止。他那种对同志真挚诚恳、助人为乐、诲人不倦的精神，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更可贵的是，他这种精神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从我于1936年初和他认识起，一直到他1938年逝世止，每次与他会面总是那么真挚亲热，总是那么乐于助人，总是那么诲人不倦。不论是工作方面或学习方面的疑难问题，他总是尽心竭

张珂表纪念文集

力,十分负责和耐心地帮你解决。有时当我提出的问题他也答复不了时,他决不装不知以为知,他一面老老实实告诉你他也不知道或不大懂,一方面又要求给他时间往后答复。为了解决这类问题,他首先是寻找有关的参考资料,再就是找他周围一些较有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同志共同研究,如果还是解决不了,他就向上海方面一些进步团体、进步报刊或向我党地下组织求教请示。总之,最后总要使你得到正确满意的答复为止。他不仅对我如此,对周围很多同志和友人都是这样。因此,很多同志和友人总是非常乐意与珂表同志交往,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喜欢向他请教,每和他面谈或通讯一次,总可使人得到一些教益。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同志和友人,自然而然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努力奋斗!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于杭州

——辑自《嵊县党史资料》1989年第一、二期

闪光的生命

——纪念张珂表同志逝世五十周年

周斯明

张珂表同志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入党介绍人，是他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离开人世已经整整半个多世纪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我还历历在目，好像我们还是刚离别不久一样。

张珂表同志是浙江省嵊县大明寺根村人，1908年3月12日出生。他虽然只活了短促的三十年，为党工作的时间也不能算长，但他的高尚情操，优良品德，都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一生是闪闪发光的一生，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是通过伊兵和珂表相识的。大概在1935秋冬之交，有一天，伊兵从县城兴冲冲回到家乡开元镇，他带着难以抑制的欢快心情，迫不及待地对我说：“我这次认识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我们昨夜谈了一个通宵，已经成为莫逆之交。这个人名叫张珂表，在县城农工银行任职员，他热情豪放，襟怀宽广，抱负不凡，知识渊博，待人真挚坦率，堪为人师。我一定要使他也成为你的好朋友，我相信他是可以给你巨大帮助的，而你目前也确实需要这样的帮助。”伊兵当时是一个思想激进的青年，一心向往革命，对世事有独到的见解，但比较自负，不大看得起人，在他口里是很难听到对别人的赞词的，这次他居然用“非常非常好”这样的加重语气来肯定珂表，赞扬珂表，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例外。因此，虽

张珂表纪念文集

还没有见过面，珂表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天气晴朗，我和伊兵专程来到县城，在农工银行，我和珂表见了面。晚上，我们三个人读着读着，竟不知东方之既白。我和珂表虽然还刚刚相识，彼此都敞开心扉，无话不谈，竟像是旧友重逢一样。当时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正在给《岷新民报》和《剡声日报》的副刊投寄一些很不像样的散文、诗歌、杂文和小说，有时还得到发表，我因此受到鼓舞，开始做起了“文学家”的美梦。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深重，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很不满国民党政府畏敌似虎的不抵抗政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极为拥护，我们的谈话就从抗日救亡问题上展开。当时的珂表已经和上海的一些进步书店，后来又和上海的某个共青团组织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因此他对当时的国内形势认识得比较全面，也有一定的深度，他很有一些发人深省的见地，使我大开眼界。他使我认识到每一个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救亡图存，其他事情只能放在次要的、服从的地位。在珂表的具体帮助下，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宣传抗日的进步书刊，如《生活周刊》《生活星期刊》《读书生活》《现世界》等等。同时，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文章，以致引起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注意，甚至怀疑我是“异党分子”。

珂表从谈话中了解到我对社会科学缺乏兴趣，几乎从来没有谈过任何一本社会科学的书，他诚恳地对我说：你想走文学的道路很好，文学艺术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是可以为人民事业服务的，我支持你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但是，文学艺术是反映客观现实，是要为变革现实服务的，这就有个正确认识和反映现实的问题。而要正确认识和反映现实，就非靠社会科学不可了，因此，我劝你在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一定要看些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这样，你的作品才能正确反映现实，才有旺盛的生命力，才能于广大人民群众有益。我觉得他的话很对，此后就相继自学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

张仲实和苏联列昂叶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曹伯韩的《社会科学二十讲》等等社会科学的基础读物，又读了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瞿秋白的《赤都心史》等介绍苏联的著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和珂表的第一次谈话，竟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这实在是我始料所不及的。1937年9月底，珂表入党后，中共嵊县临时县委成立，他担任临委宣传部长。同年10月，张珂表介绍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使我走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革命道路。

过了一些日子，伊兵和我又把其他几个同志介绍给珂表，他们也受到了珂表的教育和帮助，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珂表有很强的凝聚力，很善于做思想工作，很善于说服人。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一起跟着党，走革命的路。浙东有不少县是在1937年抗战开始后才正式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在这以前，珂表就已用抗日救亡的口号、读书会的形式团结了新昌、上虞，特别是嵊县的一大批进步青年，为这些县的建党创造了条件。这些县的党组织一经建立，在珂表影响下的一大批进步青年就纷纷参加了党，成为党组织的基础力量和骨干。

我是三代单丁，父母死得早，是由祖父抚养成人的。我迈入社会后，祖父很怕我交友不慎走上邪道，因此对我的交友管得很严。珂表知道这个情况后，有一次跋涉五十多里来到我家，和我祖父作了一次长谈，很快就取得我祖父的信任。珂表走后，祖父对我说：“珂表是一个好青年，是可以信赖的，你和他交朋友，我完全放心。”

全面抗战开始后，在珂表的帮助下，伊兵发动了部分上海回乡的青年工人和小学教师，约二十人，组成一个辅仁剧团，在嵊县西乡的农村巡回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布袋队》《察东之夜》等抗日街头剧和独幕剧，很受农民群众的欢迎。我受伊兵的邀请，在这个剧团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后来这个剧团因故不能继续下去了，伊兵决定回家乡开元镇做其他抗日工作，他要求我和他一致行动，但辅仁剧团的许多团员，特

张珂表纪念文集

别是那些上海回乡的失业工人，都主张把辅仁剧团改建为其他的抗日宣传队，继续工作下去，并且要求我留下来担任领导工作。当时珂表已经参加嵊县抗敌后援会，担任政宣股股长的职务，便决定把辅仁剧团改建成嵊县抗敌后援会第二流动宣传队，任命我为队长。但是伊兵就是不同意，坚持要我回开元工作，一时形成僵局，无法解决，后来只好把珂表请来，由他和伊兵个别交谈，珂表只花了短短的一个多小时，就把伊兵说服了，使第二流动宣传队得以很快地组建起来，珂表就是这样善于做思想工作，善于说服人，善于把事情推上正确的轨道。

珂表是一个银行小职员，收入不高，家境也不富裕，他的工资收入，不但要解决自己的吃穿用，还要养家糊口，日子过得相当紧凑，但是同志中谁有困难向他要求支援，他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有时还主动资助人家。他结交许多进步青年，经常自己花钱买进步书刊分赠大家，组织大家学习。他赠给我的进步书刊很多，虽经多次离乱，散失不少，但到十年浩劫前，我还保存着他送给我的《读书生活》《知识》《生活周刊》《生活星期刊》等合订本数卷。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这些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进步杂志，都被“造反派”当作“反动刊物”加以没收了，现在不知下落，言之使人痛心！

为了及时传播抗战的胜利消息，珂表自己花钱出版壁报，印发宣传品。第一流动宣传队经过一段时间巡回演出，想回城关总结一下工作，但苦于吃饭问题不能解决，珂表知道后，就自己花钱买了几十斤大米给他们，使他们回城总结愿望得以实现。

珂表交友很广，每天来看望和商谈工作的人络绎不绝，他的寓所实际上成了大家的联络站。有的同志一住数天，食宿都由他供给，有的临行时还要赠送东西，以及帮助解决物质上的困难，他在这方面花费的钱是很多的。他常说，帮助友人解决困难是我应尽的义务，是义不容辞的。

珂表待人真诚坦率，从来不敷衍应付，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从不讲口是心非的话。有一次，我问他对X X、X X和我三个人可有什么看

法，他很诚恳也很坦率地对我说：“你们三个人由于出身不同，社会地位各异，生活经历也不一样，所以思想、作风也就各不相同。X X出身好，又做过工人，有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工作踏实，生活俭朴，作风也好，虽然文化水平低一些，但今后的成就，我看比你们两个大一些，他的身上有许多你们缺乏的东西，很值得你们学习，这样讲，你和X X目前可能接受不了，但这都是事实。至于你，有不少优点，但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感情比较脆弱，作风也不够踏实，改造起来难度可能要大一些，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敢不敢面对现实，敢不敢正确认识自己的不足，能不能认真改造自己。”珂表最后谈到X X，他说：“X X优点很明显，到现在为止，他的成就似乎比你们大一些，才气也多一些。但也受旧社会影响很深，自视又很高，很不容易正确评估自己，改造的难度恐怕比X X和你要更大一些。不过，在党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总是可以改造成一个真正革命家的。”珂表这些话，特别是对我的看法，到现在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成为我不断改造自己的动力，由于珂表的真诚，同志们都很信任他，都乐于向他亮出思想亮出问题，得到他的教育和帮助。他的一生虽然短促，但得到他的教育和帮助的人，都是难以计算的。

珂表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从不讨价还价，也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要革命需要，担子拣重的挑。抗战开始后，他承担的工作很多，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到午夜十二时才能休息，有时甚至工作到次日凌晨。工作繁重，平时营养又不好，所以珂表明显地瘦了，身体也不太好，常觉全身乏力。许多关心珂表健康的同志都劝他要减少工作量，增加睡眠和休息时间，他总是笑笑说：“没有问题。我怎么能把应该由我完成的任务推到别人身上去呢？抗战时期，大家都在紧张地工作，我也应该紧张一些才对。”有些同志劝珂表吃些补品，滋补一下身体，他口里说好，好，但实际上都从来不肯把钱往这方面花。到1938年，他终于积劳成疾，生了“肚角”（这是当时很难治愈的疾病）。党组织和同志们都劝他快点进医院治疗，他却总是说：“现在工作多，任务重，哪有时间住医院。

张珂表纪念文集

我的病不要紧，慢慢会好起来的，大家不要为我担心。”后来他的病情日渐转重，实在支持不住了，才在党和同志们的劝说下勉强去宁波华美医院动手术。他入院后仍然关心党的事业和嵊县的抗日救亡工作。在治疗的间隙，不断给同志们写信了解情况，提出建议。他还说：“现在住院，工作是不能不放下了，应该抓紧这个时机多学点东西，为将来的工作积累点本钱。”因此一空下来就看书读报，同房间的病人说，他把病房变成自己的书房了。

他的手术动得不错，给大家带来了希望。我们总认为他出院有日了，很为他高兴。想不到后来出了一点小事故，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造成伤口感染化脓，到1938年10月31日，病逝在华美医院。

噩耗传来，我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悲痛，竟在不应该哭泣的场合号啕大哭，而且久久无法克制自己。当时我在嵊县开元小学教书，我任级任老师的那个班级，同学们要我停止原来的课程，向他们讲讲珂表生前的事迹，我边讲边哭，学生们也边听边哭。有的学生向我表示：长大了一定要做张珂表那样的人。后来，大部分同学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浙东抗日根据地建立后，一部分同学到解放区参加抗日，一部分入党后留在地方工作，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珂表逝世后，嵊县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珂表的进步青年，从四乡赶到城关镇参加悼念。他们表示一定要完成珂表的遗志，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自由的新中国。经过艰苦抗战，三年解放战争，理想终于实现。珂表同志，你可以安息了！

一九八九年二月于上海

——辑自《嵊县党史资料》1989年第一、二期

饮水不忘掘井人

——纪念张珂表同志逝世 60 周年

竹元政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饮水不忘掘井人”。

在中共嵊州、新昌以至上虞地方组织的历史上，就曾经活跃过一位伟大的“掘井人”。他以年轻短暂的闪光生命，以忘我牺牲的革命精神，以令人敬佩的品行风范，以广博渊深的知识理论，深深地吸引和培育了一代青年，在锦山秀水的剡溪两岸，掀开了一段有声有色、催人奋进的岁月。这幅虽已远去的壮丽画卷，在嵊州历史的卷页上，依然闪耀着令人缅怀的熠熠光辉，在一代人的心坎中，永远凝结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当如此感慑人心的“掘井人”行将逝去整整 60 个年头的时刻到来之际的一年半载里，曾经与他相识、交往、共事而尚健在于世的人，如邢子陶、周斯明、朱一松、王芸蓉等诸多人士，“非常怀念他”的心绪潏然涌动，难复平静。

他——这位“掘井人”，就是被称为“伟大的死者”“救亡者之师”的我市党组织的奠基人张珂表同志。

张珂表是石璜镇大明寺根村人。他的墓地在风光独秀的独秀山北麓的田郊。从他留给我们的头像相片中，我们看到的他总是显得那么老成老气，可他度过的仅仅是 30 个春秋！

觉醒于九一八

张珂表出生于农村一户破落的书香之家，这就有缘使他自小沉缅于

张珂表纪念文集

古书堆中。九一八事变，中华民族危亡的炮火惊醒了这位青年悠闲平静的读书生活。面对祖国的厄运，忧虑和关切之情渐渐充满了他的胸际，他毅然丢开了那些虫蛀发黄的古籍，转而拿起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新闻报纸，在字里行间寻觅。嗨！还不到100天，东北沦亡！一二八，日军大举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在浴血！接着，又是什么“塘沽协定”“上海协定”“何梅协定”，这一连串丧权辱国的惨痛事实，深深刺痛了这位青年的一颗正直的心！他无法平静，坐不住了，激烈颤抖的思想翅膀不禁高高飞起，飞向外面，飞向硝烟弥漫的战场。1933年，他满怀忧国救亡的激情加入了著名爱国志士史量才创办的“量才流通图书室读书指导部”，如饥似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大量左翼文艺书刊，废寝达旦地思考祖国的形势和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这种追求革命真理的激情，促使他在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征途上觉醒和迅跑！

创办抗日救亡社团

从1935年起，张珂表开始接触中共地下党组织，并通过书刊交往，与上海地下党组织主办的“生活书店”“读书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建立了联系，开始为在嵊县建立抗日救亡组织而忘我工作。他在任职的县农工银行内创办传播进步思想的流通图书室，并把图书室及自己订阅的大量书刊，根据不同对象不同爱好，经常寄给他人阅读。同时，又自己出钱自己动手办壁报、出快讯，印发宣传品，报道抗战消息，发表时事评论，宣传党的团结抗日主张，唤起人民群众被压抑的救亡热情。他组织进步青年参加“明生读书会”，在《剡声日报》上主编读书会周刊《明生》《我们的园地》，在《嵊新民报》担任副刊《焰影》编委，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和民主革命思想。他还克服资金、人员和政治环境等多方面困难，先后开办影响遐迩、被誉为嵊新两县“革命的精神食粮供应站”

的“大众书店”和“群力书店”。书店不仅成为吸引和指导嵊新两县青年阅读进步书刊，引导他们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的阵地，而且使之成为地下党活动的据点，为孕育进步力量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夏，张珂表应邀赴上海参加由薛暮桥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讲习会学习。回来后，即邀集一批进步青年和有名望的知识分子钱叔亮、斯浪清等人，把他们团结在党的周围，共同发起成立抗日救亡团体“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创办《群力》会刊，以“在神圣的反日斗争中尽一点唤起民众的本位责任”，团结各界人士，切实实行对乡村救亡运动的领导，进一步把全县民众发动起来。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为了把嵊县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张珂表在党的帮助下，以县抗敌后援会政训组负责人的合法身份，为主组建了三支十分出色的抗日救亡流动宣传队和城区业余宣传组，宣传队员的足迹踏遍了全县城乡，为全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好的宣传推动作用。他还与党内人士一起发起成立“嵊县文化委员会”，动员全县文化人把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准，增强抗战力量作为自己的使命，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为党组织挥力奠基

九一八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后，张珂表对由沪回乡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有了更多的接触，对党的理论和宗旨也有了较多的了解，他萌生着并表露过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迫切心愿。1937年夏，他与周一松、俞允之赴沪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学习。趁此机会，他决心解决组织问题，在上海寻找到党的组织，以进而在家乡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他与周、俞在学习之余，多次到有嵊籍工人党员王寄松、张平山等所在的南市区多方探询、寻访地下党组织，终日汗流浹背地奔波，却始

张珂表纪念文集

终没有找到。正当他们想留下人员继续寻访时，八一三淞沪战事爆发，只得暂时放弃回到家乡。

此时，共产党员王寄松受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的派遣回乡从事抗日救亡和建党工作。他当然首先去找张珂表，经常与张来往，一起研究开展救亡工作，甚为契合。1937年9月的一天晚上，在农工银行张的寓舍里，由中共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党的联络员骆又余为党代表，王寄松为介绍人，吸收张珂表为正式党员，并根据上海丝绸系统党的负责人吴仲超的指示，当夜成立了中共嵊县临时县委，张珂表担任宣传委员（县委书记由王寄松担任）。1938年1月，中共嵊县工委建立，张珂表继续担任宣传委员。5月，中共宁绍特委建立后，县工委改为县委，张珂表担任县委副书记之职。

张珂表入党后，忠于入党誓言，坚决执行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各项政策，更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他既是全面抗战初期嵊县建党入党的第一个党员，又是许多青年入党的引路人和党组织的奠基人。

张珂表有很强的凝聚力，他很善于做思想工作，很善于说服人。他能够把各种各样的人都团结在自己周围一起跟着党，走革命的路。早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他就利用抗日救亡口号、读书会等形式团结了新昌、上虞，特别是本县的一大批进步青年，为这些县的建党创造了条件。当这些县的党组织一经出现，在张珂表影响下的一大批进步青年就纷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地方党组织的基础和骨干力量。

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张珂表在党内外知识青年和工农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和革命同志无比热忱，他的革命意志与工作精神，凡是与他相处和接触过的同志，无不表示敬佩。他把毕生的精力倾

注于革命事业。

寓居上海的年已 80 多岁的老干部周斯明，至今仍无法抹去对于这位逝者的深刻印象，他深情地缅怀道：“张珂表同志活了短短的 30 年。生命虽然短促，但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对工作执着，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感人至深。他热爱人民，善于团结各阶层的群众，共同奋斗。他关心别人往往胜过自己，他常常把有限的微薄的收入，无私地支助困难群众（还有衣物等——笔者），他还经常购买进步书刊，寄赠给无钱买书的穷苦知识分子，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谦逊，不计较名利，多次推辞掉受命县委书记之职——笔者），却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他的光明磊落正派作风，他一心为革命的崇高品质，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楷模和典范。”

这里，周老写了自己对张珂表的亲身感受，对张珂表作了极好的述说。然而依笔者见到的流传至今的许多对张珂表的纪念文章，他的崇高精神及其影响还有许许多多。他真挚待人，诲人不倦；坚守原则，不徇私情；爱憎分明，慧眼识人；虚心好学，刻苦上进；知识渊博，平易近人；谦逊实干，不计名位；废寝忘食，忘我工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善于统战，敢于斗争等等。他“所给予我们的伟大遗产是极为丰富的。”

张珂表于 1938 年 10 月 31 日积劳殉职，病逝于宁波华美医院。这消息“像一个晴天的霹雳”，震惊了嵊县。许多人闻之失声痛哭，六、七百人为他集会致哀，更有许多人自发地为他的灵柩送行。不愿做亡国奴的热血青年们，扶着灵柩一遍又一遍地振臂高呼：“张珂表的精神不死！”“我们要以实际工作来纪念这位伟大的死者！”

60 年前这壮怀激烈的声音，至今犹在许多老人的心头激荡！对于今天的后辈来说，正如当年纪念张珂表的悼词所说：“我们在今天，首

张珂表纪念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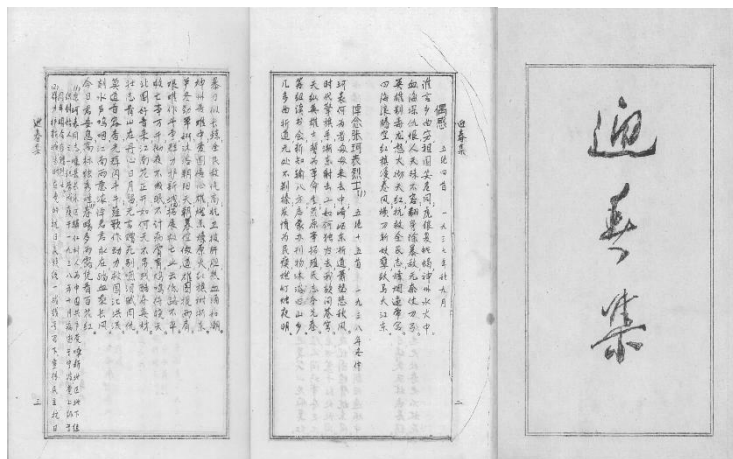
先要明白他的伟大处在哪里？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敬佩和纪念？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和效法？他有什么精神可以不死？他有什么事业可垂永久？诸如此类，凡是珂表的爱护者、景仰者、痛悼者的我们，均应彻底了解，因为我们要以实际工作来纪念他，继承他！”

——辑自《嵊州春秋》1998年第六期纪念专刊

悼念张珂表烈士

五绝十七章三十四韵

钱叔亮



珂表^①何为者，匆匆来去中；崎岖东浙道，萧瑟动秋风。
 时代擎旗手，浙东射击工；如何独归去？我都问苍穹。
 天纵英雄士，誓为革命生；荒原事拓殖，矢志夺先春。
 真理道不穷，壮志似长虹；慷慨怀多士，剡中鲁迅风。
 筹组读书会，新知输八方；启蒙办刊物，沐浴旧山乡。
 几多曲折道，无处不荆榛；发愤为民瘼，燃灯烛夜明。
 真知雨露浓，剡沃引东风；脉脉戎葵好，不辞汗血穷。
 暴日似长鲸，全民敌汽高；抗卫披肝胆，热血涌如潮。

张珂表纪念文集

神州苦难中，爱国倍心雄；燃点燎原火，红旗树浙东。
严冬劲草鲜，赤胆顶青天；朝暮倥偬道，雄图揽两肩。
艰难作斗争，‘群力’作‘新城’^②；拓展救亡路，云低更不平。
救亡事万千，彻夜不成眠；憔悴三坚持^③，鸡鸣待晓天。
北国好音来，江南花正开；如何天不吊，残酷夺英才。
壮志青山在，丹心日月留；无言赠死别，嚔泪赋同仇。
莫道音容杳，光辉闪斗牛；薤歌作动力，救国汇洪流。
剡水声呜咽，江南雨意浓；悼君君永在，踏血乘长风。
今日君安息，高标独秀峰^④；春吻多雨露，凭看百花红。

于一九三八年冬仲

注释：

①珂表：张珂表，嵊县辅仁乡（今石璜镇寺新村）人。中国共产党嵊新地区地下组织创始人之一，积劳成疾，于一九三八年十月病逝于宁波。

②“群力”作新城句：当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宣传民主抗日救亡，传播革命种子，曾办群力书店，出版《群力》《抗卫》等刊物，动员组织青年群众，抗战力量颇为强大，势似新城。张珂表逝世后不久，形势更为逆转，书店刊物被迫停办停刊。为了坚持斗争，继又以‘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意旨，以‘新城’和‘长城’命名重办书店，并计划续出刊物。此句用意双关。

③三坚持：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④独秀峰：位于甘霖镇，为当地名胜之一，张珂表的安葬处。

——辑自《嵊县党史资料》1989年第一、二期

独秀峰前祭珂表

骆宾基

来去太匆匆，峰前祭英灵。
相隔五十载，倍感故乡情。

注：本诗选自骆宾基《南行诗草（三首）》，作者曾为中共嵊县县委宣传部长（又名张璞君），与张珂表共同受命筹建群力书店等。

——辑自《嵊县党史资料》1989年第一、二期

张珂表找党

夜幕慢慢地合拢，上海北站灯火阑珊，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这是193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一列沪杭列车喘着气缓缓驶进上海北站。从车厢里挤出三个年轻人来，领头的一个是嵊县农工银行职员张珂表。虽然经过一天两夜从航船到汽车又搭乘火车的旅途奔波，张珂表仍显得神采奕奕，英俊潇洒。

出了月台，张珂表问同来的周飞：“往哪里走？在我们中间，你是老上海了。”周飞谦虚地说：“我不过在上海做过几年工，也不很熟悉。不过，到讲习班去的这条路，我还记得，不远，走着去吧！”他们就边走边浏览了上海街道。

满街是耀眼的霓虹灯和呼啸而来的警车，怪声娇气的靡靡之音夹着路边乞丐的呻吟声，空气中弥漫着酒香、肉香，也和着过路行人的汗臭，这就是上海吗？

张珂表不胜感慨。上海，果然是个纸醉金迷的魔窟！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代表人物的集中地！可是，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啊！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多集中在这个城市，十多年来，无数共产党员就在这里和这些魔鬼英勇斗争，不怕坐牢，不怕流血，甚至牺牲生命，他们才是学习的榜样！一股藏在心里已好几年的愿望，又强烈升腾起来。这次，我一定要找到他们，倾诉自己多年的追求！

自从懂事以后，张珂表就开始探索强国之道，他曾听别人说，日本维新，靠的是中国王阳明的学说，他就找《王文成公全书》来读。王阳明提倡“知行合一”“知行并进”，批判了传统的“知先行后”。但是，什么是“真知”，他辩不清楚，“怎样行”，他又一无所知。

九一八的炮声，使他从古书堆里钻了出来。为什么不抵抗？他气愤，但又茫然。大敌当前，那个“最高当局”蒋介石为什么还是口口声声地叫嚷“攘外必先安内”？西安事变后，虽被迫联共抗日，但是阳一套，阴一套，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仍没有合法地位。蒋介石的形象在张珂表的心目中已被逐渐否定，他要追求“真知”！

在青年人中间，张珂表是一块“磁石”。四年前，吸引了一批进步青年，参加了上海量才流通图书馆的读书指导部。两年前，在新、嵯两县知识界人士中组织了“南鹿学社”。又和上海生活书店的王太雷取得联系，购买了不少进步书刊，组织“明生读书会”和流动图书室，提供店员青年阅读。

张珂表没有炫目的学历，但他好学，读过的马列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书籍，从《大众哲学》到《共产党宣言》不下十多种。又订阅了四、五种进步刊物。在王太雷帮助下，他的书架上还有党内刊物《向导》和赤色工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他逐渐有了明确的信念：“真知”，就是马列主义；“怎样行”，在目前就是团结抗日，先解决民族的存亡问题；中国的救星，当时在延安。

“到了！”周飞提醒他。到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暑期讲习班，张珂表觉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在讲习班，讲课的都是著名的进步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有艾思奇、薛暮桥、张曙等。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分析精辟，说理透彻，使张珂表知道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新鲜事物，懂得了许多马列主义的哲学理论。他听得十分认真，一个词也不肯轻易放过，都清清楚楚地记在本子上。

参加学习班的大都是来自全国各地进行救亡活动的知识青年，共100多人。虽然互不相识，但一见如故，彼此十分亲热，一有空就相互问长问短，探讨学习问题，交流救亡工作经验。他们还创办学习墙报，举办时事座谈会，饭前饭后，放声高唱救亡歌曲。生活得紧张而又活泼。

学习班结束后，张珂表悄悄地问周飞：“在上海做工的同乡中，你

张珂表纪念文集

认识王寄松吗？他住在哪里？”周飞一时想不起来，又问张珂表“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去年他两次来嵊，说生活书店的王太雷也是他的朋友。和我交谈抗日救亡的问题，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很谈得来。他会不会是共产党员？我很想找他！”

周飞急起来：“当时，你为什么不问清楚他的住址？”“问了，他说，没一定住所！”

周飞凝神想了一会，说：“我还记得几个嵊县同乡的住所，先去闯一闯吧，你留在这里，一同去了，反引起别人怀疑。”

周飞串了几个住所，都没有碰上一个熟人，最后闯入一间普通的民房里，似乎有人在偏屋轻声说话，他莽然推门进去，只见里面坐着六七个人，一个壮实的汉子警觉地站起来在门前挡住了他，厉声问道：“从哪里来？干什么？”周飞一听是嵊县口音，就不慌不忙地回答了：“从嵊县来上海参加薛暮桥主办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暑期讲习班’，想找一个同乡。”只见中间坐着的一个人，低声对挡住他进门的汉子说：“那是外围组织，叫他留下通讯地址吧！”周飞留下了“嵊县农工银行张珂表”的地址，就匆匆赶回来了。

他回到住所，向张珂表说了会面的情况，他们已预感到有了线索，有了希望。他们明白，在党处于地下活动的情况下，没有一定的关系，只能如此。

他在寻找党组织，党也在了解、考察他。一年前，王寄松第一次返嵊，就阅读了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和他交谈了对抗日救亡活动的看法，两人谈得十分契合。回沪后，向组织汇报了这个情况，组织决定由他和张珂表保持联系。张珂表还不知道《救国时报》和《向导》以及其他党的宣传小册子，就是王寄松寄来的。

回到嵊县，张珂表更加精神焕发，夜以继日地扑在救亡工作上。甚至母亲、孩子生病，家里经济困难也顾不上了。

一天晚上，他和伙伴们在农工银行图书室里编印《要闻简报》，有人来看他了。他把编好的稿件交给伙伴们刻印后，就邀来人到他的宿舍里去。那个人自我介绍说“我叫张平山，是东坂庄人，在上海美丰绸厂做工，八一三后，从上海带了家属回家乡。”他具体地了解了张珂表的学习、工作情况后，再三说以后多多联系，就告辞走了。张珂表不知道他就是上海要周飞留下通讯地址的人，是中共美丰绸厂支部书记，周飞去时，他们正在开支委会。这次回乡，因嵊县还没有党组织，所以没有转来关系，上级指示他去农村坚持党的工作，独立开展活动。他虽然感到张珂表已具备入党条件，但按组织规定，他不能发展他。

过了几天，张珂表正在灯光下给来访未遇的好友写信：“我们要保证中国的最后胜利，必须唤醒民众，使全国民众自动地参加各方面的抗战，这一责任，我们是无法躲避的……”写到这里，宿舍外进来一个人，仔细辨认，原来就是他日夜盼望的王寄松，好不欣喜。

“这次来，多留几天吧！”他边倒茶边说。

王寄松告诉他：“这次就不走了！我在上海参加了丝织工人罢工，是工人总代表之一，被摔破了饭碗，还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这次是避难来的。不过，换一个地方，我还是要斗争的！”

“好啊！”对王寄松这番毫无避讳的直白，张珂表感到无限兴奋，王寄松和他之间已没有什么距离，老王已把他当作是可以同生共死的战友了！他又诚恳地说：“你来了，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大增强！多指点吧！”

谈话中，王寄松建议：“《要闻简报》看过了，很好。但你们还没有想到农民，农民识字不多，看得懂的人很少。组织一支小型抗日救亡宣传队怎么样？如果能深入农村，把农民青年动员起来，这对推动全县工作将会发挥很大作用。”这意见，在张珂表脑子里酝酿已久，两人一拍即合。王寄松在失学、失业青年中考察、选择队员；张珂表以“后援会”政宣组负责人的合法身份，力争在“抗敌后援会”上获得通过。嵊县抗日流动宣传队就此诞生，王寄松参加了队的领导。嵊县的抗日救亡

张珂表纪念文集

运动搞得更加火红了。

金秋是希望结成果实的季节。一天，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派骆又余来嵊县和王寄松联系，带来了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文件和负责同志关于“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的指示。王寄松向他汇报了嵊县情况，建议吸收张珂表入党，并将共青团员、当时担任流动宣传队领导成员的尹仲芳转为党员。骆又余表示同意。

1937年9月的一个夜里，张珂表的宿舍里，气氛庄严。骆又余作为党代表，端坐在桌子上方，王寄松介绍了张珂表的生平。张珂表面前放着一本《共产党宣言》，站着举起右手宣了誓。中共嵊县临时委员会成立了，王寄松为书记，尹仲芳为组织委员，张珂表为宣传委员。张珂表多年的追求，终于实现了！嵊县人民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和以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终于有了永不熄灭的灯塔！

——辑自《嵊县革命故事选》

我的父亲张珂表

张勤争

我的父亲张珂表，笔名契如，1908年3月12日出生于浙江省嵊县石璜镇大明寺根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他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在本县开展革命活动。全面

张勤争（浙江大学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教授，曾任所直属党支部书记）与爱人孔祥有（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抗战爆发前后，创办进步书店、报刊，团结各界人士，组织抗日流动宣传队、抗日救亡协进会等进步团体，宣传抗日救亡和党的抗日主张，为嵊县、新昌及上虞三县的革命运动和建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1月，中共嵊县工委建立，父亲任宣传部长，1938年6月，中共嵊县工委改为中共嵊县县委，任县委副书记。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父亲于1938年10月31日去世，终年30岁。父亲短暂一生的光辉事迹永远为人民纪念，他的崇高品德为我后辈永世传承！

父亲离世时，我才1岁多，母亲因过度悲伤加上生活压力，抑郁成疾，1941年去世，我哥大我4岁，夭折于贫病交迫，留下我与祖母、

张珂表纪念文集

小姑妈艰难度日，解放后我家受到政府照顾，共产党培养我读书直到大学毕业。受我父亲的影响，四姑妈和小姑妈当时也参加救亡工作，解放后四姑妈在嵊县崇仁区政府工作，思想先进，和时任县武工队长刘洪林结婚，他们是我的再生父母，在他们的教育下，我立志继承父亲的革命遗志，学好本领，为祖国服务。

懂事以后，我开始从父亲的亲朋好友那里收集父亲的事迹，并逐渐与父亲的生前战友，老同志取得联系，加上嵊县党史办尤其是张秀铤同志提供了不少父亲的资料，父亲的形象在我脑中越来越清晰，觉得父亲就在我眼前，感到很亲切，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骄傲。

为了让后人了解真正共产党人的形象，了解先辈们为了抗日救亡和新中国的诞生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感悟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好地激励后辈为民族复兴，为祖国强大更加努力奋斗，我特将父亲的生平及革命经历，以及一些老同志的回忆片段整理出来供大家阅读。

（一）家庭和出身

父亲出身于书香门第，高祖父张德瑜为进士，大挑一等，任安徽五河县知县，曾祖父张纯佑（乳名西来）是教书先生，为当地有名的开明人士，受乡邻敬仰，祖父张鸣钟（樟保）是教师，早逝。我父亲为长子，下有一个弟弟（8岁夭折）和五个妹妹，家境贫寒，他从小寄养在外婆家，聪明伶俐、人见人爱，崇仁公学（小学）毕业后，1923年考入杭州商校，中途辍学，随后考进嵊县农工银行任职员，挑起了家庭重担。



父亲从小勤奋好学，喜欢读古书，练得一手好书法，画也很好。听长辈们回忆，父亲平时很少闲谈，回家时喜欢和太公西来在一起，听他讲故事，造就了父亲敦厚、勤学的品格。

我的母亲裘襄慈是一位贤惠、守道、勤劳和很有孝心的女性。我的外公裘时杰参加过北伐战争，曾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本部作战部高参，少将军衔。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忻口、娘子关等战役，并担任国民党与共产党军队的联络代表，与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和叶剑英等接触，共策抗日大计。后回浙江省政府任干训团教育长，1939年4月周恩来来到浙江视察抗战及指导中共浙江省委工作时，他还登门拜访。后又与日寇战于丽水地区，艰苦卓绝。抗战胜利后因反对内战，于1947年辞职卸任还乡隐居。

父亲与母亲夫妻恩爱，父亲在县城农工银行，母亲在家慈奉婆婆，照顾妹妹们，两人书信不断，父亲对母亲的信不仅会仔细阅读，而且会指出错误，进行思想引导，鼓励其学习、看书报，提高思想境界，并嘱咐她要孝敬婆婆，照顾好母亲疼爱的妹妹们。

父亲为了支持革命事业，总是省吃俭用，把革命需要和帮助革命同志克服困难放在第一位，从无怨言，不但自己不乱用一分钱，还教育家庭成员要节约再节约，克服困难，支持革命事业。

（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

九一八的炮声冲破了父亲悠闲平静的生活，他毅然丢掉古籍和恋情小说，转而看新闻报纸，关心时事，参加上海量才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后，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学习社会科学和左翼文艺书刊，唤起忧国忧民，立志抗日救亡；1935年与上海地下党主办的生活书店、读书会取得联系，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同年10月与好友陶秀拂等农工银行的店员和学徒组织了明生读书会，在《剡声日报》上刊出《明生》专刊，被迫停刊后，

张珂表纪念文集

改为《我们的园地》，负责编辑，又再次被迫停刊，后接替《焰影》的编辑，将其改造成成为发扬民族精神的“文化营垒”。

父亲为了团结嵊县一带的进步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组织了救国读书会，并在南鹿学社担任理事及总务处职务，同时创办了大众书店，为嵊县、新昌和上虞的文化界作无偿的服务。他以嵊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合法名义，组织了乡村救亡协进会和第一、第二流动宣传队，通过这个组织，广泛传播进步书刊，座谈时事，不定期出版会刊，在嵊县一带掀起抗日救亡的高潮。

1936年西安事变后，上海抗日救亡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父亲义愤填膺，以“章一民”的笔名写了抗议函，寄苏州高等法院，申张正义，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严密监视，才不得不于1937年1月忍痛放弃《焰影》的编务。

（三）为党贡献一切

父亲热爱共产党，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是嵊县、新昌和上虞地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者和嵊县党的创始人之一。

1935年，他与上海地下党主办的读书会等组织取得联系后，约同周飞、俞允之两同志赴沪参加薛暮桥主办的农村经济讲习会，并积极联系嵊县在沪的进步青年与产业工人，寻找党组织。回嵊县后，与刘章新、钱叔亮和斯浪清等发起组织乡村救亡协进会，组织抗日宣传队，他一面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一面继续寻找党的关系，筹备建立党的组织。

1935年5月，上海丝绸系统共青团支部派王寄松和周云青来嵊县，他们阅读了我父亲主编出版的刊物，走访父亲抗日救亡工作，甚为契合。回上海向支部汇报这个情况，随后支部与父亲取得联系，给父亲不定期的寄来《救国时报》《向导》和党的书报刊物。10月，王寄松再次来嵊县，经常和父亲接触，交谈抗日救亡活动，对共产党、对党的抗日主

张的认识。父亲还向王反映了自己对参加党的迫切要求，当时父亲已读过《共产党宣言》等很多马列著作和先进刊物，有分析形势的能力，积极拥护党的抗日主张，有较好的社会关系和组织能力、社交广，善于团结各界人士，他写的文章通俗易懂，很有说服力，在嵊县进步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中很有威信，他是团结的核心。

1937年王寄松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后，重返嵊县，通过父亲，团结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以南鹿学社为基础，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和抗日青年，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组织第一、第二流动宣传队深入到农村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农村的抗日救国的青年组织起来，和城里的进步力量汇合成一股洪流。

同年9月下旬，上海丝绸系统党委派骆又余来浙联系回乡绸厂工人党员，王寄松向骆汇报了父亲和嵊县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情况，认为张珂表已具备共产党员条件，建议吸收他入党，有利于党的领导，经骆和父亲谈话考察，同意了王的建议。9月的一个晚上，在农工银行我父亲的宿舍，骆为党代表致词，由王介绍，父亲宣誓，没有履行填表手续，没有候补期，吸收父亲为正式党员。然后三人共同学习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结合嵊县的情况，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成立中共嵊县临时县委，王寄松任书记，尹仲芳为组织部长，父亲为宣传部长，统一党对嵊县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

1937年11月，中共长江局指派邢子陶并代表省临工委来到嵊县，考察抗日救亡工作，并着手开展建党。1938年1月，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建立，王正山任书记，父亲任宣传部长。1938年6月，中共嵊县工委改为县委，邢子陶兼任书记，父亲任副书记。

入党后，父亲以农工银行职员为掩护，白天从事公开的抗日救亡工作，晚上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他团结群众，以出色的宣传工作和组织才能，先后组织、整顿了流动宣传队、业余宣传组等，把回乡进步产业工人和城关的知识青年组织在抗日救亡宣传队中，在嵊

张珂表纪念文集

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合法名义下，开展党的工作，亲自担任《抗日自卫》周刊和简报的编辑，出版《抗战快报》，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和全国抗日消息，创办群力书店，输送战时文化，经销邹韬奋主编的《抗战》、李公朴主编的《全民》、金仲华主编的《世界知识》、艾思奇主编的《读书和生活》、钱俊瑞主编的《现世界》、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平修主编的《自修大学》等进步书刊，并积极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弹药，组训青年骨干，准备武装抗日。他为嵊县党组织的建立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深入开展，特别是为党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后继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父亲张珂表逝世 83 周年到来之际，《张珂表纪念文集》即将付诸成书，实现了我多年以来的夙愿，藉以告慰先父，激励后人。在此，要特别感谢嵊州市党史部门长期以来为搜集父亲的革命事迹和多次举办纪念活动所做的工作，感谢解放后党和政府对我家的照顾及对我的培养，感激父亲生前战友特别是邢子陶夫妇和周飞夫妇似亲生父母般的关怀！

（作者系张珂表女儿）



张勤争夫妇回乡祭扫（摄于 2013 年 4 月 2 日）

相关人物事件

导 语

本篇选辑张珂表从事各项进步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创建地方党组织过程中，与其相关的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事迹及重大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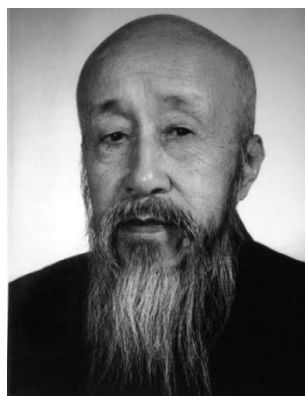
一、相关人物简介

相关人物简介共 20 篇，分别是沈钧儒、邹韬奋、吴觉农、薛暮桥、傅作义、吴仲超、张贵卿、王寄松、邢子陶、王正山、钱叔亮、刘章新、伊兵、周飞、骆宾基、丁友灿、陈布衣、商白苇、张平山、竺邦运。

沈钧儒

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清光绪甲辰（1904）进士。

1905 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加辛亥革命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1912 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5 年，他与宋庆龄等发起并组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触怒当局而遭入狱，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领头人。之后，他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建立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作出了很大贡献，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曾出席在柏林召开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第五届代表大会，当选为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沈钧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民盟中央主席等职，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和“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相关链接——沈钧儒作为领头人的“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张珂表义愤填膺，具名“章一民”致函苏州高等法院，申张正义，呼吁立即释放“七君子”。

邹韬奋

邹韬奋（1895～1944），本名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人，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近代中国记者和出版家。

1922年在黄炎培等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部主任，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获释，邹韬奋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后，他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汉沦陷后，他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战》。1941年2月，他辞去国民参议员职务，出走香港，并恢复《大众生活》周刊，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

他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和著名的三联书店，在20世纪30至40年代的中国影响很大。邹韬奋在办刊物的过程中，注重联系群众。7年里，《生活周刊》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跃发展成为“风



邹韬奋

张珂表纪念文集

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的有着很大影响的刊物”，发行量最高达到15.5万份，“创造了当时期刊发行的新纪录”。

2009年，邹韬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相关链接——张珂表经常阅读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与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有联系。“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张珂表义愤填膺，具名“章一民”致函苏州高等法院，申张正义，呼吁立即释放“七君子”。

吴觉农

吴觉农（1897~1989），浙江上虞丰惠人，原名荣堂，是中国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著名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

1949年，吴觉农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参与共同纲领的制订，参加了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担任首任农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去世前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茶叶学会名誉理事长。1989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吴觉农被誉为“当代茶圣”，其所著《茶经述评》是当今研究陆羽《茶经》最权威的著作。他最早论述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高等院校的茶业专业和全国性茶叶总公司，又在福建武夷山麓首创茶叶研究所，为发展中国茶叶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吴觉农

吴觉农青年时代就读于浙江中等农业技术学校（浙江农业大学前身）。1918年留学日本，留学期间，他撰写了许多有关农业、社会、妇女问题等内容广泛的文章向国内《东方杂志》等刊物投稿。在茶叶方面，他写了中国是茶的故乡《茶树原产地考》和《中国茶业改革方准》两篇长文，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回国后，他曾任上海市园林场场长，浙江省政府合作事业室主任及上海劳动大学教授等职。自1931年就任上海商品检验局茶叶监理处处长后，为振兴茶叶经济，维护华茶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改善茶农的生活状况，他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如首创茶叶出口口岸和产地检验制度；在浙江、安徽、江西等产茶省成立茶叶试验场和茶叶改良场。其目的不仅要禁止劣质茶叶出口，而且要全面提高茶叶质量，采取科学办法，从栽培、采摘、制造、贮藏等方面入手，改变因循守旧的手工生产方式。

抗日战争期间，他负责当时政府贸易委员会的茶叶产销工作，在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市场上海沦陷后，他努力开拓茶叶对外贸易，1938至1939两年，取得较大成绩，华茶外销跃居出口商品第一位，不仅超额履行了对苏易货合约，还向西方国家换回一定数额的外汇，支援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

吴觉农是一位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他振兴中国茶叶的理想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密切相关。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追求真理，倾向进步。他同胡愈之、沈端先（夏衍）等情同手足。在杭州求学时代，即同共产党的早期先驱人物宣中华、杨贤江等交往密切。1927年四一二事件时，他同胡愈之、郑振铎等七人在报上发表了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革命群众的公开信，被周恩来称之为“中国正直知识分子大无畏的壮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和周建人、叶圣陶、章锡琛等进步文化人，共同创办了在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中有很影响的“开明书店”。三十年代，他又与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等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团体“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宣传共产党的主

张珂表纪念文集

张，他担任该会代理理事长。同时，他还担任中国农学界的学术组织“中华农学会”的总干事，在农学界前辈梁希、邹秉文的支持下，广泛联系农学界人士，负责组织和出版会刊等工作。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他加入了“中国人民救国会”，积极参加营救“七君子”及其他被捕同志的工作。四十年代初，他加入了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秘密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并在上海担任负责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不顾个人安危，受党的委托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如在上海解放前夕，营救被捕同志；联络马寅初、吴有训、竺可桢、茅以升等知名人士，以防被国民党劫持；动员他留日时的老同学汤恩伯起义等）。

相关链接——抗日战争初期，吴觉农担任位于嵊县三界茶场的浙江茶叶改良场副场长，时常到县城并下榻在张珂表供职的嵊县农工银行，由此张珂表与吴觉农相逢相识相交，并由吴觉农介绍骆宾基认识了张珂表。

薛暮桥

薛暮桥（1904~2005），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首届中国经济学奖获得者，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之一。



薛暮桥近照

著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等。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38年至1942年在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写了通俗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成为培训新四军干部的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

相关链接——1937年夏,张珂表约同周飞、俞允之去沪参加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名义发起,薛暮桥主办的“农村经济讲习会”暑期班学习,接受新知识新思想。

傅作义

傅作义(1895~1974),字宜生,山西荣河人。国民革命军将领,是一位抗日名将、追求进步的国民党员。

1910年入太原陆军小学。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入保定军校第五期步兵科学习。1924年后,任晋军第四旅第八团团长、第四师师长。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次年任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失败后进驻绥远。1931年任晋绥军第35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等职。



傅作义

1936年11月初,发起百灵庙战役并肃清绥远境内的伪军,挫败日军西侵绥远的阴谋。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司令。1949年1月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使古老的文化古都北京及其全部珍贵历史建筑完好地得到保存,200万北京市民的生命和财产免遭兵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水利电力部部长,全国第四届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任水利部(后

张珂表纪念文集

来的水利电力部)部长长达 22 年之久,为新中国水利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相关链接——张珂表撰稿发表《从生活的困难说到援助绥远抗敌军士的意义》一文,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将军和他领导的全数兵士积极抗战,表示极大的钦佩。

吴仲超

吴仲超(1902~1984),又名兰久、铿,上海南汇大团镇(今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曾任中共华东党校副校长兼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副校长、文化部部长助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吴仲超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回乡从事地下工作。1931 年起,先后在上海、江苏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任中共南汇、无锡中心县委书记。1936 年底,冯雪峰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临委),王尧山(宋书模、路丁)任书记。1937 年 7 月上旬,中共中央暂定由刘晓、冯雪峰和王尧山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在三人团领导下,成立两个委员会:工人工作委员会,林枫(宋书常)任书记,吴仲超、马纯古为委员;群众团体工作委员会,王尧山任书记。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副团长,中共苏南特委书记,苏皖区委书记,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政治委员,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西路指挥部政治委员,新四军第 6 师江南东路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京沪路东特委书记,茅山地委书记,苏皖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兼苏南行署副主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兼苏南行署主

任，苏浙区党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苏浙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参加了1941年苏南反“清乡”斗争。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秘书长，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秘书长。期间，为党和人民征集保存了大量珍贵文物。

相关链接——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负责人吴仲超指派骆又余来嵊和王寄松联系。经考察，发展张珂表为中共党员，并决定成立中共嵊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由上海丝绸系统党委领导。

张贵卿

张贵卿（1908～1942），原名高一飞、征夫，北京顺义杨谷庄沟东村人。先后在天津水产专科学校、燕京大学求学。曾任中共浙东临时特委书记，处属特委、台属特委组织部长，衢属特委书记等职。

193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帝同盟和左联，从事交通工作，传递上海、天津、北京之间的秘密文件，护送领导同志去上海。

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赴上海做交通工作，以申报特约记者或商人身份掩护。同年11月，与爱人何渊和出世才几个月的女儿一同被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致患肺病咯血，女儿被折磨致死，他都没有屈服。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和谈。当年8月，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获释，赴浙江嵊县（今嵊州市）丁友灿家养病。11月，任中共浙江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巡视员。12月，在金华斗鸡巷4号，将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上海同济大学、浙江大学、江苏无锡教育学院、浙江流动剧团等



张贵卿像

张珂表纪念文集

部分中共党员，组成中共浙南特别工作委员会，随浙江省建设厅到丽水，以浙江同乡回乡服务团名义，开展党的活动。

1938年8月，任中共处属特委委员、组织部部长。1939年10月，调任台属特委组织部长。1941年春，调任衢属特委书记。

1942年3月，因叛徒出卖，在龙游会泽里村被捕，押解永康方岩，受尽折磨。5月18日，与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一起被杀害于方岩。

相关链接——1937年12月，张贵卿和张珂表作为正式介绍人，介绍丁友灿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寄松

王寄松（1915~2004），原名成季松，嵊州市剡湖街道人。1932年开始参加工运活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参与组织了上海美亚十厂工人的罢工斗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寄松受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指派，回嵊县开展建党活动。通过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发展中共党员。9月，成立中共嵊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任书记。1938年，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工作，先后任新四军七师组织干事、直属队总支书记、组织部干部科副科长。1943年9月，被派回地方工作，任中共和（县）含（山）县委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期，王寄松先后任三野特种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卫生部副政委、供给部政委、工兵三团政委，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解放上海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解放军工程兵政治部干部部任免处长、建筑第五十一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技术装备研究所政委等职。



王寄松

相关链接——全面抗战初期，中共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负责人吴仲超指派骆又余来嵊和王寄松联系。经考察，于1937年9月发展张珂表为中共党员，并决定成立中共嵊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寄松为书记，张珂表为宣传委员。

邢子陶

邢子陶（1912~1998），又名尹阿根，嵊州市长乐镇沃基村人。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转为中共党员，领导过上海丝绸工人大罢工。曾任中共浙江省临时工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浙江省临工委委员（后改为省工委）、组织部长，中共宁绍特委委员、组织部长、兼任中共嵊县县委书记、中共嵊新奉中心县委书记、阜东县委副书记、浙东四明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组织部科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哈尔滨电机厂厂长、大庆油田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处书记，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邢子陶

1929年7月，到上海美丰绸厂做学徒，开始接触进步思想。

1930年7月，由于带头组织工人请愿被开除。9月，进美亚织绸总厂做工，年底转美亚十厂，与进步工人成立读书小组，阅读进步书刊。

1933年5月，因美亚丝绸总厂资本家削减工人工资，引起工人罢工，罢工扩展到美亚所属14个分厂，邢子陶因担任总罢工委员会负责人，被厂方开除。之后，他通过关系，寻找党团组织。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共青团上海法南（沪西）区委组织部长。10月，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巡视员，不久调任共青团沪西区委书记。

张珂表纪念文集

1935年2月，受共青团江苏省委指派回浙江开展工作，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火车南站被捕，在狱中组织难友与国民党反动当局作斗争。

1937年9月，因国共第二次合作，邢子陶被无条件释放。出狱后经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审查，恢复组织关系，并按中央规定转为共产党员。之后，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委派回浙江，任中共浙江省临工委委员（后改为省工委）、组织部长，分工负责开辟宁绍地区工作。

1938年5月，任中共宁绍特委委员、组织部长。6月，兼任中共嵊县县委书记。此时，省工委和宁绍特委的领导机关就设在邢子陶的家中，省工委、宁绍特委多次在他家召开会议，研究恢复建立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等问题。期间，他积极恢复和建立嵊县、新昌、上虞等县党的组织，指导各地的工作，使宁绍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1939年4月，调任中共浙江省委秘书，参与中共省“一大”筹备工作。1940年3月，任中共浙西特委宣传部长。是年冬，转至苏北根据地工作，任中共阜东县委副书记。1944年7月，进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学习。1945年3月，由华中局派回浙东根据地，任中共嵊新奉中心县委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邢子陶奉命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四明地区特派员。1945年11月，到华中局组织部任职。1947年5月起，任华东局工作队队长、华东局土改工作团团团长兼山东五莲实验县县委书记，直接参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三查三整”运动。

1949年5月，随军南下，先后任华东局政策研究室农村组组长、华东局农委办公室主任、华东行政委员会民政局局长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副部长、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厂长，大庆炼油厂党委书记、厂长，大庆油田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处书记，杭州市委书记，浙江省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1983年4月起，兼任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后改党史委员会）主任。1985年6月离休后，仍继续担任这一职务，亲自主持和参与浙江党史重大活动，由他主持建造的浙江省革命烈士纪念馆，被列为全国重点纪念设施。

相关链接——1938年1月，在邢子陶主持下，成立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隶属省临工委领导；由王正山（王明远）任书记，袁于田（袁庸泉）任组织委员，张珂表任宣传委员。

王正山

王正山（1913~1990），又名王明远、金枝，嵊州市北漳镇（今金庭镇）东林村人。1930年，进上海美亚绸缎厂当学徒。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上海法南区共青团支部书记、区委组织部长。1934年3月，因领导美亚绸厂罢工斗争被捕入狱。1936年10月出狱后，在浙江长兴县休养期间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王正山

1937年10月，王正山回嵊县开展建党工作，通过团结广大进步青年，组织抗日流动宣传队、乡村抗日救亡协进会，并任乡村抗日救亡协进会东区督导员。安排进步青年进入政治工作队等方式，宣传抗日救亡，同时发展积极分子入党。1938年1月，任中共嵊县工委书记，6月，改任中共嵊县县委副书记。11月，嵊县县委扩建为中共嵊县中心县委，任书记，使当时嵊县的抗日救亡和建党工作，成为宁绍地区做得最好的三个县之一。1940年3月，调任中共绍兴县工委书记，以浙江三区（绍兴专区）政工队队员，南池区、阜埠区署服务员等身份，积极发展党员，组织抗日武装。1941年9月，因病返回

张珂表纪念文集

家乡，与组织失去联系。1943年秋，经多方找寻，与嵊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被派到当地国民党区政府工作。

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受党组织派遣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1948年3月，再次被捕入狱，判处无期徒刑。在狱中，他积极参加策反五人小组，秘密策反牢狱长起义。在国民党撤离准备屠杀被捕共产党员之际，牢狱长提前一周宣布起义，释放了大批政治犯。1949年5月，王正山出狱，参加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上海人民法院审判员、审判长。1960年4月，调安徽淮北宿东地区工作，先后任煤矿矿务局总库主任、食品公司经理、宿东商业分局局长。1974年底退休，后转离休。1990年4月，在上海病逝。

相关链接——1938年1月，在邢子陶主持下，成立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由王正山（王明远）任书记，袁于田（袁庸泉）任组织委员，张珂表任宣传委员。隶属省临工委领导。

钱叔亮

钱叔亮（1904~1977），乳名善初，字毓良，笔名苏林、阳生、重行等，嵊县剡源乡（今嵊州市长乐镇）杜塘村人。

童年就读于嵊县璠田、坎流和剡山小学，后考入杭州安定中学、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肄业）。

1927年加入国民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区委宣传委员、党团书记、城区区委书记等职。在剡山小学任教时，先后兼任《剡声日报》《嵊新民报》《抗日周刊》编辑和《群力



钱叔亮

旬刊》主编。1940年9月，任《新越日报》编辑，后又接办《战旗》旬刊。返嵊县后，在开元小学任教，并负责在清波小学、宁波中学、锦堂师范（时移嵊县）师生中开展统战工作。1945年7月至11月，根据组织决定入嵊县抗日联乡总队任秘书，争取部分武装力量和掩护中共党组织的活动。1947年2月被捕，经组织营救出狱，离嵊赴沪，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

1949年5月后，被任命为绍兴第一中学校委会主任委员、校长，直到去世。期间，提倡书本知识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法，自兼史地教员，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历任省、市人大代表和省、市政协委员，市政府委员，市政协副主席。1951年5月，受命筹建绍兴市（县）民革组织。1956年起，任民革绍兴市（县）委会主委和省政协委员。1986年1月，批准恢复中共党籍。平生好学不倦，酷爱史书，长于诗词，精于书法。有诗稿《迎春集》一册（油印本）存世。

相关链接——1937年12月，张珂表与钱叔亮、刘章新、斯浪清等发起组织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组织抗日宣传队伍。

刘章新

刘章新（1903~1986），别名承选，嵊州市长乐镇水竹村人。早年就读于私塾、镜清初小、阳山高等小学校，1918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年，在闻名全国的“一师”学潮和“驱逐齐夏”（省长齐耀珊、教育厅长夏敬观）运动中，与同学宣中华等一起，同反动当局展开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

1923年，毕业后任教于萧山县立第三小学。



刘章新

张珂表纪念文集

1924年，由宣中华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1月，返嵊，任县立二戴小学教师，在校内发展国民党党员11人，成立中国国民党萧山县党部直辖嵊县第一区分部，为嵊县最早的国民党基层组织，任区分部执委。1927年1月，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同年夏，加入中央独立师，参加抗“夏（斗寅）杨（森）”叛军的战斗。

大革命失败后返乡，任二戴小学教师，同时任国民党县党部改组委员会常委，为被枪杀的革命志士张本芝、华伦初翻案。1928年3月，任嵊县教育局局长，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在4乡创设了4所县立小学；并在省政府委员马寅初的支持下，迫使土豪劣绅将在全县擅征的田亩捐4万余银元充作教育经费。1929年6月，因得罪土豪劣绅，被迫辞去教育局局长职务，后历任徐州教育局学校教育科长、铜山县立师范教师、浙江省立五中附小主任、上海市中国公学大学部教务处成绩课主任、嵊县《剡声日报》代主笔、杭州《中国儿童时报》社总经理、富阳县教育局督学。1933年，任嵊县中学训育主任，重视对学生的道德伦理教育，深受学生爱戴。

1937年12月，与共产党员张珂表、斯浪清及钱叔亮等发起成立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1938年，任县抗日自卫委员会文委副主任，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主持举办文化工作队员暑期讲习会。1939年，任宁波中学（临时校址设在嵊县境内）教师。1941年，创办安国乡中心小学任校长。1943年8月，临危受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任嵊县简师校长，提倡“做、学、教合一”，实行情操与知识并重的教育，努力提高学生素质。1949年2月，任嵊县中学初中部主任。5月，嵊县解放，任嵊县中学校务委员会副主委，主持全面工作。1953年起任副校长，直至1975年退休。1986年1月，在嵊县去世。

先后担任省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县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县一至六届人代会代表和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政协二

届常委、三至五届副主席、六至七届常委。主要著作有《小学教师与救国主义》《征求儿童文艺宣言》《自我训练法》等。

相关链接——1937年12月，张珂表与钱叔亮、刘章新、斯浪清等发起成立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组织抗日宣传队伍。

伊兵

伊兵（1916～1968），原名周丹虹、周纪纲，笔名伊兵、大辉、李文，嵊州市长乐镇开元人。先后就读于杭州安定中学、嵊县县立初级中学，喜爱文学。1936年，主编《嵊新民报》副刊《焰影》，发表诗歌、散文、小说和评论，宣扬新文学。

七七事变后，参加县乡村救亡协进会，任开元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组主任。1938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不久，去浙南平阳县参加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10月，进入浙江省三区（绍兴）专员公署战地政工队，从事秘密工作，任中共支部书记，主编《第一线》半月刊。后因身份暴露，于1940年调任皖南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服务团副团长。在皖南事变中脱险回嵊，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42年，在四明山革命根据地任新四军浙东纵队后方医院主任、《战斗报》总编辑。次年，任四明山浙东行政公署社教队指导员，组织嵊县越剧艺人参加社教队宣传演出，实行男女合演。先后创作和编导《血钟记》《桥头烽火》《龙溪风云》《义薄云天》（即《浙东刘胡兰》）等反映浙东革命斗争生活的现代越剧。抗日战争胜利后，随部队北撤。1946年任山东《大众日报》战地特派记者。1948年调东北根据地，任《安东日报》编辑部主任。



周丹虹

张珂表纪念文集

上海解放后，参加接管工作，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艺处文艺室主任，参与举办上海市第一届地方戏剧研究班、创建华东越剧实验剧团。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处副处长兼《戏曲报》主编。1953年4月，任华东戏曲研究院秘书长，组织调查华东地区的剧种、剧目，出版《华东戏曲剧种介绍》等书，并领导整理和改编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等一批传统剧目。

1955年调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秘书长。次年，与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率上海京剧院代表团访苏。1957年至1962年，先后任《戏剧报》主编兼《戏剧论丛》编委、中国剧协书记处书记等职。1963年2月，调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

主要著作有戏剧论文集《在戏剧战线上》《现实与理想》，越剧剧本《游击队的母亲》《秋瑾》等。

相关链接——1938年4月，张珂表在《会友们的动》一文中，对时任开元抗卫会政训组主任的周丹虹大力开展抗日救亡的工作给予称赞。

周飞

周飞（1916~1994），又名一松、根福，嵊州市长乐镇开元村人。1936年，在长乐、开元等地组织求知读书会，团结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嵊县县委青年部长、组织部长、四明特区区委书记、宁波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鄞县县委书记、鄞（县）奉（化）县委书记、四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随新四军浙东纵队于1945年9月北撤。



周飞

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部教育科长、第一纵队后勤部政治处主任、后方留守政治处主任，参加宿县、鲁南、莱芜、孟良崮、济南等重大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进中央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毕业后到上海，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教育科长、理论处副处长。1954年，调东北支援重点工业建设，任哈尔滨市101厂党委副书记，1958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理论刊物《奋斗》总编、《黑龙江日报》副总编。1972年，调回浙江，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正厅级）。1982年12月离休。1994年12月，在杭州病逝。

相关链接——张珂表约同周飞、俞允之去沪参加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起，薛暮桥主办的“农村经济讲习会”暑期班学习，接受新知识新思想。

骆宾基

骆宾基（1917~1994），原名张璞君，1917年生于吉林省琿春市一个经营茶庄的小商人家中，作家。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东北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战旗》《文学报》《东北文化》主编。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中国文联第四届委员，中国作协第三、四届理事。

八一三炮声一响，骆宾基立刻到抗战组织请缨，先是在“青年防护团”，不分昼夜地抢救和运送伤员，后来又参加了一支准备开赴敌后打游击的“别动队”。期间，开始以骆宾基



骆宾基

张珂表纪念文集

为笔名，在《烽火》《呐喊》等报刊发表了大量反映抗战的报告文学，后来结集成《大上海的一日》，这是他在文学战线上的第一声呐喊。1937年12月，骆宾基赴浙东嵊县从事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嵊县县委宣传部长。1940年，骆宾基因故失去党组织关系。整个40年代，他辗转于桂林、香港、重庆、上海等地从事文学活动。

1949年7月，骆宾基参加在北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之后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后来到山东，当选省文联副主席。1953年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专业创作。1955年，因胡风案受牵连，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尚志县常河镇挂职副镇长。1962年，调到北京市文联，不久担任市作协副主席。1974年被安置到北京市文史馆工作，开始从事古文字学研究。

1947年3月，骆宾基为动员地方武装接受我军的改编，在前往哈尔滨途中于长春市郊不幸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先后在沈阳、南京被关押近两年才获释。

骆宾基的主要著作还有《骆宾基短篇小说选》《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及电影文学剧本《镜泊湖畔》等。1994年6月，骆宾基病逝，享年77岁。

相关链接——1937年12月，骆宾基由吴觉农介绍结识张珂表，后在嵊县三界茶场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时常得到张珂表指导和帮助。1938年6月，中共嵊县工委改为县委，邢子陶兼任书记，王正山、张珂表为副书记，骆宾基为宣传部长。

丁友灿

丁友灿（1910~2001），原名丁猷灿，字介臣，又名周志远，嵊州市浦口街道故江村人。

1926年嵊县剡山高等小学校毕业后，即回家任故江乡（现属浦口街道）乡长，在自家的百亩田地上，推行“二五减租”。1927年初，赴杭州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学兵队，开始接受革命思想熏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返回家乡。期间，除继续实行“二五减租”外，用自家的田租等兴办学校，并义务当启蒙教师。



丁友灿像

1937年8月，受党组织安排，丁友灿接受共产党员张贵卿在家养病。在张的影响、引导下投身革命。10月，与张贵卿等在家乡发起成立“农村抗日救亡协会”，后加入张珂表发起组织的嵊县乡村救亡协进会，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赴平阳县山门镇参加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

1938年2月，丁友灿任中共嵊东区委书记。同年11月，任中共嵊县中心县委委员、农民部长，积极开展农村工作，以乡村救亡协进会的名义，组织农民与偷运粮食出境的活动进行斗争。

1940年1月，根据中共宁绍特委决定，专做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担任过地方保长，利用合法身份掩护党的活动，团结了一大批开明人士。并想方设法，派党员打入各乡自卫队及地方土顽武装，为建立抗日武装作了大量的基础工作。1942年7月后，任中共嵊新县委、嵊新奉中心县委委员，致力于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先后任“丁部”（岩头部队）、嵊东抗日自卫队负责人、嵊新奉自卫总队总队长和嵊东办事处、嵊新县办事处、嵊新奉县办事处主任等，为嵊新奉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奉命留在原地坚持斗争，任中共嵊新奉县特派员。在国民党大规模“清乡”中，率领坚持人员，分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1946年12月，恢复了嵊（县）

张珂表纪念文集

南等地党组织。1947年1月，任中共台属工委委员。1948年1月，任中共四明工委委员，在嵊新奉地区重新建立武装，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48年2月，向嵊新东地区发展，任嵊新东县办事处（即浙东行署第九办事处）主任，10月，任中共台西工委委员，领导开辟嵊新奉、嵊新东、新天游击区，为浙东主力武装在新昌会师创造条件。1949年2月，任浙江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4月，任中共嵊新地区特派员，领导嵊县、新昌两县的接管工作。5月，嵊县解放后，任中共嵊县县委委员、嵊县人民政府首任县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绍兴专员公署第二副专员、浙江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浙江省粮食厅厅长等职。1979年起，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3年10月离休。2001年3月，在杭州逝世。

相关链接——1937年12月，张贵卿和张珂表作为正式介绍人，介绍丁友灿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布衣

陈布衣（1914~2007），原名裘樟培，曾用名裘祖恩、裘金昌，嵊州市崇仁镇九十村人。

1931年，进嵊县长乐润丰钱庄当学徒，开始阅读进步书刊。1935年，组织周飞、周斯明等进步青年，成立求知读书会，政治上日趋成熟。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嵊县开（元）长（乐）太（平）分区区委书记、水竹庵分区区委书记。1939年2月，任中共嵊西区委书记。1940年1月，任中共嵊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1941年12月，调余姚工作，先后任中共余姚县道林



陈布衣像

区特派员、山南联络员。1942年8月后，任中共姚虞县委书记，中共余慈县特派员，中共南山县委委员、组织部长。1945年3月，调中共四明地委工作，任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地委工作队队长。同年8月，调任中共南山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兼宣传部长。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纵队北撤后，陈布衣留下坚持斗争，任中共南山县特派员。1946年6月，受中共四明地区特派员刘清扬派遣，北上苏中，向华中局汇报工作，年底返回。1947年1月，中共四明工委成立，任副书记。10月，兼任浙东人民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政委。1948年1月，改任四明工委书记，5月，党领导的浦东部队南渡到四明山后，改任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五支队政委。

1949年5月，宁波解放后，陈布衣任中共宁波地委委员、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曾一度兼任中共余姚县委书记。1951年7月后，先后任地委常委、地委组织部部长，并兼任宁波专区农科所所长、专署视察室副主任等职。1972年底恢复工作后，任宁波地区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任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等职。1983年，改任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7年12月离休，仍担任中共宁波市委党史委员会主任、市关工委名誉主委、市新四军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务。2007年11月1日逝世。

相关链接——1938年6月，中共嵊县工委改为县委，邢子陶兼任书记，张珂表、王正山为副书记，陈布衣任中共嵊县开长太分区区委书记。

商白苇

商白苇（1913~1987），别名之青、梅庄，嵊州市甘霖镇上沙地村人。

张珂表纪念文集

1939年初，开始从事进步工作。1940年1月，参加浙江三区（绍兴）政工队。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战旗》杂志上发表《政治进攻下的三区政工队》《皖南之捷》等文章，宣传抗日救亡。1940年11月，出任绍兴《向前》半月刊主编，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1年1月，任《浙江日报》副主编。

1942年底，受浙东区党委派遣，到驻上虞的国民党杂牌军季槐林、张正邦部做统战工作。

1943年11月，任“三五支队”上虞办事处主任，在虞东地区创建革命政权。1944年3月，上虞县临时办事处成立后，任文教科长兼虞东区区长。7月，奉调任四明专署文教科科长，在任期间，为了宣传抗日反顽，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组织社教队（自任队长），采用越剧的形式，在四明山及附近地区演出《红灯记》《血钟记》等现代剧目，还与陈山合编了五幕大剧《儿女英雄》。1945年9月随军北撤，先在山东任新四军第一纵队文工团副团长，华东局《大众日报》要闻版主编、研究部副主任。再调任大连《关东日报》副总编，东北政委会教育部编审处主编。后随军南下，任华中总工会文教部副部长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衡阳铁路局党委常委、宣传部长，株州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兼政委，武昌铁路局党委书记，铁道部《人民铁道报》第二总编、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8年，调任北京市文联《北京文艺》编委会主任、主编。196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79年，任北京市文联顾问。1987年1月，在北京病逝。

相关链接——1935年前后，商白苇连续收到张珂表邮寄的《大众生活周刊》等进步刊物而相识。随着阅读和交往的深入，商白苇逐步接受了进步思想，并在张珂表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商白苇

张平山

张平山（1911~1985），又名增焕，嵊州市浦口街道珠溪村人。1928年起，先后在上海义成、经纶、美丰等绸厂做工。为反对资方削减工资，投入罢工斗争，被推为美丰绸厂罢工委员会委员。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了反对中日公使升格的群众示威。次年任美丰绸厂党支部书记，投入营救“七君子”签名运动，参加“飞行集会”、散发传单等抗日活动。七七事变后，张回家乡，在东坂庄沿山一带开办夜校，参与组织“城东农民抗日协



张平山

进会”，建立中共东坂庄支部。1938年，先后任中共城东区委组织委员、书记。1942年7月，参与组建中共嵊新县委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嵊东抗日自卫独立大队，任中共总支书记。次年6月任中共嵊新中心县委委员。11月调任中共鄞慈县古林区委书记，后随军北撤。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参加泰安、文祖、鲁南等战役。1947年4月，任中共领导的华东军区保卫部三科审讯干事时，查清一起牵连45人的所谓内奸嫌疑案，立三等功。1949年3月后，任华东军区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科长。1956年4月任外交部外交人员服务处处长。1959年“反右倾”时受到错误批判，下放农村劳动。1962年甄别纠正。文革以后，任外交部国际俱乐部副主任、工会主席等职。

相关链接——1938年6月，中共嵊县工委改为县委，邢子陶兼任书记，张珂表、王正山为副书记，时张平山任城东区委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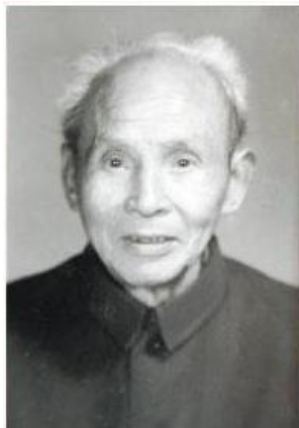
竺邦运

竺邦运（1909~1995），嵊州市黄泽镇兰洲村人（时属新昌县）。1927年2月，在杭州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学兵队，思想倾向革

张珂表纪念文集

命。1928年后，在上海连华、德兴、美亚等绸厂做工，曾参加罢工斗争。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后，返回家乡兰洲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在兰洲村发展党员，成立党小组。1938年3月，参加新昌县战时政治工作队，任政工队副队长、队内中共支部书记。同年8月，任中共新昌县工委书记。1939年12月，任中共新昌县工委委员，专做统战工作。1940年6月，撤出政工队，以在国民党新昌县兵役科、财经科、第三战区第五兵站第四粮库工作和中北乡乡长等公开职务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43年8月，调上虞朱巷区做民运工作。



竺邦运

1945年10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任中共上虞章镇区特派员。同年10月，因环境险恶，与上级党组织关系接不上，重回上海美亚丝绸总厂经纬厂做工。1946年5月，转美亚四厂。期间，曾参加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发动组织工人进行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罢工和示威游行。1948年初，回乡探亲期间曾被捕，后经营救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竺邦运一直在上海第四丝织厂工作，多次当选为工人代表，曾任工会文教主任。1970年离休。1995年10月4日，在上海病逝。

相关链接——1938年4月，张珂表在《会友们的动》一文中，对竺邦运等新昌县政治工作队队员的抗日救亡工作给予称赞。

二、相关人物表

姓名	别名	性别	生卒年	籍贯	事迹简介
骆又余		男	不详	不详	1937年9月下旬，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联络员骆又余到嵊联络和检查工作。骆又余根据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和党组织负责人吴仲超“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以及嵊县抗日活动的情况，发展张珂表和从沪回嵊的失业青年尹仲芳（俞林）为中共党员。并由骆又余代表上级党组织，宣布成立中共嵊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王寄松担任书记，尹仲芳为组织委员，张珂表为宣传委员，隶属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领导。

张珂表纪念文集

俞 林	尹仲芳	男	1915 ~ 1984	剡湖 街道	1932年7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9月转为中共党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教导队五三二队排长、副连长，浙东纵队教导队队长，金萧支队二大队大队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三师八团二营政委、华东军区第一纵队军工厂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劳保部处长、中共包头钢铁公司试验厂委员会副书记、中共杭州市委财贸部副部长、杭州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杭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等职。在中共嵊县临时工作委员会工作期间，尹仲芳与张珂表团结共事，开创了抗日救亡运动新局面。
斯浪清	谦 祥 号德益	男	1898 ~ 1943	石璜镇 白雁坑	县立二戴小学教员，1935年与张珂表参与组织“嵊县南鹿学社”；1937年与张珂表发起组织“乡村救亡协进会”，任理事。次年春加入

					中国共产党。曾任《嵊新民报》《剡声日报》副刊编辑及嵊县中学、清波中学教师，发表不少有关抗日的诗文。
裘翌芳	字泽其	男	1884 ~ 1959	崇仁镇	20岁中秀才。1912年继承父业办学，接任私立剡山小学校长，延聘名师，支持老师袁心粲在校内开办师范讲习所，培养小学教师。全面抗战爆发后，竭诚拥护“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主张，在校内订阅《新华日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发动师生创作抗日宣传画。1938年，在校内秘密建立中共支部，裘支持开展活动。同年任县文化委员会主任，发动全县教育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之初，年逾花甲仍任校长，领导教师改进教学，成绩显著，1956年被评为小学一级校长，先后当选县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省一、二届人民代表。裘翌芳支持张珂表发起的文化委员会，并出任主任，推动了嵊地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组织建设。

张珂表纪念文集

陈山	杨时俊 陈力平	男	1917 ~ 1997	新昌县	1935年春代表新昌县进步青年发起参加“嵊县南鹿学社”；1938年参加新昌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去绍兴，促成重新成立三区政工队，任中共绍兴县工委兼三区政工队中共联合支部书记。1941年任《浙江日报》记者，从事抗日宣传。同年冬在永康被捕，后冒死越狱。1942年1月到嵊县，经组织安排化名陈力平，打入王老三部，做争取改造土匪部队工作。7月，拉出部分武装建立嵊东抗日自卫独立中队（也称陈力平部队），任中队长。9月，扩编为大队，任大队长。在参加“嵊县南鹿学社”和抗日救亡革命活动中，与张珂表的合作共事。
徐巴盾	徐灿老 巴藤	男	1912 ~ 1942	天台县	1935年，参加“嵊县南鹿学社”，撰写抗日救国作品，提倡文艺大众化，努力探索真理。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组织派遣，以甲秀坂小学教师的公开身份，

					<p>在甘霖一带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后任中共嵊县地下党下西区委书记、县委青工委委员。后参加新四军，任军运部民运干事（连级）。“皖南事变”突围后，回嵊继续为党工作。1942年5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遭受严刑毒打，被折磨而牺牲。在参加“嵊县南鹿学社”和抗日救亡革命活动中，受张珂表的领导。</p>
俞允之		男	1913 ~ 2000	嵊州市	<p>1937年夏，与张珂表、周飞一起到上海参加由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办的暑期讲习班学习，在本地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1940年代以小学教师为业，一直追求进步，为中共地下组织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民革杭州市委工作，1953年调派民进杭州市委，次年任民进杭州市委候补理事、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常委，杭州市政协委员。</p>

张珂表纪念文集

袁于田	袁庸泉	男	不详	嵊州市	1934年上海美亚绸厂大罢工领导人之一。1938年1月，任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1938年2月中旬宁绍特委负责人通知县委选派党员报考战时政治工作队，袁于田等3位被录取，经选举为第四区队队长。1938年6月，中共嵊县工委改为县委，任县委委员。
黄公石	黄德鋈 黄平明	男	1906~ 1982	石璜镇 溪西村	大革命失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两次被国民党南京监狱、杭州望湖监狱关押，后出狱回家，与组织接上关系。1938年1月，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成立，王正山任书记，组织委员袁于田，宣传委员张珂表，黄公石为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杭州市交通局有关领导职务，后回乡务农。“文革”时期受迫害，后平反。
周斯明	周醉飞	男	不详	嵊州市	1937年9月，周斯明与周丹虹、钱松泉在嵊西组织抗日宣传团体辅仁剧团，因经费困难，难以为继，后得到张珂表的支持和帮助，改组为第二流动宣传队。张珂表为周斯明的入党介绍人和革命引路人。

张欣森	张 浪 张 朗	男	不详	嵊州市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嵊籍在沪工人、中共党员张欣森回嵊，同年9月成立嵊县抗日救亡第一流动宣传队，同时建立中共党支部，张欣森任书记、队长兼总务，在抗敌后援会政训组负责人张珂表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钱松泉		男	1916 ~ 1943	长乐镇 山口村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一三事变后，作为嵊籍工人中共党（团）员回嵊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9月在张珂表实际发起和组织下，创办辅仁剧团，钱松泉为骨干力量；改名为嵊县第二流动宣传队后，秘密建立中共党支部，钱松泉任书记。1938年5月任山口（剡源）分区委书记。后由县委选派到浙南平阳山门镇的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编入随军服务团，并随刚改编的新四军挺进师赴皖南。后在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三支队从事民运工作，后在余姚牺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了张珂表的支持和帮助。

张珂表纪念文集

钟林	沈天麟 钟竞平	男	1918 ~ 2000	嵊州市	1937 年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队，1939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张珂表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1952 年至 1955 年在中央马列学院学习。曾在中央高级党校、《红旗》杂志社、卫生部、中华医学会工作。1978 年调中国科协筹备组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后创办《自然辩证法研究》《方法》杂志。为中国科协第二、三届委员。
钱希乃	荣鼎	男	1895 ~ 1962	石璜镇 白雁坑	1924 年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毕业，执教绍兴、杭州等地。1926 年冬参与筹组国民党嵊县县党部。后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任阳山中学校长多年。新中国成立后，任绍兴初级师范校长，被评为绍兴专区劳动模范。1938 年 4 月，张珂表《会友们的动》一文，对时任嵊县中学教务主任钱希乃领导进行教育民众、组织民众工作的做法给予赞赏。

陈静之	陈午韵	男	不详	剡湖街道	1938年5月入党，曾任抗日自卫委员会政训干事，与张珂表一起组织和领导抗日救亡团体。1939年任绍兴《战旗》杂志副主编兼三区政工队指导员，1941年撤离。
竺曾撰	意 诚 周乃德	男	1916~ 1943	鹿山街道下燕窠村	湘湖师范毕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城区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等职。1942年任浙东游击纵队三支队连指导员，次年7月25日在余姚马渚对侵华日军作战中牺牲。入党前后，曾得到张珂表的帮助和引导。
朱一松	赵大葆	男	不详	嵊州市	1938年4月，由张珂表发起成立了嵊县各界人民抗日后援会城区业余宣传组，朱一松为骨干，在张珂表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三、相关事件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日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

相关链接——九一八事变惊醒了张珂表悠闲平静的生活，他转而关心社会时事，关切中华民族命运，萌发抗日救亡思想。

上海量才流通图书馆读者指导部（申报流通图书馆读者指导部）

该馆是申报馆为纪念创业60周年而兴办的三项社会服务事业之一，馆舍设在慈淑大楼（今南京东路东海大楼）三楼。主持人为李公朴。

图书馆开馆时有藏书 4693 册，均为当代普及性出版物，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占主要地位。读者主要是店员、学徒、工人及一般失学青年，付 2 元保证金（申报订阅者 1 元）即可借书。1933 年 1 月，辟阅览室，陈列百余种报刊，无需任何手续即可入室阅览。次年，再增设邮借部，为外地读者开展邮借服务。1934 年夏天，图书馆藏书超过 1 万册，阅览室有报刊 230 多种，拥有长期读者 3000 余人。图书馆成立了读书指导部，先后聘请柳湜（辰夫）、夏子美（征农）、李崇基（艾思奇）分头负责答复图书馆及申报读者提出的问题，并在《申报》开辟《读书问答栏》，以问答形式进行读书辅导。柳湜谈社会科学，艾思奇讲哲学，夏征农论文学，轮流撰稿。他们的部分文章以后分别汇集出版，即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夏征农的《读书问答集》和柳湜的《街头讲话》。1935 年 8 月 1 日，图书馆改名量才流通图书馆，以纪念 1934 年 11 月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申报》主持人史量才。此时，图书馆藏书 3 万余册，经常读者近万人，与读书指导部保持联系的通信读者有 600 多人，外地长期邮借读者 500 余人。图书馆还设立了团体外借、流通图书车上门服务等项目。1936 年 8 月，发刊《量才流通图书馆馆刊》，后简名《量才月刊》。八一三事变后，图书馆被迫闭馆。1938 年 4 月由上海美星明记卷烟厂出资接办，改名丁香图书馆在原址对外开放。

相关链接——上海量才流通图书馆附设的读书指导部，为张珂表看书学习提供了极大方便和帮助，他更加努力刻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左翼文艺书刊，产生了追求革命真理的激情。同时在他供职的农工银行建起图书室，与同事组织“明生读书会”，并在“剡声日报”上附出周刊《明生》，还创办“大众书店”，为嵯新文化界作无酬偿的服务，带领和团结进步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是 1933 年成立。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

张珂表纪念文集

产党的政策，与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它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的。由7人组成理事会，该会由理事会领导，陈翰笙任理事会主席，吴觉农任常务理事，直接受“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1933年创办《中国农村》月刊，由薛暮桥主编，《中国农村》杂志形形色色的谬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其后创办中国经济情报社和文化资料供应社，向各报刊提供经济论文和经济资料。不久又成立新知书店，主要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农研会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农研会成员通过农村调查的实际材料，论证了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需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做了理论上的论证。1937年该会迁往武汉、长沙、桂林等地。抗日战争胜利后，农研会迁回上海，参加了上海人民举行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该会及其主要成员在30~40年代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所做的广泛、深入的调查，对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相关链接——张珂表到上海参加由薛暮桥主管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办的暑期讲习班学习。通过认真刻苦学习社会科学知识和政治理论，思想观念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并想方设法在沪寻找中共党组织，谋划筹建当地党的组织。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相关链接——张珂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拥护西安事变的和平

解决，更加鼓起抗日救亡的信心和热情，自觉投身于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七七事变

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中国军民团结起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全国各族各界人民热烈响应，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作战，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

相关链接——七七事变爆发，极大地激发了张珂表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他成为嵯县抗日后援会政训组负责人后，团结进步青年，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在全县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重要影响。

“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迫害沈钧儒等七名著名抗日民主人士的事件。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宣布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通过《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7月15日，沈钧儒等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呼应中共关于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停止剿共。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

张珂表纪念文集

名著名抗日民主人士逮捕并投入监狱。这一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外进步人士开展了广泛营救运动。七七事变爆发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具保释放沈钧儒等七人。

相关链接——“七君子”事件发生后，张珂表义愤填膺，具名“章一民”致函苏州高等法院，申张正义，呼吁立即释放“七君子”。

张珂表年谱

张珂表年谱

1908年 诞生

1908年3月12日,张珂表出生于浙江省嵊县辅仁乡大明寺根村(今嵊州市石璜镇寺新村)。高祖父张德瑜为进士,大挑一等,曾任安徽五河县知县。曾祖父张纯佑(乳名西来)是教书先生,为当地有名的开明人士,受乡邻敬仰。祖父张鸣钟(樟保)是教师,早逝。张珂表为长子,下有一个弟弟(8岁夭折)和五个妹妹,家境贫寒,从小寄养在外婆家。

1919年 11岁

崇仁公学(小学)读书并毕业。

1923年 15岁

考入杭州商校读书,中途辍学。

1925年 17岁

考入嵊县农工银行当职员,挑起了家庭重担。

1931年 23岁

九一八事件警醒了张珂表悠闲平静的生活,他毅然丢掉古籍小说,转而阅读新闻报纸,关心时事政治,关切中华民族命运。参加上海量才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学习后,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学习社会科学和左翼文艺书刊,更加忧国忧民,立志抗日救亡。

1932年 24岁

利用《剡声日报》副刊辟有《剡沃文艺园地》,撰稿刊发文艺作品,广泛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和主张。

1935年 27岁

张珂表纪念文集

夏 以“提倡文艺大众化，不分阶层和派别，都来写抗日救国作品，为民众呼号”为宗旨，成立了由嵊县、新昌部分知识界人士组成的进步文化团体嵊县南鹿学社，邢尊谋为社长。在第二次社员大会上，张珂表被选为理事，负责总务组工作，成为主要负责人之一，逐步把南鹿学社改造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的营垒。

10月 与上海共产党组织主办的生活书店、读书会取得联系后，开始接触党的组织，购置进步书刊，创办流通图书室；与同事、好友陶秀拂等十几人成立“明生读书会”，读书会在《剡声日报》上刊出《明生》周刊、《我们的园地》等，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和传播进步思想。

1936年 28岁

春 开办大众书店。书店以出售和寄送进步书报等方式，传播进步思想，团结各界人士，宣传抗日救国和社会主义思想。

5月 在上海做工的嵊籍青年王寄松与在同一支部的共青团员周云青回乡探亲，特地走访了张珂表，交谈抗日救亡工作，互相谈得甚为默契。周云青回上海后，向支部汇报了张珂表的情况，该支部开始与张珂表建立联系。随后，张珂表向王寄松表达了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心情。

10月 担任《嵊新民报》副刊《焰影》编委，编撰文章宣传抗日救亡。同时，创办“大众书店”，经销进步书刊，吸引和指导青年阅读，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青年，为嵊县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1937年 29岁

年初 闻讯上海救亡运动领袖邹韬奋、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便化名“章一民”愤然致函苏州高等法院，申张正义，呼吁立即释放“七君子”。

夏 与周飞、俞允之到上海参加薛暮桥负责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暑期讲习班学习。一边认真刻苦学习科学知识和政治理论，一边想

方设法寻找中共党组织，谋划筹建党的组织。

8月 嵊县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援会”）成立，县长方志超任主任委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俞美四任副主任委员。后援会下设政训、文化事业、民众动员、军事、财务、经济事业、总务等若干组（股），共由六、七十人组成。中共嵊县地方组织为了争取以后援会的合法名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团结进步青年，锻炼和壮大党的力量，努力使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进入后援会。张珂表进入后援会后，掌握了政训组的领导权。后援会宣传方面的工作，以及所属的嵊县抗日救亡第一、第二流动宣传队，城区业余宣传组等宣传团体，在张珂表、陈午韵等的具体领导下，团结爱国青年，冲破种种障碍和圈套，声势浩大地开展了形式多样、有声有色的宣传活动，足迹遍布城乡，在全县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张珂表等还利用合法条件，以后援会名义主办《抗敌》周刊、创办《抗日自卫》周刊，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和各地抗日救亡动态。

8月下旬 嵊籍中共党员王寄松由中共上海丝绸系统党组织派遣，回乡开展抗日活动。时张珂表等进步青年正通过编辑出版《要闻简报》等活动开展抗日宣传。王寄松与张珂表取得联系后，决定建立一支小型的流动宣传队，深入城乡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

9月上旬 经张珂表多方努力并落实相关经费的基础上，以嵊县抗敌后援会的合法身份，由回乡工人和嵊地抗日青年为骨干组成的嵊县第一流动宣传队在县城钱业公所成立。宣传队分总务、组织、宣传3个大组，专门建立中共支部，随后在城乡广泛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9月底 中共上海丝绸系统组织派骆又余来嵊县等地联络和检查工作，并带来党的《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件和中共上海三人团工人工作委员会委员吴仲超“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建立党的组织”的嘱咐。王寄松向骆汇报了嵊县情况，骆考察后，同意吸收张珂表入党，尹仲芳（团员）转为中共党员。9月底，在农工银行宿舍成立中共嵊县

张珂表纪念文集

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寄松为书记，尹仲芳为组织委员，张珂表为宣传委员。

是月 为了利用公开合法的条件宣传中共的抗日方针政策，在抗敌后援会宣传组任职的张珂表，主持创办《抗敌》周刊。第一期于9月21日出版，出至20期（1938年2月）因后援会改组而暂停。内容为当地抗日救亡活动、时评、短评、文艺等，还转载《新华日报》《群众》《全民》等报刊的报道和邹韬奋、胡愈之、胡绳、钱俊瑞等人的文章。

10月 辅仁剧团由于经费困难，难以为继，经张珂表设法改组为“抗敌后援会流动宣传队第二队”。“二流”走遍全县各个乡镇，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抗日救亡宣传。1939年9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解散。全队18个队员中，多数参加了浙东新四军。

12月中旬 从国民党南京中央军人监狱释放的中共党员张贵卿，由中共长江局派来浙江工作。经嵊籍党员张三扬介绍，以养病为由，到嵊东故江村丁友灿家。其间，张贵卿接触进步青年，开展抗日形势宣传教育，并组织介绍丁友灿、周飞、周丹虹等10人分3批去平阳县山门镇，参加闽浙边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学习。不久，由张贵卿、张珂表介绍丁友灿入党。

12月中旬 进步作家张璞君（骆宾基）到嵊，张璞君由茅盾、胡愈之介绍，应进步人士、嵊县三界茶叶改良场负责人吴觉农之约，以技术员名义到嵊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张到嵊后，即与张珂表取得联系，在三界一带开展工作。

12月19日 由张珂表等人发起成立乡村救亡协进会，开始有会员40余人，很快发展到千余人，下设40多个分会。以共同促进乡村救亡运动为宗旨，各分会积极开展办夜校、慰问募捐、抗日宣传等活动。该会会员主要是职工、学徒、学生、教师以及各界爱国人士。1938年夏，乡村救亡协进会被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

1938年 30岁

1月27日 经中共浙江省临工委批准，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成立。由王正山（王明远）任书记，袁于田（袁庸泉）为组织委员，张珂表为宣传委员，黄公石（黄德盞）为委员。党的工作以中共中央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针，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2月 为了团结进步青年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县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合法名义，发起成立“嵊县文化委员会”，以动员全县文化人，提高全县人民的文化水准，增强抗战力量为宗旨。

3月13日 负责主编的《抗日自卫周刊》创刊，该刊系嵊县抗日自卫委员会刊物，出至第16期，于同年7月16日改为《抗卫》半月刊。

4月1日 由乡村救亡协进会和嵊县农业推广站合办、张珂表负责主编的《群力》半月刊创刊。《群力》以“宣传抗敌救亡”为宗旨，理论、文艺兼有。32开张，每期1000份，由7人组成编辑委员会。同年夏，国民党县政府下令解散乡村救亡协进会，《群力》半月刊也随之停办，先后共刊出4期。

4月18日 张珂表团结城区职业青年，发起并以县抗卫会的名义成立了“城区业余宣传组”。同时，建立中共支部。业宣组设歌咏、戏剧、演讲、文教、军训等股，宣传演出《自卫》《东北一角》《壮丁上前线》《流亡三部曲》等独幕剧、多幕剧，和临时排演的活报、街头剧。此外，还编写教材办民校；办救护训练班，培训救护人员；募集捐款，慰问伤兵、难民；成立孩子剧团、救亡室等等。人员最多时有六七十人，被誉为“抗日救亡的突击力量”。

4月24日 由嵊县地方党组织开办，张珂表直接筹建的群力书店在县城县前街15号开业，群力书店的经费筹集、人员安排、书店方针等都由县委领导。书店实际领导人为张珂表，党员钱叔亮从中协助。书店出售抗日、进步书刊的同时，担负联络中共各地接线人员，转送党的秘密文件的任务。店内秘密建有党支部，被誉为“革命精神食粮供应站”。

张珂表纪念文集

6月 中共宁绍特委决定将中共嵊县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嵊县委员会，书记邢子陶，副书记张珂表、王正山，组织部部长袁于田，宣传部部长张璞君，妇女部部长杜玲君，青年部部长周飞。县委下设城区、嵊西、嵊东3个区委。

10月31日 由于成年累月为党的事业忘我工作，积劳成疾，因病医治无效在宁波华美医院逝世。

11月13日 县里为他举行了由各阶层人士数百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后 记

在整理编辑《张珂表纪念文集》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被张珂表同志的革命精神所感动，特别是他为人民大众谋幸福、为国家民族谋独立、为抗日救亡、为党的革命事业而长期废寝忘食、日夜操劳，直至积劳成疾，燃尽了宝贵生命中的最后一滴红烛，其光辉事迹无不震撼人心，令人肃然敬仰！

光阴荏苒，日新月异。张珂表同志八十三年前为之操劳、为之奋斗的目标早已实现。如今国家繁荣昌盛，社会和谐安宁，人民生活幸福，这样的局面是像张珂表一样的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怀念他们，发扬他们的伟大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功立业。

《张珂表纪念文集》之所以能够编印成书，得益于一代又一代史志工作者对张珂表相关史料的收集整理，同时也要感谢张珂表女儿张勤争女士提供的珍贵资料。由于时隔已久，加之时间仓促和编辑能力水平有限，瑕疵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2021年6月